

SGRA REPORT

SGRA报告 No. 109 中文版

NO. 109

ISSN 1346-0382

第74届SGRA论坛

第九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



第九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

■ 举办背景

本“国史对话”项目的目的是促进各国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 2016 年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 8 届。诸多参与者跨越国境齐聚一堂，围绕各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与挑战、个案实证研究展开讨论，深化了交流。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仍秉持着应继续对话的方针进行了 3 届线上举办的尝试，实现了深度讨论的持续进行。上届论坛（2023 年第 8 届）时隔 3 年实现了线下方式举办（线上同步进行），让我们再次确认了面对面对话的重要性。

本届论坛为第 9 届，继续以线下方式进行了举办，无法亲赴现场的各位则以在线方式参加。本届论坛由中日韩各 1 篇、共 3 篇论文报告及相关讨论构成。

为促进对话顺利进行，本届论坛也安排了中日、日韩、中韩语言的同声传译。论坛举办后，我们会编辑演讲集（SGRA 报告），并通过邮件杂志等方式广向社会推送与会者的文章。

■ 举办主旨

“国史对话”项目，通过加深中日韩“国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共同搭建知识平台，为克服存在于三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提供智慧，以此为目的，展开了多次对话。第 1 届对话确认了中日韩各国的国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状况，并以此为起点，之后几届对话从 13 世纪起，随着时代的推移设置不同的大会主题，进一步加深了对话。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期间，一直以线上举办的形式持续对话，并考虑到其特性，一直围绕历史学相关的及时性主题进行探讨。

随着 2023 年论坛重新恢复面对面举办，对话的主题定为“国史对话”项目最初就构想过的“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此次论坛从多个角度展开了丰富的对话，部分实现了“国史对话”的目标。今后，该如何强化这 8 年对话建立起来的中日韩国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网，以及应该以怎样的方针继续对话，是需要思考的课题。

本次第 9 届“国史对话”承接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将举办地“东南亚”与各国国史的关系设置为会议主题，主要讨论了从过去到现在，中日韩的国史研究为什么，以及如何关注东南亚。在过去不同的历史阶段，各国与东南亚都有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和“往来”。这些既有政府间的关系，也有不受限于此的人员流动与物品流通。这些关系，以及对这些关系的关注形态，各国情况大不相同。除了阐明其中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之外，作为条件比较相近的事例，还与自己国家的发展进程作对比。“东南亚”这一框架，原本就与国民国家和“东亚”框架一样，是世界遭逢巨变的产物，是历史学考察的对象之一。

在此次研讨会上，活跃在各国第一线的领军学者介绍了过往的研究动向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探讨了这些研究是在怎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选用这样的手法和视角，会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又能为今后带来怎样的展望？本次研讨会通过讨论和对话，将中日韩的国史对话置于更加多元的语境中，让对话更加开放，为思考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机会。

关于 SGRA

关口全球研究会（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SGRA）以推动实现良好的地球市民为目标于 2000 年成立，因渥美国际交流财团所在地东京都文京区“关口”而得名。SGRA 以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以渥美奖学金获得者身份共同从事研究活动的外国与日本研究者为中心，为应对各种现代课题而进行研究及献策，并通过论坛以及报告书等形式公诸于社会。SGRA 以开展领域广阔的、国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为愿景，推动多国籍的研究人员广集智慧与人脉，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

(www.aisf.or.jp/sgra/chinese)

第九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



日期 | 2024年8月10日（周六）～11日（周日）
会场 | 朱拉隆功大学（泰国曼谷市）+ 线上
主办方 |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组织委员会
协办方 |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赞助 | 东京俱乐部

第 1 场

[主持人：刘 杰（早稻田大学）]

【前言】

刘 杰（早稻田大学） 5

【开幕致辞】

三谷 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6

【主旨演讲】

后殖民时代“国族主义”碰撞之考察
—以毛时代及后毛时代中国对日政策变化为线索

12

杨 奎松（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提问答疑

25

发言（按发言顺序排序）：

平山 升（神奈川大学）

杨 奎松（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Pattajit Tangsinmunkong（陈 玉珍）（东京大学）

第 2 场

[主持人：南 基正（首尔大学）]

【报告 1（泰国）】

“竹子外交论”中的大国关系与小国意识

29

Pattajit Tangsinmunkong（陈 玉珍）（东京大学）

【报告 2（日本）】

日本近代史与东南亚 —围绕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评价

36

吉田纯已（三井文库）

【报告 3（韩国）】

韩国对东南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3

尹 大荣（首尔大学）

【报告 4（中国）】

侨务与外交：中国对 1959 年印尼排华问题的反应

48

高 艳杰（厦门大学）

第3场 [主持人：彭浩（大阪公立大学）]

指定讨论

55

指定讨论者：

【中国】郑成（兵庫县立大学）、郑洁西（温州大学）

【韩国】郑栽贤（木浦大学）、韩成敏（高丽大学）

【日本】佐藤雄基（立教大学）、平山升（神奈川大学）

第4场 [主持人：郑淳一（高丽大学）]

自由讨论

73

讨论者（按发言顺序排序）：

杨奎松（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Pattajit Tangsinmunkong（陈玉珍）（东京大学）、

吉田纯巳（三井文库）、尹大荣（首尔大学）、高艳杰（厦门大学）、

三谷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盐出浩之（京都大学）、平山升（神奈川大学）、

宋志勇（南开大学）、郑栽贤（木浦大学）、韩成敏（高丽大学）

讨论总结：刘杰（早稻田大学） 87

【闭幕致辞】 宋志勇（南开大学） 89

讲师简介 90

代后记

金因泰（全南大学） 92

参加者名单 96

※同声传译

日语⇄中文：丁莉（北京大学）、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韩语：李惠利（韩国外国语大学）、安暎姬（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韩语：金丹实（翻译工作者）、朴贤（京都大学）

※所属・职称以本论坛举办时为准。

前言

刘杰

早稻田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既然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我是早稻田大学的刘杰，负责第一场会议的主持。请大家多多指教。

此次对话的举办得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相关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首先，我要表达诚挚的感谢。同时，各位与会者也在昨天抵达泰国，想必现在大家都很累。今天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截至去年，我们已经举办了八次国史对话。去年的第八次对话的主题是“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我们主要围绕教育、媒体及学术研究中关于 20 世纪的战争等问题的叙述方式展开了讨论。我们最初开展国史对话时最关注的问题，其实正是去年所讨论的主题。然而，由于这个主题非常复杂，我们在最初的对话中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即先从探讨东亚的各种历史问题开始入手，将最困难的主题留到后面再来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建立起了国史对话的网络。通过这一网络来构建一个“知识的公共空间”，或者说“知识的平台”，也成为了我们的目的之一。在去年举行的第八次对话中，我们证明了这一网络已经建立，并且我们确认，在这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能够进行真诚对话的空间。这可以说是“国史对话”的一项重大成果。

然而，这一“知识的公共空间”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然，这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息息相关，例如俄乌战争、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以及东亚地区的各种安全保障问题。这不仅仅是现实中的政治和外交问题，很多时候其根源都在历史。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应对？比如说，对于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等新的动态，历史学家们又应当如何回应？面对各种新挑战，我们必须做出回应。我认为，我们如今面临着与当初开始国史对话时截然不同的新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九次的国史对话能够在泰国举办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进一步探索“国史对话”新的可能性。

开场的发言我就简单讲这么多。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入主题。首先，我想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老师为本次会议致开幕辞。有请三谷老师发言。

开幕致辞

三谷 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我们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家，至今已经举办了 8 届论坛，邀请各国研究和教授“国史”的学者持续推进了对话。此次，我们将在作为母体的亚洲未来会议的舞台——曼谷探索新的可能性。对此，我谨代表全体成员向提供会场的朱拉隆功大学，以及一如既往地给予全面支持的渥美国际交流财团，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我将首先介绍一下本“国史对话”项目的宗旨和历史。本项目是由早稻田大学的刘杰教授和渥美财团的今西淳子理事提议的，而我作为日本的国史学者之一，从初期就一直参与其中。

当时的设定是，能否缓解东北亚三国之间关于历史认识的对立，尽管经济和人际交流日益加深，彼此的协作已变得必不可少，但对过去的认识却成为了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最适合的方式是让各国以本国为中心编写历史的“国史学者”齐聚一堂，进行直接对话。这便是“国史对话”项目启动时的初衷。

至今为止连续 8 次参与对话的成员应该很熟悉这一宗旨，但这次的会场在曼谷，有初次参加的泰国和东南亚人士，所以我想先来介绍一下“国史对话”的历史。

为什么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关系不好？这主要始于 20 世纪前半叶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与对中国大陆的侵略。1945 年日本战败，韩国和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新的国家。日本也在新宪法下选择并践行了贯彻和平国家的道路。然而，被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并未忘记之前的苦难、牺牲和屈辱。

20 世纪中叶，东北亚三国分别遭受了巨大的战争创伤，都变得极度贫困。在此背景下，首先复兴的是日本。日本通过贸易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在此过程中，1965 年与韩国建交，1972 年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据闻，在谈判过程中围绕日本的过去展开了激烈讨论，但韩国与中国政府均未对日本的过去进行公开谴责。这主要是因为韩国和中国不得不依赖日本的经济援助。两国的首要任务是复兴，而当时能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的只有日本。因此，尽管两国希望日本为过去道歉，但在公开场合却不得不保持沉默。而日本政府当时也对公开道歉持消极态度。

这种情况在韩国和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后发生了改变。对韩国而言，这发生在 1990 年代以后，对中国而言则是在 2000 年代以后。从这时起，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开始重视国际协作，开始倾听邻国对过去责任进行追究的声音。这一点在 2001 年围绕日本中学教科书的大论争中显现出来。当时，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核通

过了试图尽可能隐瞒日本对邻国作恶历史的教科书，引发了日本国内以及韩国和中国的强烈批评。最终，这本教科书几乎未被采用，但这一事件催生了两种不同的潮流。

其中之一是中日韩三国历史学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学术交流。三国政府开始进行日韩、中日之间的历史共同研究，民间也开始了跨国对话。从第三国的视角出发，美国的大学也提供了这样的对话平台。其成果之一就是刘杰老师和我编辑的《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该书于 2006 年同时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来在编者之一的杨大庆老师的努力下出版了英文版（2012 年）。日韩之间也进行了各种共同研究。宫岛博史和林志弦等的《殖民地近代的视角》（2004 年）以及旨在编写中日韩三国共同教材的《开创未来的历史》（2005 年）是其代表性成果。我为了中日、日韩的历史对话，搁置了自己专攻的明治维新研究，度过了东奔西走的岁月，但确实有了收获。起初，我因担心会被中国或韩国的学者严厉指责而提心吊胆，但随着对话的深入，只要我们对“不利的史实”也持有愿意倾听的态度，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因此，即使对史实的解释不同，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分歧。通过冷静的学术交流，作为专家我们对彼此怀有敬意，甚至培养了连带感。

因此，2008 年，我在 Andrew Gordon 老师的协作下邀请三国历史学家到哈佛大学，公开进行了一天半的历史对话。在总结时，我表示，在历史专家之间对于历史认识的对话已经能够顺利进行。只要政治家们不无事生非，互相理解会加深，最终有望实现和解。

然而，此后就真的生了是非。2010 年，在尖阁列岛（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事件；2012 年，韩国总统登上了竹岛 / 独岛。此后不久，日本开始了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这个内阁得到了以教科书论争为契机而产生的主张日本史无误性的势力的支持。于是，中日韩三国政府对邻国开始采取敌对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之间的跨国连带必然变得无力。担任政府级别中日共同研究中方负责人的步平老师在早稻田大学的最后一次讲演中说：“我们历史学者使跨国对话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与政府、舆论之间的距离却拉大了。”尽管历史专家们做出努力，但其实效却变得微弱。热烈开展了 10 年左右的东北亚历史对话在此暂时中断。

尽管如此，刘杰老师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仍然尝试重新推动历史对话。他提出的主张与以前不同，以前对话的主要参与者是邻国史的研究者，他们预先对对方国家的情况有很好的了解，而这次他主张以本国史的研究者为中心。许多国史研究者对外国漠不关心，能讲外语的人也很少。同时，这些人正是各国年轻一代所学习的“国史”教科书的编写者。他们在幕后工作，现在要把他们拉到国际会议的前台上来。这样一来，可能比以前更能实现深层的相互理解，并为国民之间的真正和解奠定基础。我推测刘杰老师是这样考虑的。

本国史对话于 2016 年启动。第一届于 9 月在北九州市召开预备会，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国史学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是如何叙述“东亚”的。中国方面是葛兆光老师，韩国方面是赵珖老师，日本方面则是我，各自介绍了本国的情

况。接着，第二届于翌年8月在北九州市召开。这是一次有将近20人参与报告讨论的大型研究会议，并为所有发言配备了中日、日韩、中韩的同声传译。当时担任翻译的老师至今仍在继续为本项目提供出色的翻译服务，我再次向各位翻译老师表示感谢。第二届的主题是“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这是因为从古代开始讨论的话，现代国史的框架介入较少，会更容易对话。果然，包括来自内蒙古的成员在内，不同背景的人们进行了坦率的讨论。比我们年轻一个世代的年轻一代的参与成为了培养跨国友谊的起点，这也是一个重大成果。第三届于2018年8月在首尔举行，讨论主题是“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由乱转治”。第四届于2020年1月在菲律宾的阿拉邦地区召开，讨论“‘东亚’的诞生：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

然而，新冠疫情的到来使得面对面会议变得不可能。我们反而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在线方式继续对话。2021年1月的第五届论坛讨论“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9月的第六届论坛讨论“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从历史的深度探讨了由疫情所突显的人类共同课题。2022年7月，我们仍然以在线方式举办，会议讨论了“‘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这些讨论成为超越传统历史学，特别是超越民族主义框架的政治史来重新思考历史的良好契机。同时，在国史对话启动时曾担心的各国间差异和对立退居其次，我们的视野开始更多地关注跨越国境的共同课题。这在年轻一代当中尤为显著，作为年长一代，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在这三次在线会议中，尽管同声传译的负担没有变化，但渥美财团的负担有所减轻，面谈的次数有所增加，成员之间的亲密感也加深了。

2023年8月，我们久违地在早稻田大学召开了面对面的会议。主题是“20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教育·媒介·研究”。这个主题实际上是我们启动国史对话时所设想的最终目标。20世纪前半叶日本对邻国造成的伤痕，要如何对其进行整理才能实现国民层面的和解呢？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需要讨论的要点也很多。然而，在这次的报告和讨论中，与其说是各国的观点，不如说是更多地呈现了同一国家内的多样视角，并有尝试深入理解外国立场的报告。这或许才是解开问题的真正途径。尽管目前与外国的过去相关的议题有时仍被政治问题化，但这更多是出于国内政治问题的结果，而非与对方国家的现状或行动，以及对过去本身的认识相关。这是否是件好事呢？这些反思也在会上被讨论。

而本次论坛的地点是曼谷。我们在这里要讨论什么呢？虽然东北亚三国的“国史”之间的对话仍然是一个课题，但如果将东南亚纳入其中，又会看到什么呢？

第四届对话是在菲律宾举行的。在那里我们首先确认了“亚洲”这个地理概念本来是西方人提出的，并在19世纪的东亚被重新塑造成一个政治的地缘概念而被使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三国如何认知新出现的西方世界，这与各自国家传统的重新审视有何关联，以及人们是如何开始移动的。因为这是19世纪的事情，三国之间的关系还不紧密，比起相互关系，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相互比较上。而且，由于三国与会议地点菲律宾的关系较为薄弱，因此未能以菲律宾为线索进行三国之间的对话。

然而，本次会议将与东南亚的关系设为主题。从理论上讲，可以讨论在东南亚

这一舞台上，中日韩三国如何参与相关事务，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形成了怎样的相互关系，三国如何竞争，产生了哪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反映在各国的“国史”中，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等众多议题。此外，与菲律宾会议不同，这次讨论的时期更接近现代，因此各国与东南亚的实际关系更为密切，讨论各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也更为容易。此外，还可以讨论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如何看待东北亚，他们的“国史”中如何定位和描述日本、中国、韩国。反向的讨论也成为可能。

然而，这次可能也无法进行充分的讨论。因为东北亚各国与东南亚建立深厚关系的历史还很短暂，且日本、中国、韩国的经历相当不同。

作为一个日本史学者，由我来谈论东南亚和东北亚关系的历史实在是太过僭越，但为了便于与会者理解今天的报告和讨论，容我斗胆在此概述一下历史背景。

与历史学家惯常做法相反，我想从最近的数据开始看起。这里展示的图表试图从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方面来理解东北亚三国与东盟（ASEAN）国家之间关系在近年来的变化。图表主要基于东盟从 2001 年开始发布的统计年报，一部分数据参考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开的数据。东盟的范围从 1967 年成立时的 5 个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经过 1984 年文莱加入，冷战结束后，1995 年越南加入，1997 年老挝和缅甸加入，1999 年柬埔寨加入，目前扩大到 10 个国家。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图 1 显示了从 1993 年至 2022 年间东北亚三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的合计），以及东盟内部的相互贸易额（图片从略）。可以立即看到，2002 年和 2007 年之间有一个断层，总体金额急剧增加。在此之前，尽管东盟成员国增加，但贸易并未立即增加，2007 年之后却急剧增长。这表明东盟成员国的进口能力增加了，即开始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东盟内部的相互贸易也急剧增加，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这个初期阶段，日本和美国、欧盟是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和韩国的比重较小，但 2007 年以后，中国急剧增加，韩国也在增长。相比之下，日本的出口则趋于停滞，甚至有所下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变得薄弱。日本企业将重点从商品出口转向了对东盟本地的直接投资。日本企业转变经营策略，在东南亚建造了汽车、家电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工厂，将这些产品不仅在当地国家出售，还销售到东盟各国、日本以及世界各地。大约 10 年后，中国和韩国的直接投资也开始活跃起来。

接下来，我们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东北亚各国各自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如图 2 所示，日本最初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较深，随后是印度尼西亚（图片从略）。相比之下，2010 年以后，泰国迅速增长，与新加坡齐头并进，而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则停滞甚至下降。然而，对越南的出口一直在增长，到 2020 年已成为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接下来是韩国。前半段的出口量微乎其微，后半段则有所增加。但出口对象相当不均衡，最初是新加坡，最近则是越南在不断增长。今年冬天我访问了越南的大叻市和岷港市，这些城市里满是乘坐观光巴士的韩国游客。尽管如此，其他国家却很少，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印度尼西亚的存在感很弱，这是为什么，令人费解。

相比之下，中国与每个国家的关系都很深。最初由于国内需求紧张，出口量不大，但首先是与新加坡的关系加深，随后 2010 年以后对所有国家的出口都在增

加，尤其是对越南的出口急剧增长。中国的存在感十分突出。

综上所述，东北亚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加深，除了日本外，主要是在最近十几年里发生的。日本和韩国在贸易对象国上有所偏重，而中国则可以说是与所有国家的关系都在加深。

那么，接下来我们跨越时代，从古代向现代进行梳理。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华侨的存在。与东南亚最早建立关系的北方人是住在陆地相连的地方的人们，广义上的汉民族。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朝鲜和日本都与东南亚关系疏远。在东南亚大陆的近海，有一连串弧形的群岛，与大陆之间有相对容易航行的海域。当地人和汉民族都以此为舞台进行贸易，并在此生活。汉民族进一步在宋朝海上贸易兴盛之时，开始沿着海路向东南亚各地移居。这就是所谓的华侨。从那时到现在，东南亚聚集了多个层次的中国移民。他们一方面与当地通婚，另一方面继续保持与祖先之地的联系，但与中华王朝的政治关系却相对有限。东南亚各王朝与中华王朝建立朝贡关系时，驾驶这些贸易船的是他们，但在政治上并非受其统治。大概现在也是如此。

到了16世纪末，日本和朝鲜的人们也出现在了东南亚。随着西方人的登场，大陆边缘的海上贸易更加繁荣，并向北延伸。于是日本人借势反方向南下，在阿瑜陀耶和越南的会安等地设立商馆。此外，据说朝鲜人通过琉球与东南亚建立了关系。然而，这种与北方的关系在17世纪初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中断了。商品从东南亚流向中国港口，再通过琉球或长崎流入日本，反之亦然，长崎、琉球的商品也经由中国流入东南亚，但人员交流中断了。当时的日本，主动实行了类似于这次疫情期间世界各国实施的边境关闭和人员交流限制。

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重启于19世纪后半叶开国以后。日本商人在东南亚港口建立了商馆，娼妓也随之而来。后来的贸易如何发展，虽然很重要，但我并不是很了解。我希望能通过今天各位的报告对此进行学习。此外，如果还能学习到包括日本统治时期在内，朝鲜人与东南亚的关系如何变化的相关内容，我将非常高兴。

在那之后发生的南北关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重大事件无疑是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日本军队除了在1940年代向中国大陆出兵，还进攻东南亚，占领新加坡，与法国共同统治越南，在控制马来半岛后，甚至计划从缅甸进攻印度。此时，泰国免于被直接统治，但马来的华侨却遭到日本军队的严厉镇压，因为他们自中日战争开始以来一直热心支援祖国。日本在各地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对策，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各地对这些措施是如何评价的。

在日本本土被美国打败后，东南亚摆脱了日本的统治。随后，旧殖民势力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等重返东南亚。当地人将从旧殖民势力中取得独立作为课题，而当时对于日本罪恶过去的相关记忆是如何处理的呢？在我这个外行看来，这段记忆似乎被搁置在一旁了。这种理解是否准确？

最后，我想谈谈日本在东南亚的再次出现。由于本土城市遭到全面轰炸和占领军对工厂设施的拆除，日本一度在经济上失去了力量。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改变了态度，开始对日本的复兴进行援助。据说当时把东南亚作为日本轻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也成为了加强经济关系的契机。如

前所述，在 20 世纪，东南亚与东北亚的贸易中，日本在早期占据突出位置，似乎正是由于这一背景。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一直被我们当做不言自明的概念使用的“东南亚”。这并不是当地人命名的。据说在 1840 年美国的一位传教士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这个词，这是早期的一个例子。然而，“东南亚”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概念被频繁使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美国为了推翻日本的统治，设立了“东南亚司令部”，随后在国务院设立了“东南亚事务局”。这种用法几乎同时也开始在学术著作中使用，但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国际政治意味。

这一概念在越南战争期间进一步强化。当地人也开始将其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来使用。1967 年，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五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其前身是 1961 年由马来亚联合邦、泰国和菲律宾三国组成的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在越南战争期间，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形成了东盟（ASEAN）。这背后存在的便是东西方冷战的背景。

然而，之后的发展颇为有趣。越南战争结束后，1984 年文莱加入，冷战结束后，1995 年越南加入，1997 年老挝和缅甸加入，1999 年柬埔寨加入。这样，几乎整个大陆和岛屿地区都纳入了一个综合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开始展开了跨越政治体制差异的多角度对话。如同对当前缅甸问题的态度所表明的那样，尽管避免直接干涉，但也并非置之不理，显示出一种谨慎的运作方式。这个地区性共同体在扩大区域内的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另一方面，东盟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开放性和多层次性。典型如国家，区域共同体为了增强内部团结，通常会在与外部之间设立壁垒。然而，在东盟中却显现出相反的动向。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了包括日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 ASEAN+3，不断深化与域外国家的关系。这在后来随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于 2011 年加入，逐步扩展发展为“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其理念似乎是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双赢”关系的深化。在此之前，亚太地区的 21 个国家于 1989 年创建了更广域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而 RCEP 被认为将起到引领 APEC 发展的作用。构建不设壁垒、多层次且灵活的合作关系，是东盟的一大特点。

我们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家，现在正在对与这样一个地区的关系进行思考。不仅限于国家间的关系，还关注人们之间多样的联系以及冲突，回顾这些关系是如何被处理的，并思考未来如何深化这些联系。

以上便是从一个日本国史学者的视角进行的介绍。作为外行，可能有很多错误。恳请大家在报告中务必对此予以纠正。希望今天的会议结束后，各位都能有意想不到的智识收获。

第1场

【主旨演讲】



后殖民时代“国族主义” 碰撞之考察

——以毛时代及后毛时代中国对日政策变化为线索

杨 奎松

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1. 引言

首先要说明，这里借用一些台湾和日本学者使用的“国族主义”一词，是为了避免与“民族主义”一词发生扞格歧异的情况。

一方面，这是因为我比较认同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做的区分，即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前者是基于同等权利地位，出于对国家共同的政治认同结合在一起的——比如由众多民族和种族结合而成的“美利坚民族”——理应称其为“公民民族主义”；后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族群，则理应称其为“族裔民族主义”。¹ 基于这样的理解，以及中国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的事实，简单地用“民族主义”（或曰“中华民族”）一词指代各民族的共同意志，亦不准确。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是阶级斗争论者，阶级斗争理论主张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视民族主义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共历史上迫于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现实，不能不先帮助资产阶级实行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使用过“革命的民族主义”之类的概念。但随着其力量壮大，到1948年底准备建国时，它就已经公开与“民族主义”的主张和概念划清了界限，转而宣布要彻底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了。² 故基于上述，本文只能勉为其难，取“国族主义”暂用之。

我个人非常认同刘杰教授等主张并努力的，为形成“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而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实际上，“跳出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强调每个国家历史、观念、制度的独特性”的研究思路和叙事模式³，从上个世纪末在国际史学界就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跨国史、全球史、人类史，也包括着眼于全球跨区

1 参见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等译：《国族与国族主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等。

2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第1、4版。

3 入江昭著，邢承吉等译：《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页。

域的文明史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单纯靠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尚不足以帮助世人解决国家、民族间因历史恩怨和现实利害关系所造成的种种对立和冲突。不要说国家政权的强势作用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历史教育影响巨大，而且，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离开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特别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政治精英的眼光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和解是难以实现的。

迄今为止，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西方中心论”，这个世界上唯一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国家、民族间和解的案例，还是发生在西方（欧洲）。其中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拥有几个世纪宿仇的法国和德国，在二战结束后一步步成功实现了历史和解，并且奠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基石，推动欧洲多数国家也先后实现了历史和解，直至建立起真正跨越国境的欧洲联盟。

考察法、德历史和解的经过，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其和解的实现首先得益于战后两国意识形态（或曰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一致性。而这在战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其次是在这种基本一致性的基础上，两国的政治精英都以避免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战争悲剧为目的，想方设法解决困扰两国数百年的领土争端等问题。战争结束几年后，法国外长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舒曼计划”，接着法、德、意、荷、比、卢六国达成共识，签订了《巴黎条约》，一举将长期成为法德两国冲突根源的领土和边界问题，即欧洲第二大原煤出口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煤钢资源，置于两国共同参与，并向西欧所有国家开放的联合管理机构之下。此举根本改变了过去两国各自出于维护本国权益，不惜战争，必欲独占的传统观念，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利益均沾的办法，“使民族的自身利益在国际框架内得以实现”，这也为解决其他欧洲国家间的诸多领土争端问题提供了榜样和经验。因此，不仅法德两国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得到根本纠正，两国数百年来相互伤害积聚的历史恩怨，也渐渐通过之后包括史学家、教育家在内的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步地得以全面化解了。⁴

与法德历史和解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相比，处于后殖民时代的中日历史和解以及亚洲一体化，包括其他同样脱离殖民时代而来的发展中国家、民族间和解的进程，都明显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就中日历史和解问题的变化而言，最令人称奇的，是毛时代与后毛时代，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关系竟然不是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反而是从双方共同努力创造的长达三四十年来越来越好的状况，一步步倒退，渐渐走向了让人难以预料未来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周（恩来）一代人在日本政、商、军各界建立起来的十分密切的沟通管道如今已不复存在，毛时代建立起来，邓（小平）、胡（耀邦）时代延续并有所发展的两国民间的、青年的、文化的、体育的规模庞大且热络的交流模式，也早已不见踪影。两国国民相互之间曾经的好感，更经历时起时落，已跌进谷底。相反，毛时代被当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意识打压的“民族主义”⁵，登堂入室在中国大陆成了“正能量”。毛泽东反复讲过许多遍的，不

4 参见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73页；戴启秀：《和解外交：超越历史的欧洲一体化》，《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等。

5 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夕专门由刘少奇署名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日第1、4版）一文，公开和“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

要老赔不是，更不要讨旧账的话⁶，反而成了当今中日关系日渐紧张的症结之一。

事情是否如此呢？又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呢？我们历史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以下仅联系我个人的亲历亲闻，就我感受到的中国方面的问题，略做一点考察和讨论。

2. 毛时代及后毛时代中国对日态度的变化

我从1990年开始差不多每年都会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一直参加了有近十年之久，但2000年后不再参加了。具体原因我在2003年《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一篇笔谈文章中做了说明。简单说就是，之前国内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大家都还基本上是本着学术研究的精神在进行对话，90年代后期这种学术研讨会却逐渐地被情绪化的批判言论支配了。⁷印象最深的是在我最后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报告论文时，被打断并遭训斥的难堪场面。斥责他对日本人抱有幻想，没有认识到“日本民族的劣根性”的，主要还是几位老先生，挑头的更是来自美国的退休的华人教授。

为什么之前抗战史研究大家基本上都能立足于史实，比较客观地研究讨论历史，1990年代最后几年却开始逆转了呢？不少人后来都认为，这是因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步伐加大，国力迅速增强，国人心态变了，国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所导致的。再加上90年代后期互联网迅速发展，民粹思想泛滥，与对外国族主义互为表里，群众基础空前壮大，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种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说1990年代中国国力迅速增强导致国人国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逻辑上未必说得通。因为，1990年代中期中国GDP世界占比仅仅是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的2%，中国整体国力和之前比并未明显增强。而且这时GDP占比从1994年前的1.6%开始回升到2%，还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过热，政府财政严重透支，人民币发行无度，汇率估值虚高的结果。1996年前的几年时间里，广义货币（M2）增长率高达30%，CPI年化增长率持续超过20%，一度甚至来到24%以上，直接影响了相当部分人民的生活。为解决这次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中央政府1993-1995年接连几年大刀阔斧搞改革，1994年甚至不得不一次性贬值官方汇率50%，并实行了外汇管制措施。经过两年多时间各项改革配套，中国经济才勉强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飞跃式发展，其实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事。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心态渐变，多半也是新世纪到来前后那几年的事。

有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报刊及网络的一些情况。举例来说，1996年宋强等模仿日本石原慎太郎此前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拼凑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⁸，炒作国族主义情绪，在商业方面很成功，但

6 《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记录》，195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记录》，1961年1月24日。

7 杨奎松：《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8 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

当年报刊和网络上的质疑批评之声是普遍存在的，且并未受到压制。来到2002-2003年，马立诚、时殷弘、冯昭奎等提出实现中日和解的“新思维”⁹时，因1998年中国领导人访日期间多次公开批评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2001-2003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方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报刊及网络上批评反对“新思维”的声浪已明显高于肯定支持的声音了。但从普通网民留言的情况看，也还没有出现一边倒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大力推动中日友好在一代年轻人中培养起来的对日好感，还没有完全消散。因为正是1978年、1983年邓小平、胡耀邦先后访日，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成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推动中日青年之间的密切交流，引入《追捕》《血疑》等日本影片和电视剧在中国上映，极大地影响了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

由上不难看出一个现象，即如冯昭奎所言：“中日关系一个重要特点是，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¹⁰至少就中国而言，这确是事实，因为邓、胡大力推行的中日友好政策，根本就是毛、周制定的，并要求世代坚持下去的政策方针。问题在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中国这种长期实行威权统治的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变动并非像邓小平向日本友人许诺的那样，不会影响到中国既定的对日政策。¹¹实际上，正是因为领袖个人的作用巨大，哪怕只是因为代际差异所带来的领导人性格、经验、能力的不同，更不要说不同时代条件下观念、制度、民意，乃至日本方面和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化，新旧领导人决策意图并无不同，结果却很可能会完全两样。

仍以我上面提到的中国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学者内部，特别是一些老先生的态度变化来说，为什么90年代末之前他们并不情绪化，到了1990年代末前后就变得十分亢奋了呢？我还是以我的亲闻亲历来举例。

我是1990年底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去后不久就听说所里要组团去日本参加日方举办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讨会。某天上午上班时，得知所有准备赴日参会的先生们都被叫到会议室开会去了。会散后，我们研究室的一位内定参会的老先生回到办公室，脸色十分难看。询问之下他告诉我，这个会是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一副处长受命专门来所召集的，目的就是来强调“外事纪律”。这次这个“纪律”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中方与会者不要发表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学术报告或相关言论，以免影响中日友好关系。至于什么话题容易引起争论，造成不好影响，该副处长直截了当地指出，比如南京大屠杀就不要提，甚至卢沟桥事变谁打一枪的问题也不要提。我当时所在的中外关系研究一室中的几位前辈，长期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文革结束后又受命集体研究写作“日本侵华史”，这时已完成了60万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书稿。让他们中人去参加近代中日关系史研讨会，却不让谈论他们这些年来最用心，也是最想和日本同行讨论的一些研究话题，他们会发自内心地感到不满，当不难理解。

9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10 冯昭奎：《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日本学刊》2017年第1期。

11 裴华编著：《中日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

然而问题是，中共从来都是按照管党的方式来治国的。“外事纪律”涉及到学术时，其实就是党的“宣传纪律”。在社科院这种半机关式的单位长期做研究工作，不可能不知道毛时代这个“纪律”的严格程度。那时，任何一个研究者应该研究什么，不应该研究什么，本身就要受“纪律”的管控。大家也习惯成自然，并不会有什么不满。改革开放后，这方面的规定已经宽松了许多，变成“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了。换言之，上级不再限制研究人员不许研究什么了，仍要限制的，只是“宣传”。在党的“宣传纪律”范畴内，任何发表、出版、公开场合讲话，都属于必须遵守纪律的范围。因此，外交部从外事工作现实需要的角度对出国参会的学者做出什么可以谈，什么不可以谈的规定，并不奇怪。有些研究人员会感到不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代变了，改革开放了，提倡思想解放，特别是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而且还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学者，面对不断传来日本右翼试图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消息，他们必欲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使命感自然也益见强烈。上下之间的这种碰撞，最终反过来作用并影响新一代领导人的形势判断，只是迟早的事。

3. 毛时代和后毛时代 “民情”“民意”的不同作用

我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多年，那里除了有一个图书馆，各教研室（部）还有自己专门的资料室外，还有一个可以比较及时地了解全国最新事态的“资料馆”。这是因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政府人大、政协、各部委，包括中共中央各部委和新华社等，都有定期报送给中共中央的内刊或情况通报。重要的事情，还会有半天一报、一天一报，或两三天一报的情况。

换言之，从毛时代开始，中共高层就极其重视并且基本上可以掌握全国范围内“民情”“民意”的动向。拥有如此庞大和严密的信息系统，毛却还是会因“冒进”造成种种灾难性事件，就不能不说和他的个性、阅历和战争经验有关了。他在战争年代既是出色的战略指挥家，也是善长谋略的政治家，但这种战略加谋略，迅速成功的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他越来越坚持自己的主观判断。而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党内不同意见批评为“保守”“小脚女人”，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也直接影响各相关部门讲真话的勇气。

以新华社《内部参考》为例，其创办本身就是毛泽东支持的，目的也是要通过这种只限于少数高级干部阅读，用以了解在公开报刊上不宜刊登，却应该了解的相关信息。但实际上，毛从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地在读《内参》。当注意到《内参》报道没有跟上他的政策方针时，他就会很不高兴。特别是1956年“反反冒进”和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毛就一再暗示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内参》不能只报忧不报喜。1958年大跃进运动轰起后，《内参》固然和《人民日报》一样，开始紧跟大跃进的宣传节奏了，面对国内外各种质疑之声，毛仍旧认为《内参》没有起到报纸应有的宣传指导作用。他为此在1959年2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内参》：“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因为《内参》没有掌握好成绩和问题“不过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容易让读者混淆这条是与非的界限。又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整顿和试验，《内参》终于被中共中央认定已经基本符合了“以

宣扬成绩为主，反映问题为辅”的工作方针了，但也完全失去揭露和反映问题的作用了。¹²

除了严格管控各种信息的传播外，毛时代对公众舆情的控制，也非常有效。因为所有人都在单位或街道的组织内，凡有重大政策变动会有针对性地层层进行干部群众的思想摸底，找出带有共性的问题，举办各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会议，派人宣讲，组织讨论，来达到宣教引导的目的。

最典型者如1971年举行中美会谈前、1972年中日建交前，中共中央为向全党全国从上到下层层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相当慎重地做了各种准备工作。

如为解释说服中共中央在京领导人同意与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举行秘密的预备会谈，周恩来首先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送毛泽东批准。然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的报告。接着又以中央工作会议名义，召集在京中央各方面高级干部用十几天的时间，学习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和斯诺发表的几篇谈论中美关系的文章，集体讨论，打通思想。¹³在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公告前后，又将经毛泽东批准的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逐级向各地党、政、军、民、学各单位进行了传达，并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学习讨论。

和前一年与美国举行秘密的预备性会谈的情况相同，周恩来基本确定了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准备来华与中国建交的情况后，马上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然后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并将会议讨论通过的《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再报交毛泽东审阅批准。和前一年不同的是，日本多年来一直是毛、周力争建交的对象国，双方民间的、经贸的及文化体育的来往十分频繁，因此无须预先向各级党政干部和群众做说服解释工作。但是，由于两国建交涉及到中共中央早就内定要放弃向日方要求战争赔偿的问题，考虑到遭受过日本侵华战争伤害的民众数量庞大，可能会引发不满，故周恩来还是预先在全国重点地区部署了调查和说服工作，并为此下达了向群众解释说明的指示。指示解释说：美、苏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但我们现在最直接的威胁是苏联。苏联近年来利用日美矛盾正在争夺日本，想把日本作为反对中国的一个基础，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可以打破苏联的阴谋，而且可以阻遏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还有利于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因此，“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几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个历史不能忘记。但是，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¹⁴

从毛、周时代开始，到邓、陈，再到胡、赵，中共三代领导人在对日问题上的政策方针几乎都是着眼于“中日友好”的，除了在台湾问题上不做让步，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外，对中日历史问题都主张“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要积极向前看”。¹⁵毛泽东并早在1955年就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讲：“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对你们过去欠的账再要来讨账，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叹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¹⁶

12 《新华社〈内部参考〉研究—基于部门利益的视角1949-1967》，复旦大学2024年博士论文，第154-186页。

13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82-38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63、467-469页。

14 转见《血债 对日索赔纪实》，高平等编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306-307页。

15 张宝忠：《跟随邓小平四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

16 《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记录》，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

也因此，无论是就战争责任的道歉问题，还是就战争伤害的赔偿问题，毛、周一代，包括邓、陈一代，显然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纠结的。毛、周在中日建交谈判过程中以及在《中日联合声明》措辞上，尽量照顾日方的难处，同意回避中方提出的宣布废除1952年4月28日蒋介石批准签署的结束中日两国战争状态的《中日和平条约》的要求，和同意日方在检讨战争责任问题时使用“深刻的反省”的说法，正式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¹⁷，都再清楚不过反映出毛、周一代人真心希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没有必要再算旧账，一切向前看的心态。

有关这种情况，也突出地反映在中共建国后对日本政府和对抗战历史宣传纪念的态度上。查毛时代的官媒，可以发现，除了朝鲜战争期间因高调反对美国以日本为基地威胁介入朝鲜和台海，1950年代初一度在宣传中把日本政府也当成美帝“傀儡”进行抨击。但1954年后直至毛去世，中国官方媒体就很少再公开抨击日本政府了。同时，中国官方对抗战历史的纪念宣传也比1949年前少了很多，1950年代后差不多每隔十年才统一做一次，并且主要还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战功劳。对日军战时暴行，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等等，也主要是在1950年代初有过公开的揭露和报道。¹⁸不仅如此，官方舆论有时虽然也还会发文警告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但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党报《人民日报》，从来都坚持“两分法”，即坚持把日本右翼及其军国主义分子视为“极少数”和“一小撮”，高度肯定日本人民帮助中共抗战及战后热爱和平的表现，要求国人对日本人民要抱有信心。¹⁹这种宣传教育几乎一直持续到了后毛时代初期。

最能展示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想要把毛、周提出的，要让中日友好世代代传下去的决心的，就是1983年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胡耀邦出面，邀请日本3000青年1984年来华举行中日青年大联欢。胡耀邦当时还不无遗憾地说过，我们现在的条件还不行，但这次只是开始，今后我们接待条件更好了，还要邀请三万、三十万，并且要长期坚持下去。²⁰

但是，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毛去后，党内“一言堂”的情况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华国锋主政的几年不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就连邓小平等人也开始公开批评个人专制，提倡政治民主，为此还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导致当时党内最具权威的邓的意见，也照样有人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再加上这段时间正处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各色青年及大学生动辄就会贴大字报，甚至上街游行。以至于就在1984年那场盛大的中日青年政治嘉年华举行后不到一年时间，在中国十几个城市就突然爆发了一场因日本首相中曾根率内阁成员在8月15日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而引发的青年学生的反日示威运动。

此一状况的出现完全出乎当时各主要领导人的意料之外。一连几天时间，从中共中央到外交部都非常紧张。由胡乔木直接出面组织并领导了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第1版。

18 周丹：《〈人民日报〉抗战胜利纪念报道的历史叙事研究——以逢十周年报道为样本》，湘潭大学2017年新闻学硕士论文。

19 对日本内部敌友的“两分法”，最初着眼于“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区别开来”，1953年后则改为将日本与“极少数”或“一小撮”右翼及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的方针。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0 高伐林：《1984年胡耀邦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的来龙去脉》，《伐林追问》第24期，2019年11月22日。

想赶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劝导学生，但为了如何遣词造句不会进一步惹怒学生，秀才们绞尽了脑汁都没拿出像样的稿子来。尽管这场风波在团中央和教育部等相关部门派人分头解释劝说下很快就平息了，但对日友好政策在国人开始高涨的国族主义情绪面前，其脆弱性也明显暴露出来了。

随着胡、赵一代领导人先后下台，资历更浅的新一代领导人接手，所受到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就更大了。面对日本方面状况频出，又是修改教科书，又是钓鱼岛，又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又是政府要员公开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再加上新出现的战时日军强征慰安妇和韩国受害者开始通过法律对日索赔等等情况，本来就压力山大的新领导人终于发生了在访日期间几度公开批评日方的作法。然而，注意到此举在日本民众引起了强烈反感，不利于毛、周、邓、胡一贯坚持团结争取日本人民的对日政策原则，新一代领导人很快又设法进行政策调整。一年多后，再有领导人赴日访问时，就根据内定的不再用历史问题去“刺激”日本人的方针，在出行前借与日本记者团谈话时，表明了此行重在修补中日关系的意图。不料，这一讲话当晚在互联网上曝光后，又在国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网民中引发了尖锐批评甚至是抗议。为此，香港《大公报》不得不受命对前一日曝光的领导人讲话，做出“重要更正”，删去了引发国内网民反感的用语。²¹

自1950年代中期之后，毛、周时代中共领导人就锲而不舍地谋求改善中日关系，而且对实现和维系中日友好明显地越来越充满自信。这种自信既缘于受双方关系改善激发起来的两国文化、种族、地缘“一衣带水”的亲近感，更得益于他们基于阶级理论和战争经验所形成的“两分法”。

周恩来在中国改取和平外交路线后首度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就讲过一段话，之后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他也多次重提过。他说：我们打了十五年仗，可是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了。最让他感动的一件事是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他们完全是自愿来的，不是我们把他们俘虏了，强制他们来的。”²²

毛泽东同样也讲过类似感谢的话，只不过他更多用的是军人的思维方式，而且是从战略层面谈问题。比如从来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各种客套和礼仪的他，每每会对日本来访者动不动上来先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一事道歉这件事，感到不耐烦。在他看来，战争就是战争，伤害不可避免，胜负已定，过去了就不必再提了。更何况“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当时我们只有两万五千兵力，正因为日本皇军打进来了，我们才又和蒋介石合作。“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感谢（日本皇军）啊？”²³

对比毛、周一代和1990年代新一代领导人在对日问题上态度和想法的不同，

21 见《朱镕基接受日记者采访》，香港《大公报》2000年10月10日；《重要更正》，香港《大公报》2000年11日。并见津上俊哉：《构筑“求大同，存小异”的中日关系》，《日经telecon21》电子专栏，2000年11月2日。

22 《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和平共处》，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8页。

23 《（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716页版本，第138、139页。

不难发现，后来的领导人很难拥有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那一代领导人在生死荣辱中应付裕如的机谋和在对日外交上敢做敢为，不惧党内国内异议的霸气。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在最容易刺激国人国族主义情绪的中日关系问题上，他们无论如何都回不到毛、周时代的政策和作法上去了。

4. 历史学者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如果上述考察和分析大致不差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开展的“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活动，确实存在着像川岛真教授和刘杰教授都提到过的那种短板。即因为历史当事人及其所留下的史料具有极大的主观差异性，本国史家的解读就很容易存在争议，要让语言、文化、情感上有着更多差异的不同国家的史家，通过学术交流，就史实的真实性进行对话，最后充其量可能也只是弄出一个各讲各话的“拼盘”。像中日关系，因为始终存在着加害方与受害方立场情感的差异，要想拿只是在部分史家中达成共识的“历史认识”去影响双方多数国民，其效果就更难想象了。²⁴ 我深信，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想用事实研究去改变大多数只会从相互的情感出发，站在自己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的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是研究历史的，都清楚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目的。但是，如果只求一族一国的真和实，我们恐怕永远都无法形成“跨出国境的历史认识”。这就像我们治史之人总是强调研究古人，必须要能做到“同情之理解”，以便用“换位思考”的方法，来了解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然而，绝大多数治史者真正能够“同情之理解”的，始终是自己那一党那一派一族一国。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几位研究抗战史的老先生、老教授，他们提起日本，气就不打一处来，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研究中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更不要说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古人或日本民族“同情之理解”并“换位思考”了。

我想，刘杰教授等提倡“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很重要的也就是希望我们治史之人，不仅能够充分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或国家，而且也能够同样地努力去理解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即使对方的民族和国家与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恩怨和冲突。之所以要这样想，并要努力这样做，根本在于，在各种学术研究的专业中，唯有历史研究是必须，也能够不只了解我们自身，同时也必须且能够理解我们的对手的。如果我们治史之人都不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思想和态度，和所有人一样，也都变成了一人一家、一党一派、一族一国的辩护士，那么，历史研究这门学问本身，也就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了。

需要提及的是，我个人认同“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提法和思路，严格说来并不是它能给我们提供哪些更能够还原历史真实的好方法。就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和研究，也即我们所关心的民族国家间历史和解问题而论，我不认为我们还需要什么新方法，而且也不相信现有的全球史、人类史的研究方法，能够给我们多少实质的帮助。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历史研究必须“跨越国境”的根本意义，在于我

24 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编：《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3页、第351页。

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史观问题。换言之，任何基于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这不是因为不该研究本族、本国的历史，而是我们要习惯于从基于大写的“人”的视角，把本族、本国的历史放到全球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进程中来定位、考察和评介其长短。换言之，亦即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历史和看待历史。所谓历史的眼光，就是我们要用发展变化的观念来认识和看待从古至今所发生的一切。不能用我们今天的，已经大大发展变化了的价值观，来评判古人的是与非；也不能设想古人能够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形成的观念，做出我们希望他们做出的事情。恰恰相反，古人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所具有的知识，包括他们能够做出的事情，都必然会受到他们生长的时代、国度、环境，以及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局限。

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例。众所周知，无论基于怎样一种价值判断，现代国家之成立都需要建立在几点国际通行的原则之上。这包括国与国关系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以国家间缔结的条约作为法律行为和交往的手段，等等。但是，这样一种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1648年参加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一奠定了新的国际秩序基础的国家，只有10个欧洲国家。100年后，可以列入这一体系的主权国家也只增加了一倍。来到20世纪，1920年成立“国际联盟”时仍就只有20个左右成员国。1945年成立联合国时也只增加了一倍多，只有51个成员国。现代国际体系历史性的大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联合国成立后不过50年时间，其成员国就猛增到190个左右。这新出现的近三倍于前的主权国家，绝大多数过去都是殖民地。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二战后独立建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一个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后殖民时代。

除经济发展明显落后外，新兴国家几乎都具有两个极大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特点。一个是它们多半都在反殖民统治和反帝国主义压迫的过程中形成所谓“国族”意识，进而独立建国的；二是其领土范围多半也是经由殖民当局根据其有效控制范围随机确定下来，并未顾及许多小民族、小部落的整体性。由于这些新兴国家很多都是由几个或更多的民族或部落集合而成，不同民族或部落各有各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因此，这些新兴国家不仅普遍具有格外强烈的国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意识，而且其内部各民族或部落，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族裔民族主义或部落意识。这些都使得这些新兴国家建立后，一方面会与周边国家发生各种形式的领土争端；另一方面其内部民族、部落及其土地资源之争，往往也经久不息，甚至引发新的独立战争。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和日本虽然也可划入后殖民时代，但两国并不是二战后新独立的新兴国家，它们有着相对久远的独立国家意识，和上千年的文化交流史。这使得它们之间的历史和解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并且一度也确实取得过很重要的成绩。但是，法德所以会成功，首先在于两国发展程度相当，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及其法律制度都基本一致。其次则与二战后美苏冷战，法、德及整个欧洲必须与美国结盟才能抗衡俄国的威胁，因而先有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后有舒曼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再加上由此促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不要说法德，几乎整个资本主义的欧洲各国，都很快实现了一体化。

在这方面，中日两国真正实现持久的历史和解的基础就薄弱得多了。首先在政治、外交上，战后两国就分属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两国民间交流固然有所进展，但

正式国家关系的建立，还是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缓和后，经过毛、周极力推动和妥协，才得以实现的。

其次，法德两国的历史恩怨是交互的。法国曾几度被德国入侵，占领，甚至割占领土；德国也几度被法国入侵、占领，并割占领土。因此，两国的历史和解，不存在所谓“加害国”与“被害国”的心理差距，更不存在哪一方必须要向另一方公开“道歉”的问题。然而中日之间，侵略与被侵略、加害与被加害，所引来的“道歉”乃至“赔偿”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横亘在两国历史和解道路上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尽管毛、周主动示出善意，做出妥协，达成了建交的目的，并持续了 20 年的友好关系，但随着强势的毛撒手人寰，国族主义逐渐回归，“世世代代中日友好”的希望很快就难以延续了。

再次，不论中国还是日本，从社会发展程度上看，与法国和德国都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有关法、德、日、中社会发展时间段上及程度上的差异，或可略以下表比较之。

由下表可知，法、德两国经济发展始终并驾齐驱，增长迅速，农村人口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显示其城市化历史悠久，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建立在人性、人道、人权观念上的社会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法治基础久已深入人心。两国虽因移民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不如日本后期增长迅速，却并不会影响到两国在相同的观念和制度条件下的历史和解。

相比而言，日本和中国过去都是农业社会，传统观念色彩浓厚，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均未经历过以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为基本价值观的人文主义运动，和崇尚理性、破除等级、宗教及其传统观念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因此，和日本 19 世纪末一跃而跻身列强之列，反而使日本拥抱了整体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爱国主义）一样，中国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一跃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迅

	1894		1963				1977			2023		
	识字率	人均 GDP(\$)	农村人口占比	识字率	本科以上学历	人均 GDP(\$)	农村人口占比	本科以上学历	人均 GDP(\$)	农村人口占比	本科以上学历	人均 GDP(\$)
法	78%	1030	26.9%	99%	6.8%	1600	22.9%	8.8%	8370	18.9%	36.7%	40329
德	90%	1250	15.4%	99%	7.9%	1400	9.4%	9.6%	8710	9.5%	39.5%	47470
日	50%	152	49.6%	98%	5.2%	550	17%	21.2%	1720	14.2%	42.6%	33790
中	15%	60	82%	52%	1.1%	100	75%	2.4%	156	36.1%	15.8%	12199

资料出处：日本文部科学省：<https://www.mext.go.jp/>；法国教育部：<https://www.education.gouv.fr/>；德国联邦统计局：<https://www.destatis.de/>；杨国桢：《清末民初中国文盲率估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1986年第3期；Maddison Project：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2008；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日本总务省统计局：<https://www.stat.go.jp/>；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https://www.insee.fr/langue/en>；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等。

注 1：表中 1894 年为中日甲午战争时间点；1963 年为《法德友好条约》签订年；1977 年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夕；2023 年为最近时间。

注 2：表中“农村人口”包含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非专指从事农业生活活动的人口。

速膨胀的也是基于整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意识。再加上“新冷战”时代的到来，中日两国再度各站一边，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中日两国尚不存在从国家、民族和社会层面，形成“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达成历史和解的可能性。

如果上述考察和分析大致不差的话，中日两国学界的努力是否就毫无意义了呢？当然不是。像步平先生再三提到过的那样，推动法、德两国历史和解的最初步骤，就是两国学者首先发起的，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开始在努力了。²⁵之所以只能学界先行，一是因为“科学无国界”，惟有从事运用科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才懂得超越国族局限看人和人类问题的重要性。二是因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思想启蒙过程，从来都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步步演化而来。法、德两国本就是近代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策源地，而且还是康德关于公民权高于国家主权，自由国家理当组成保证世界公民法权地位的国际联盟主张²⁶的最早的演生场。算起来，为了法、德两国历史和解乃至欧洲民主国家联盟的最终实现，两国知识界中先知先觉者，从思想的形成，到主张的提出，其间固然经历了反法同盟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血腥的战争。而当两国开始基于共同的价值观，选择了相同的制度，面对共同的威胁，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理想，善良的人性被唤醒，不再局限于国族界限时，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样的过程，相信中日两国也不能例外。两国学界若能先行一步，超越国族局限认识历史，解释问题，无论如何都能减少前行的阻力。

25 步平：《东亚历史的书写能否跨越国境》，《中华读书报》2013年6月26日，第9版。

26 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1789年之后的论文》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36、395-363页；乔纳森·特雷霍-麦西斯著，刘玉贤译：《康德、哈贝马斯及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现代哲学》，2016年第2期。



【提问答疑】第1场

主持人：刘 杰 早稻田大学

发言（按发言顺序排序）：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杨 奎松 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陈玉珍) 东京大学

[以母语发言。翻译：于 宁（日语）]



刘 杰

非常感谢。杨老师十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中日历史学者之间的对话，并为两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杨老师对民意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舆论及政治家的作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三谷老师和杨老师都从宏观视角分享了宝贵的见解。接下来，我想留出一些时间进行提问和答疑。欢迎各位与会者提出一到两个问题，或是分享感想、评论，任何意见都可以。那么，首先请平山老师发言。

平山 升

我是神奈川大学的平山升，是本次会议的指定讨论者之一。三谷老师、杨老师，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发言。在为明天的讨论做评论前，我想先确认一件事。大家请看杨奎松老师论文中注释的第8条（P14）。其中指出，在中国有人模仿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出版社是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注释中列出的其他文献的出版社，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或大学出版社等等，明显属于学术类的出版社。但是，第8条注释中的工商联合，是否是一家与工业和商业相关的出版社？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这是一家什么性质的出版社？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所研究的战前的日本，在大正时代、也就是在1920年代前后，在那之前日本产业界的实业家以及工商业界的成功人士原本并不在意天皇和神社，但从那时起他们极力鼓吹应当绝对尊崇天皇，必须参拜供奉天皇祖先的伊势神宫。这类言论通过产业界、实业界的媒体、杂志和文献开始大量传播。这一现象出现在了大约100年前的1920年代的日本。我想确认的是，1990

年代的中国是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就是我提问的原因。

刘杰 平山老师，感谢您的提问。那么，杨老师可以回答一下吗？

杨奎松 这个出版社和这本书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流行几个人合伙，抓住一个容易炒作的话题，突击性地编纂一本书，找个出版社印出，目的是挣快钱。这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商业炒作，他们发现了这个话题，所以几个人合伙突击编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的原型是日本1989年出的一本几乎是同名的书，只不过叫《日本可以说不》。那本书在日本经济泡沫最高潮的时候，一下子炒得很火。而1996年，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起步，所以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出了这本书，一下子就赚了几百万元。所以后来他们接着又做了类似题目的书，继续炒作。这个是中国商业炒作出版挣钱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但和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1996年这个时间点，其实也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还只是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所以后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刘杰 接下来，我们再请一位提问。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陈玉珍)

我直接用中文问杨老师。谢谢杨老师很精彩的报告。我想提问的地方跟刚才平山老师提问的差不多，您提到90年代的网络世界催生出民粹主义狂欢，对吧。然后您提到日本民族的劣根性。我想问一下，当时的网络世界他们凭什么样的根据和逻辑来主张这些。其实泰国在70年代也有过反日运动，主要是源于经济反差问题。不过当时反日情感最强烈的时候，泰国的言论也会赞美日本的民族性，说日本人很勤奋，很遵守规则什么的。只是当时的日本人不融入当地的社会，所以当时有很强烈的反日情感。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下中国的反日情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谢谢。

杨奎松 非常感谢。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但这其实是两个问题，提出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问题，我第一次听到的是在抗日战争研究讨论会上，和今天不同，不是民间，不是网络，那个时候是在90年代的下半期，网络还没太大市场。而且提出这个说法的，是来自美国的华人教授，是很有名的教授。当然，当年从美国回到中国来参加抗日战争研讨会的一批华人教授，他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看法，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会的研究氛围很大程度上被他们左右了。我们原来的研究讨论是就史论史，着重于史实的研究和论证，完全没有谈到过民族性的问题。他们逐渐地把话题引到这方面来，在他们看来，日本人和德国人不同，是不肯悔过的，完全不承认自己国家犯过错误，犯过罪。他们甚至认为过去都是对的，对外侵略也是对的。因为日本人很长时间都认为，中国人是未开化的、落后的、野蛮的民族，他们是开化的、文明的。这种宣传在史料中是触目可见的。所以，几位教授反过来认为日本人其实恰恰才是这样一个民族，根本不会认错的民族。谢谢。

刘杰 可以吗？时间已到，但最后还有一位想提问。好的，请发言。

听众 感谢刘杰老师。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的王昭晖，现在在法政大学做访问学者。我

的问题是给杨老师的，您的论文和刚刚的发言都非常地精彩。从您的这篇论文和发言中能够感受到，历史学家一方面追求历史的真实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又需要抱有“同情之理解”，不仅对于古人，还是对于我们的邻国来说。但是我相信，这两个之间是有张力的。我想请教杨老师的是，您自己在研究中，是如何来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张力的？谢谢杨老师。

杨奎松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我简单地讲。做历史研究，毫无疑问，不能脱离真实。如果历史本身依据的史实和史料不够真实，这种历史的写作或者成果肯定是虚假的。但是，历史真实在我们个人看来，就研究者我个人看来，它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以中国为例。比如我们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自然很容易看到中国人在日本侵略时的感受、牺牲和付出。并且可以据此反过来印证日本人的残酷、野蛮、掠夺和伤害。我们这样研究历史，是很容易还原某种历史真实，也就是中国人看到和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但是对另一方面，如对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仅仅基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视角，就不够了。如果我们不研究日本的历史，不换位思考日本当年为什么会这么做，包括日本人在中国所表现出的那样一种野蛮和杀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日本的劣根性吗？同样的情况，如果反过来，日本学者研究对华战争的历史，也如此操作，只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发生中日本自身的种种不得已，那么，再凶残的行为都能够用同情之理解的方法，找到不得不的原因，来得到心理的平衡和逻辑上的解释力。这就是国、族、党派冲突史研究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都用同样的努力，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冲突双方甚至是多方的历史研究。除了语言的问题、史料获取难易的问题外，光是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真正平衡地去“换位思考”。

但是，有两点我认为是史家必须要注意的，一是要相信人性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哪个民族乃至党派中每个人都是恶的。我记得我多次提到过方军的一本书：《我认识的鬼子兵》。他在中国大陆算是一个“红二代”，他父亲是抗日战争加入八路军的，对日本有很强烈的仇恨心理。但是，他始终想弄清楚日本人当年为什么那么凶残。为此他到日本学习生活好几年，而且专门去寻找那些过去到过中国的日本兵，去接触、观察和采访。他逐渐发现，那些当年在中国杀人不眨眼的“鬼子兵”，都是日本国的非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在日本过着最普通的日子，说话都和声细语，做事也是勤勤恳恳，周边邻里关系各方面都很好，既不是什么黑社会，也不是什么右翼团伙成员，更别提杀人了。但被征入军队后，上了战场，变成一个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为了让自己活下来，就变成一个要施恶的人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强调过一个观点，就是战争会把人变成鬼。

二是要相信人类社会从古到今，是处在一个缓慢进化的过程中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我们会发现每个民族都有它的所谓“劣根性”。因为每个民族其实都是从蒙昧、野蛮时代一步步进到现代相对文明的时代来的。当我们说日本当年“恶”的时候，不要忘了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国共战争和中国内部的种种野蛮杀戮。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考察、研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活下来的那些前辈时，我们同样会发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平和、善良的。问题仅仅在于，他们当年加入了不同

的党派，接受了不同的理想观和价值观，为了自己认为最高尚的理想，视对方为恶，也就变得毫不留情了。所以，以我个人的看法，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共通的人性，基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同情之理解历史的各个参与方，才可能比较真切地还原历史真相。谢谢。

刘杰

三谷老师与杨老师两位的演讲中，引出了非常重要的话题。在我们的对话中已经从各种角度探讨了许多历史事件，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历史学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历史学家与历史本身的关系。通过本场的讨论，我们对于这一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历史学家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议题，我非常期待在今天下一场以及明天的讨论中，能够结合与东南亚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探讨。

那么，第1场的内容就到此结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两位发言人，三谷老师和杨老师。非常感谢。



“竹子外交论”中的 大国关系与小国意识¹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陈玉珍)
东京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苗凤科]

1. 引言

泰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擅长外交的国家，其外交姿态经常被比喻为“迎风而弯的竹子”（Pai-Lu-Lom、Bamboo Diplomacy）。这类历史叙述主张，历代泰国领导人能够聪明地顺应不同时期的“风向”——如朝贡时代的中国、帝国主义时代的英法、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冷战时期的美国——做出灵活应对，从而在结果上使泰国成为了“东南亚唯一保持了独立的国家”。这类历史叙述助长了泰国民族主义，将泰国外交的灵活性视为泰国例外主义，并成为了讨论对外关系时惯常使用的框架。本文旨在解构这一主流外交言论，具体讨论“竹子外交论”的概要和问题点，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小国意识”及其深层含义。

2. “竹子外交论”的概要和问题点

“竹子外交论”的元叙事（概要）如下：近代以前，泰国顺应中国这一大国的风向，一直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然而，随着19世纪中叶中国势力的减弱，泰国顺应了侵入东南亚的英法两国，与包括两国在内的西方多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开始了国家的现代化。尽管泰国因势力过弱而向英法割让了一部分领土，但从结果上看成功避免了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二战爆发后，当时的披汶总理预测日本将胜利，选择顺应日本的风向与日本结盟。然而，1943年日本的颓势显现后，反日组织“自由泰”的领导人担任总理，顺应了同盟国的风向。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的1945年8月16日，泰国宣布战争期间签订的所有条约无效，包括对同盟国的宣战书，从而避免了沦为战败国。

进入冷战时期后，泰国顺应美国，避免了共产主义化。然而在1970年代，由于美军基地相继从东南亚撤退，越南被视为泰国最大的威胁。因此，泰国顺应中国的风向，于1975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1980年代迎来了泰中蜜月期。然而，自1990年代起，由于中国的风势增强，竹子外交的泰国在顺应这种风势的同时，

¹ 本文是在预定于2024年出版的《重新解读泰国外交史——摆脱“竹子外交论”》的基础上，大幅增补和修订而成。

维持了与美国、日本等其他大国的友好关系。以上就是这一历史叙述的概要 (Pavin 2012、Kislenko 2002、Pongphisoot 2016)。

也就是说，讲述了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作为较小国家的泰国如何巧妙地应对和顺应大国——中国、英法、日本、美国——的势力和威胁，也就是各大国的“风向”，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一叙述可以说是确立了泰国人对外认知的主流框架。

在这里，如果深入分析竹子外交论，可以发现其中反复传达的三大信息。首先，竹子外交论强调泰国成为“东南亚唯一一个保持了独立的国家”这一成功的结果，是泰国的独特性。也就是说，东南亚其他国家被欧美国家殖民地化，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在冷战时期被共产主义化。唯有泰国始终站在胜利者一边，保有独立，主张这是其独特性。

第二，是泰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认为泰国将国家存续、保持主权、保全领土、外国干涉最小化作为最高目标，并以实用主义、投机主义、韧性和灵活性为原则。其中，成功的最大因素被认为是泰国聪明的领导人具备预见外来威胁的前瞻性和灵活的外交手段。

第三，“竹子外交”被视为植根于泰国文化和宗教，贯穿了时代的传统外交术。细致观察可以发现，泰国的外交手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采取绥靖政策、结盟、站在胜者一边、牵制、保持中立等。然而，在这一论述中，往往不区分这些具体的技术，而是将其统称为“竹子外交” (Likhit 1974, Prapas 2000)。这种叙述模式表明，竹子外交被描述为泰国自几百年前就开始的外交传统，并作为论述现代外交史的一种方法固定下来。

第四，这一框架给各大国的形象赋予了固定观念。在这个框架中，中国在前现代时期被认为是必须叩头的朝贡大国，在冷战时期是需借助美国力量对抗的共产主义大国，1980 年代是与泰国共同对抗越南的友好大国，1990 年代后则成为崛起的经济大国。英法被视为迫使“羔羊”暹罗割让领土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狼” (Thongchai 1994)，日本是战争期间侵略泰国的亚洲强国，而美国则是冷战时期与泰国共同抵抗共产主义的盟友。通过这些固定观念的产生，强调了泰国被迫顺应“风向”，除了向大国势力妥协或屈服外别无选择。

这种外交论述隐藏了多种问题。例如，竹子外交论所指的外交手段的定义和范围模糊不清，这一论述中的历史事例是从当今人们的视角选择的，是从结果回溯过去进行正当化的“后见之明”。换句话说，竹子外交所讲述的历史观强调了成功的延续，倾向于忽略那些不符合这一趋势的偏离事例。因此，竹子外交论的历史观容易陷入将历代为取得外交成果所采取的手段和过程进行正当化的“胜者逻辑”。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场景并不像竹子外交所设想的那样，领导人奉行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灵活地制定政策。例如，虽然对大国的要求采取妥协是竹子外交的核心，但为什么泰国领导人一直拒绝中国的建交要求直到 1946 年才同意？或者，尽管竹子外交的原则是避免冲突，为什么泰国却两次与作为大国的法国交战？如果维持中立和“避免卷入大国纷争”是竹子外交的技术之一，为什么泰国在二战期间向英美宣战？虽然灵活性是竹子外交的主要概念，为什么战后泰国却在 1970 年代之前以“美国一边倒”之势如此依赖美国，以至于泰国领导人对之后美国在越南的政策转变深受冲击？如果顺应时势和适应国际秩序是泰国外交的常规手段，为什么在 1956 年，披汶总理仍然采用朝贡制度的惯例，把朋友的孩子作为“活贡品”

送给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泰国有时展示了具有主体性的行动姿态，试图成为风向本身，而不是顺应风向。而且，泰国在历史上也经历过未能成功适应世界局势剧变，导致政权崩溃的“竹裂”情况。

如上所述，竹子外交论倾向于强调成功而忽视失败，具有后见之明的特征，过度赞美了泰国外交的灵活性，简单化地将泰国视为一个整体，不过是一种简化历史的叙事。这种论述还强调了泰国的成功和独特性及其延续性，强调聪明的领导人的远见和泰国外交的灵活性，基于泰国例外主义看待泰国，从而无意识地被高举“国家、佛教、王室”旗帜的泰国民族主义所轻易利用。然而，这一论述逐渐成为一种口号，随着时间推移，其解释的合理性没有得到严格审视，成为了“默认的前提”。许多研究者也参与了这一论述的再生产，可以说它已经成为泰国外交“被发明的传统”（Kislenko 2002, Pavin 2012）。

3. “竹子外交论”的产物——小国意识

如前所述，“竹子外交论”讲述的是泰国如何巧妙顺应各大国的“风向”并取得成功的故事。笔者认为，支撑“竹子外交论”的重要因素是本文提及的“小国意识”。从弱者的立场出发，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在国际环境、对外关系、国内政治、经济、行政、军事力等方面的自身“局限”内行动，基于这一“弱小”自觉的自我认知便是本文所定义的“小国意识”。

根据人口和经济实力等客观事实，泰国常被归类为中等强国²，在“小国外交”学术领域，几乎没有研究将泰国作为案例。然而有趣的是，历代泰国领导人多将泰国视为“小国”。这种小国意识贯穿于历代领导人、媒体和普通民众的对外意识之中。领导人在政策转变时，这种心态尤为明显。以下是一些例证。

1969年进入外交部，担任过重要职务，并于2008年出任外交部长的德·汶纳在2021年评价泰国外交时说道：

“作为小国的我们生活在强风肆虐的危险世界，无法拥有‘主体性’（Agency）。“主体性”是什么意思？就是指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大国可以左右局势和自己的命运，但像我们这样的小国，在与大国的关系中，无法成为‘主体’”（Anuson 2021: 20）。

“回顾历史，1942年12月战时，日本军队与泰国警察交火时，披汶总理下令：‘不要调查真相是谁的过错，我们是小国，请耐心等待。’并决定调移泰国士兵”（吉川 1982: 381）。

此外，1955年，披汶决定将战后的泰国列入美国阵营，同时认为有必要与敌对关系中的“红色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于是派遣了“地下使节团”，将朋友的孩子作为“活贡品”送往中国，试图让周恩来总理和廖承志与其建立父子、父女般的

2 小国的定义有多种，世界银行将人口少于150万的国家定义为“小国”。按照这个定义，拥有约7,000万人口的泰国绝不是小国。

亲密关系。诸如此类，探索了与中国的各种非正式外交途径。披汶总理（当时）的动机记录如下：

“过去，我们这些小国将统治者的孩子送往中国，以表示对皇帝的忠诚和奉献。（中略）作为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泰国的存续、完整性和独立性，需要依靠让一个外国恶魔对抗另一个恶魔的传统能力”（Sirin 1994：36-37）。

1978 年，担任“地下使节团”秘书的 Karuna Kusalasai 在一次采访中解释了派遣使节团的必要性：

“我们是小国，因此必须适应局势的变化。20 年前，大多数泰国人可能认为与中国建交是不合适的。然而，我们始终坚信，泰国无法成为中国的敌人”（Karuna 2002: XII）。

此外，在继任披汶政权的沙立政权担任驻美大使、外务大臣，并在 1980 年代继续担任外交顾问的 Thanat Khoman 评价泰国外交时说：

“泰国既不是大国，也不是中等强国。泰国是小国。（中略）因此，我们必须现实一些，（中略）追求符合时机和能力的政策”（Thanat 2016：37-38）。

继任沙立政权的他依总理在 1967 年呼吁继续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必要性时也使用了“泰国是小国”这个理由：

“我们自知自己是小国。我们缺乏人力和武器，单凭我们的力量，无法抵抗比我们强大的共产大国的侵略”（Thanom 1967: 25-26）。

这种心态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导人中，在 1970 年代，也渗透到批评政府亲美路线的左派知识分子中。例如，代表左派知识分子的兰甘亨大学新青年俱乐部批评在泰国设立美军基地时说：

“泰国的美国军事基地，（中略）象征着一个独立小国的国耻。我们期望大学生们团结起来，认真并持续地将美军基地驱逐出泰国。这是大学生在 1973 年应该履行的义务，这一义务将永远持续到成功为止”（Praesai 1973：32）。

而且，1989 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发言人 Suvit Yodmani 表明泰国政府态度：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停止暴力行为，但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无法干涉。泰国是小国，无法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Matichon Chapokit 1989：64）。

如此，当时的泰国政府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虽然作为邻国表示关切，但身为小国的泰国始终坚持不批评中国政府的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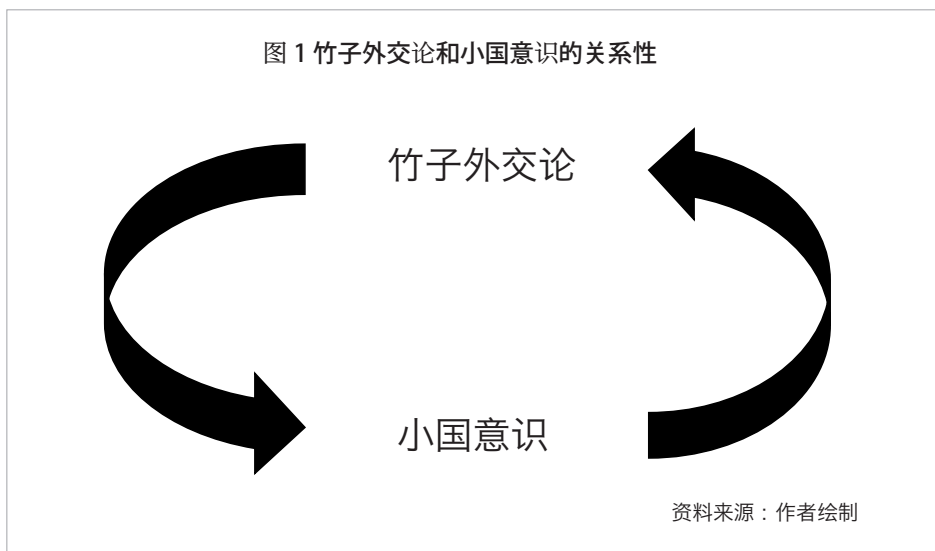
2014至2019年期间，从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小国意识。2019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泰国时，在关于两国合作的会议结束后，巴育把泰国比作蚂蚁，向李克强说：“小蚂蚁也能帮助百兽之王的狮子或大象”，强调了泰中友好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小国意识超越了时代和政治立场，甚至在持相反思想的不同行为者之间也普遍存在(例外情况见后述)。在历代泰国领导人、媒体和普通民众的观点中，贯穿始终的是这种“小国意识”。各方行为者无意识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从意识到必须在国际环境、对外关系和国内局势方面的“局限”内行动的“弱小”自觉出发，来理解世界局势。

随着意识形态和时间的推移，被视为“大国”的国家不断更替，但大多数情况下，各类行为者总是通过“小国意识”这一参照轴来寻找友好的大国，并回避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大国。正如对外认知是自我认知的延伸和反映，与大国接近与回避的过程反过来又促成了“自己是小国”这一认知的再生产，因此他们越发坚信不疑。风来了就必然弯腰的“竹子外交论”及其信奉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产物。“泰国是小国”的“小国意识”是被构建和传承下来的自我认知，而“竹子外交论”则是由这种小国意识所支撑的论述。

换言之，主张泰国应顺应风向的竹子外交论，立基于泰国是必须顺从大国的“小国”这一前提。同时，通过再生产竹子外交论，无意识地接受了小国意识这一前提，并增强了小国意识的说服力。小国意识既是支撑竹子外交论叙述的前提，也是其结果。

图1 竹子外交论和小国意识的关系性



当泰国面向中国、英法、日本、美国等大国时，自觉是小国，但当面向老挝、柬埔寨等邻国时，自认为是能合并周边王朝的大国。这种摆脱小国意识和竹子外交，确立能够成为邻近地区领导者身份的可能性，可以从以下历史实例中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激发泛泰运动并讨论泰国“大国化”的披汶政权(1938-1944)；让泰国在柬埔寨冲突的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担任中南半岛领导者的差猜政权(1988-1991)；推进成为东南亚地区领导者方针的他信政权(2001-2006)。因此，“泰国=小国”这一观念，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流动且相对的自我认知。

然而，即使主张“泰国 = 小国”是一种认知而非真理，也不意味着这种形象没有力量。自我认知及其反映的他者形象在左右外交行动上是非常重要的。Thanat 的“泰国既不是大国，也不是中等强国，而是小国”这一认知，以及“竹子外交论”至今仍然是有力言论，这表明，泰国至今的外交政策多是从自身为小国的“局限”出发。相信这种局限，使得“必须现实，追求符合时机和能力的政策”（Thanat 2016：37-38）容易被视为泰国唯一的出路。

外交政策更多地受各行为者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而非世界“本来面貌”的影响。“世界如你所见”这一名言不仅适用于个人世界观，也适用于国家层面的外交政策。外交判断和人的认知密不可分。

4. 小国意识的含义

“竹子外交论”立基于“尽管遭受了来自大国的各种损害，但小国泰国通过巧妙顺应风向，从各种危机中幸存下来”这一前提。因此，这个叙事无意识地培养了“胜者意识”、“小国意识”和“受害者意识”。

泰国“能够在各种危机中生存下来”的部分强调了幸存者的胜者意识，并通过突出领导者的英雄形象而易于助长民族主义。同时，“从大国那里受到了各种损害的小国”这一部分暗示了泰国“非主体性的小国”，“弱小者”，“不得已的受害者”的立场。实际上，泰国在多个场合对大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也对邻国扮演了施加伤害的加害者的角色。然而，小国意识缩小了国家应有的主体性和责任感，受害者意识则使得加害者的一面被遗忘。

竹子外交论的元叙事通过将帝国主义时代的英法描绘为无情的帝国主义者，而暹罗为小国，模糊了暹罗作为帝国主义者的一面，如兼并柬埔寨王国和摧毁老挝王国等事实。冷战时期，泰国政府通过将自己描绘为陷入危机的小国，将越南描绘、宣传为嗜血的狰狞恶魔，来正当化对被贴上“共产主义者”标签的人们的残酷镇压。同时，泰国干涉老挝内战，并向美国提供基地以屠杀中南半岛居民的暴行也被掩盖了。1980 年代，通过将越南描绘为嗜血的侵略者，泰国证明了支持在柬埔寨进行大屠杀的波尔布特政权的必要性，并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这种历史上的有意遗忘数不胜数。

换言之，通过唤起外部帝国主义者、恶魔和侵略者等他者的存在，泰国自己非但不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者、恶魔、侵略者，反而被认为是受其威胁的无辜受害者和弱者的这一默认前提被广泛接受。结果，身为弱者的一面抹杀了作为加害者的一面，历史上的冷酷一页被作为脚注，掩盖在“竹子外交论”之下。

5. 结论

本文试图指出“竹子外交论”的问题，揭示其背后的“小国意识”，并提出其含义和危险性。大国意识、强国意识，可以从战前宣扬领土扩张主义的日本、如今进入南中国海并不断增加国防预算的中国、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的案例中看到。这

明显是一种危险的心态。然而，对于泰国来说，“小国意识”也是一种强大到足以暴力行为赋予正当性的心理。尽管与大国意识相比破坏力有所不同，但同样绝非健康的心态。正如中国历史中的“百年国耻”、韩国历史中的“受害者意识民族主义”（林 2022）、日本历史中的“受害者意识”等相关讨论广泛存在，从弱者立场出发的心态似乎并非泰国独有。

参考文献：

- Anuson Chinvanno. (2021). *Thai Diplomacy: In Conversation with Tej Bunnag*.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 Karuna Kusalasai. (2002). *Khana Thut Taidin Su Pakking* [秘密使节团去北京]. Sukkhaphapchai
- Kislenko, A. (2002) “Bending with the Wind: The Continu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ai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57 (4), 537-561. <https://doi.org/10.1177/00207020020570040>
- Likhit Dhiravegin. (1974). “Thailand’ s Foreign Policy Determination”. *Sangkhomsat*, 11(4), 37-65.
- Matichon Chapokit. [民意报 (Matichon)] . (1989). *Kawao Na Tian’ anmen* [天安门广场的危机] . Matichon.
- Pavin Chachavalpongpun. (2012). “Thailand: the Enigma of Bamboo Diplomacy.” In Mckercher, B.J.C.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Routledge, 204-214.
- Pongphisoot Busbarat. (2016). “Bamboo Swirling in the Wind: Thailand’ s Foreign Policy Im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8 (2), 233-257. <https://doi.org/10.1355/cs38-2c>
- Praesai Namdamrong. (1973). “Chao Mahawitthayalai Kap Thanthap Amerikan Nai Prathetthai” [大学生与在泰国的美军基地] in Chomrom Khon Runmai (ed.), *Mahawitthayalai Thi Yang Maimi Khamtop* [[尚未找到答案的大学] . Bopit.
- Prapas Thepchatr. (2000). *Nayobai Tangprathet Khong Thai: Chak Yuk Wikrit Settakit Su Sahatsawat Mai* [泰国的外交政策——从经济危机时代到新千年] .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 Thanat Khoman. (2016). *Riroem Kotang Samakhom Prachachat Echiatawan-okchiangtai (ASEAN)* [成立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的契机] . Thammasat University Press.
- Thanom Kittikachorn. (1967). *Kanbanyai Bang Rueang Doi Chompon Thanom Kittikachorn* [他依·吉滴卡宗将军的演讲选集] . Office of the Prime Minster’ s Printing Workshop.
- Thongchai Winichakul.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irin Phathanothai (1994) 《龙珠 (上)》(田村志津枝译) 讲谈社
- 吉川利治 (1982) 《泰国披汶政权与太平洋战争》《东南亚研究》19 (4), 363-387
- 林志弦 (2022) 《受害者意识民族主义：跨越国界的“记忆”之战》泽田克己译 东洋经济新报社

第2场

报告 2



日本近代史与东南亚 —围绕20世纪30年代的评价

吉田纯巳

三井文库

[原文为日语。翻译：武 潇潇]

1. 引言

本报告通过对时代背景和学界潮流的回顾与总结，介绍战后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对日本与东南亚¹关系的论述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教科书中出现了“东南亚”一词（所指地区与现在基本相同）³，但该地区过去一般多以“南方”、“南洋”来表述⁴。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设有“南洋史讲座”，由此可见“南洋”一词曾被广泛使用。当时，该讲座作为日本唯一的“南洋史”专业课程，成为战前东南亚研究与教育的一个据点⁵。由此亦可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东南亚在日本的关注度并不高。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地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伴随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伪满洲国的成立和1933年日本退出联合国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日本与中国、苏联的紧张关系持续恶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消除苏联的威胁，1936年8月，日本决定将“外南洋”，即进军东南亚定为国策（“国策的基准”）。其后，因自1937年7月爆发的侵华战争长期化和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直面着资源危机的日本将1939年9月欧洲爆发的全面战争视为进军东南亚的天赐良机（1939年2

1 本报告中提到的“东南亚”，指的是包括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菲律宾和文莱在内的区域。

2 在日本史上，“近代”一词曾指自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但现在其范围因论者而异，有时也包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本报告中，笔者将自明治维新至与各国签署赔偿协议的1950年代为止称为“近代”。另外，有关战后日本近代史研究足迹的英语著作有Fumitaka Kurosawa, *Historical Perception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War Responsibility: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in Postwar Japan*, 《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纪要》75, 2014。

3 清水元《亚洲海人的思想与行动》(NTT出版, 1997)。

4 “南方”、“南洋”所指的地理范围因时代和使用者而异，其含义所指可包括台湾、华南(福建)、南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印度的国家和地区中的一个或多个。

5 最初担任讲座的是村上直次郎(1868-1966，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出身)，他在日本政府的指导下，从事有关日本的海外史料收集和台湾史编纂工作。村上的专业不是台湾史，而是日欧关系史，他精力充沛地收集国外留存的16、17世纪与日本相关的史料，将其翻译出版，以巴达维亚等东南亚港口城市为结点，研究日本与欧洲的接触和天主教的历史研究。与此相反，在村上身边担任助教的岩生成一(1900-1988年，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科出身)虽然是国史出身，却亲切地给学生讲授东南亚史研究的知识。中村孝志“台北帝大时期”，大江志乃夫等编《岩波讲座近代日本与殖民地》第4卷，月报(岩波书店，1993年)。

月占领了海南岛)。1940年7月,政府以确立自给自足态势为目的,在决定对东南亚行使武力的同时,外务大臣发表了将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此后的外交方针,其覆盖地区包括台湾、朝鲜、桦太(库页岛)、关东州(旅大租借地)、伪满洲国,以及中国和东南亚。1945年9月,日本签署投降协议战争结束后,根据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对东南亚各国⁶负有赔偿责任。各国于20世纪50年代签订了赔偿协议,约定了由日本支付赔偿金、提供经济贷款和经济合作(提供劳务、提供生产物等)。

以上虽是极其偏重于政治外交史的梳理,但作为近代日本与东南亚的主要接触点,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点应该没有错:(1)南进(论)、(2)“大东亚共荣圈”≈军政、(3)战后赔偿。即,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经济扩张,1940年以后高举“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事进攻和占领,以及战后赔偿。虽然这些都是关系到现代历史认识的重要课题,然而由于篇幅有限和报告人的专业关系,在本报告中,将主要对(1)的研究史进行整理⁷,并注意与(2)的衔接。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对“南进(论)”一词进行说明。

所谓“南进论”,就是提倡并鼓励日本进军南方,强调其重要性和必然性的思想。19世纪后半叶,德、英、法、美等欧美列强向太平洋扩张其势力范围⁸,在此历史背景下,“日本要想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实现通商立国,就必须向南方发展”这一主张在日本国内相继登场⁹。但是,在19世纪,当时所设想的移民地和贸易对象主要是西南太平洋的岛屿,可以说直到1910年,进军东南亚几乎未成为主题。但是,陆军考虑到俄国的威胁,提出了“北进论”,认为必须确保朝鲜和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为此需要扩大军费开支)，“南进论”则与之对立(海军扩张论≈贸易立国论),引起了热议。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受委托而统治南洋群岛¹⁰,在实际获得该托管地后,这些岛屿被视为通往东南亚岛屿这一“宝库金藏”的“垫脚石”,此后,“南进论”的射程正式扩展到东南亚。

“南进论”一词所表达的主义主张,既有带有领土野心的一面,亦有提倡经济扩张的部分,其各自也存在设想与手段的差异。在战后的研究中,追溯这些“南洋论、南进论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被认为是探寻日本对东南亚各国关系特质的重要视角”¹¹。这既意味着,与战后即刻开始累积具体局面实证研究的中国研究相比,近代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直接接触的场景较少,同时亦可窥见存在一种前提,即鼓吹南进思想与日本最终走向军事侵略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与思想上的“南进论”相对,“南进”一词指的是在实践上向南方扩张。明治时期以来,东南亚是日本人农业移民和商业移民的目的地之一¹²,随着国内产业的发展,贸易公司在各地设立分公司,资本以开发农业、林业、矿业为目的进入东南

6 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但老挝和柬埔寨放弃了赔偿请求权,采取了由日本提供经济技术协助的形式。

7 基于本报告将被翻译的特殊情况,文献名称的记载将降至最小,部分只记述研究者的姓名。公开的研究成果的详细内容请根据姓名查阅。安达宏昭、和田春树等编著的《日本的东南亚、南洋进军》《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 第4卷》(岩波书店,2011)是2010年之前的研究整理。

8 1874年英国将斐济群岛编入殖民地。1887年法国开始逐渐殖民中南半岛东部。1899年,德国和美国以平分萨摩亚群岛的形式将萨摩亚群岛编入殖民地。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

9 其代表人物有《自由贸易日本经济论》(1878年)的作者经济学家田口卯吉,以及出版了《南洋时事》(1887年)的志贺重昂等。

10 由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组成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原属德国)。

11 正田健一郎“前言”,正田健一郎编《近代日本的东南亚观》(亚洲经济研究所,1978)。

12 然而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数量与东亚,甚至与美洲大陆相比也是十分有限的。

亚。“南进”一方面指个人或民间企业向南方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指1940年以后日军的进驻和侵略。这种用法也强化了上述前提。

2. 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南进论”的定位

那么，日本近代史研究具体是如何在各个时代背景中评价和审视东南亚以及南进(论)¹³这一现象的呢？

战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以阐明战时日本军政的实态及其历史评价——作为东南亚各国独立的前史——为讨论焦点，而引领研究前线的是欧美研究者¹⁴。当时日本正处于与东南亚各国交涉并缔结赔偿协定的阶段¹⁵，日本研究者很难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日本占领下的东南亚¹⁶(当然，也很难断言冷战期间欧美研究者的日本军政研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是自由的)。1959年，早稻田大学内的研究所出版了《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军政研究》一书¹⁷。该书出版的理由有二，首先欧美学者要求日方发表相关资料，其次该研究获得了洛克菲勒财团的援助。虽然该书收录了国内各地的公文资料、当地的日语报纸资料和访谈的成果，但日本研究者对日本、东南亚史的研究并未正式展开¹⁸。

此外，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中，首先从“对美(英荷)战争之路”或战争责任的观点出发，对开战之前的政治指导、政军关系和对美外交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在涉及东南亚的问题上，虽然首先分析了入侵法属中南半岛(对美开战前史)的政治过程，但并没有直接聚焦于东南亚本身¹⁹。另外，在经济史的实证研究中，20世纪50年代主要关注战前日本资本主义论战，重点放在幕末和明治维新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阶段，随后，60年代则研究了更早的工业革命时期。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才变得紧密，因此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东南亚并未成为日本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战前、战时有关东南亚的史料(政府、军部公文、相关人员回忆录等)的公开，开辟了实证研究的道路。同时，1975年矢野畅出版

13 以下，为了避免繁琐，省略“”。

14 M. A. Azl, *Japan's colonialism and Indonesia*, The Hague, M. Nijhoff, 1955, W. H. Elsbee,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 nationalist movement, 1940-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H. J. Benda, *The Crescent and the Rising Sun: Indonesian Isla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Hague: Van Hoeve, 1958等。关于战后初期的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史的研究，参考以下著作：后藤乾一《昭和时期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劲草书房，1986)、中野聪《东南亚的占领与日本人》(岩波书店，2012)。

15 依次为缅甸(1954年)、菲律宾(1956年)、印度尼西亚(1958年)、南越(1959年)。此外，与老挝、柬埔寨、泰国的各种协约也于该时期签订。

16 20世纪50年代，“日本军在南方做了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被认为是极其愚蠢的”。另外，尽管欧美研究者在1945年8月17日(独立宣言)以后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经济、社会中“发现了日本军政冲击的余滓”，“1955年当时的日本对于相关此类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序言”，早稻田大学大隈纪念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军政研究》(纪伊国屋书店，1959)。

17 同上。

18 1958年，应经济界和学术界之请，由通商产业省主导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正式开始了对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关系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从通商产业省主导的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该研究机构是为了扩大亚洲贸易和经济开发服务，以现状分析为研究的中心，不过，该研究所积极收集的部分资料，包括南方军政资料(岸幸一的收藏)在内，至今仍被活用于日本近代史的研究。1963年在国立大学京都大学内设置了东南亚研究中心，培养了众多日本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者(现在的东南亚地区研究研究所，即CSEAS)。

19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开战外交史6(进军南方)》(朝日新闻社，1963)。

了《“南进”的系谱》(中央公论社),将明治以后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确立为一个研究主题²⁰。即便在今日,对战前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仍是本必读书。研究东南亚出身的矢野(1936年生),自1970年前后开始发表近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文章,继《“南进”的系谱》之后,又出版了《日本的南洋史观》(1979年)。矢野认为,明治时期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主要是“庶民的自然流出”,言论空间中的“南进论”也“基本上是善意的思想”,“带有和平主义的色彩”。但是,1936年8月,政府将向南方扩张势力作为国策而采取的“南进论”,是一股“由上而来的人为操纵”的热潮,企图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军事扩张——最终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一种“恶”的思想。

昭和时期南进论是支撑国策的意识形态,身为东南亚研究者的矢野对此强烈批判,其背景是他所处时代的国际形势。

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正式向东南亚各国输出资本,各地官民都对日本的“经济统治”、“经济侵略”产生了反感。矢野出版《“南进”的系谱》的前一年,也就是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出访东南亚各国时,各地发生了示威游行,矢野写道,他亲身体验了其中的雅加达暴动,这也是《“南进”的系谱》出版的契机之一²¹。矢野关注的是眼前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引发的反日情绪,以及其背后的日本人的“精神”。

《“南进”的系谱》和《日本的南洋史观》都是一般类书籍,在实证面上也存在问题的,但都对近代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提出了多个论点²²。可以说,这为之后的史学研究者从多角度论述近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奠定了基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其中带有强烈的偏见。

矢野一方面强调明治时期的南进论与昭和时期的南进论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另一方面,以通商为目的的南进论在大正时期被炒的热火朝天,在杂志等媒体上出现了“南洋热潮”,矢野又将此评价为为昭和时期“作为国策的‘南进’”提供“实际的力量和群众基础”的“伏笔”。然而,矢野所提到的作为“国家战略的‘南进’”的内阁决定、对北部法属中南半岛的侵占、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对南部法属中南半岛的侵占,这些或是通过同英美外交谈判,或是结合了中国大陆战局而做出的高度政治判断而导致的结果。因此,将大正时期“南洋热潮”视为这些事件的伏笔似乎略显牵强。与此同时,矢野指出,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在当地是微不足道的,与对中国大陆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存在明显区别。总之,矢野的著作一反其主张,未能合理地阐明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与之前通商立国政策中的南进论之间的关系。由于过于关注探讨“近代日本的邪恶历史”中的“‘南进’这一不光彩现象”的“系谱”,矢野在论述中不得不做出一些跳跃性的论断²³。

20 关于该书以及矢野的研究意义可参见清水元的“解题”(《“南进”的系谱 日本的南洋史观》,千仓书房,2009),本报告也参考了该研究内容。

21 《“南进”的系谱》前言。

22 明治初期东渡东南亚的被称为“唐行小姐”的日本妓女、南进论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当地商业和移民社会的实际情况、海军的南进论等。

23 虽然矢野没有明确指出,但1936年8月的“国策基准”决定了日本侵略南方之路的评价,应该是以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内容为前提的。清水元在矢野之后又对南进论进行了研究,他的论点也强调了昭和时期对南方的进攻与之前的南进论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继承了矢野的问题意识。

3. 对于日本·东南亚经济关系的关注

之后，在聚焦于南进的研究中，有观点认为，日本向东南亚扩张是出于为了维持已成持久战的侵华战争的战力而确保资源（石油）的现实需求（大畑笃四郎）；还有观点指出，在1936年8月发表“国策的基准”之时，并没有构想出具体的南进政策（波多野澄雄），因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试图从大正时期和30年代的南进论中找寻日本对南方军事进攻的伏笔和起源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出现了将矢野未曾注意到的民间经济发展纳入国际关系中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战间期研究的迎来鼎盛时期的日本经济史领域中，有研究指出，1931年12月禁止出口黄金后，由于汇率下降和工资降低，日本棉制品对东南亚的出口急剧增加²⁴，成为日本迅速从世界经济大萧条中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还指出因东南亚采取了防止日货流入的遏制措施，从而提高了日“满”“支”经济链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大了向华北的资本进军²⁵。也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变化，在贸易和财政结构上与日本的战时经济以及进军大陆有关。这一评价（以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列宁为前提）表明，对东南亚关系和对华关系（侵略大陆）是通过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同一时期，着眼于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特别是随着日本的人侵而产生的经济摩擦——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推进²⁶。这些研究不仅探讨了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动向，还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当地资本和商人的利害关系纳入视野，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试图将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入侵放在对英美荷的关系中去理解，这一点与上述日本经济史研究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即“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爆发、直面资源危机之时，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极其动荡不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对将日本向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定位于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中这一点持保守看法。Ian Brown 这样说道：“从太平洋战争原因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日本与欧美各国在东南亚的通商摩擦实际上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同时也可以认为这是附带因素，或者还可以认为在30年代末期日本和欧美各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中，相对而言这不算是重要因素²⁷”。

当然，日本商品通过日本贸易公司和日本海运出口到东南亚，再由日本商人在当地销售的这种有组织的贸易方式让殖民政府警惕日本怀有政治野心。其中对立最为激烈的要数与荷属东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而就此而展开的外交交涉也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关系在以后也得以维持（日本并未在经济上被孤立）²⁸。特别是，强调日本与印度、日本与荷属东印度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笼谷直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外关系的恶化是“政治”问题，他将通商问题从其中分离出来讨

24 这点已有研究指出。林健久、山崎广明、柴垣和夫《讲座 帝国主义研究》第六卷（青木书店，1973）。

25 桥本寿朗《大恐慌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

26 打头阵的要数村山良忠的《第一次日兰会商——日本进入温和经济的转折点》、清水元所编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诸相》（亚洲经济研究所，1986）。此外，以杉山伸也、Ian Brown为首的日本、英国、菲律宾、新加坡的历史学研究者开展了共同研究。其成果作为杉山伸也、Ian Brown编著的《战间期东南亚的经济摩擦——日本的南进与亚洲、欧美》（同文馆）于1990年出版，其后1994出版了英文版：S. Sugiyama and M. C. Guerrero (ed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Interwar Period*, New Haven: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94（部分章节内容不同）。

27 Ian Brown“结语”，前注《战间期东南亚的经济摩擦》第293-294页。

28 前注，村山。笼谷直人《亚洲国际通商秩序与近代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论²⁹。这是对 Ian Brown 持保留意见的经济摩擦的评价的回答之一，然而将东南亚的出口攻势和由此产生的矛盾放在国际收支和资本动向中考察的同时，却未将着眼对华关系（进入大陆）的联动的日本经济史研究纳入其考察范围，关于这一点目前仍没有进展。

另外，对日本企业在南方的商业交易、投资等进行个别具体探讨的日本经济史学家的共同研究³⁰指出，军事入侵以前的企业活动与入侵以后受命于政府、军队有关，但没有提及1930年代的经济活动与军事、政治活动的直接关系³¹，倒不如说，经济活动的瓶颈导致日本在1940年以后动用武力才是其议论的主旨。近年来的研究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³²。综上所述，虽然否定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与1940年以后的军事入侵的连续性以及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就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和欧美关系的影响的有无这一点，可以说尚未形成一致见解。但是关于后者的研究已经停滞了20多年。

4. 结论

实际上，报告人所提到的“1930年代日本向东南亚的进军”，无论是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还是在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中，都是处于支流地位的论题。尽管如此，在解释为什么要在本报告中提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的“主流”做一个非常概括的介绍。

在矢野畅发表南进研究的同时，与矢野同样专攻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后藤乾一也对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到被占领期间的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³³。由于本报告聚焦于经济问题，因此未提及后藤的研究，但他的研究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和东南亚研究的水平。为了捕捉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双向影响，后藤不仅利用了日本史料、荷兰史料、印度尼西亚史料，还对日本人和外国人进行了采访调查³⁴。同后藤一样，对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特别是日本军政和印度

29 笼谷是进行“亚洲交易圈”研究的论者之一，以杉原薰所提出的“亚洲间贸易(inter-Asia trade)的讨论为前提，强调东南亚华侨、印侨的商业网的作用，这也是维持通商秩序的评价背景。“亚洲交易圈”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研究潮流。相对于以欧洲的优势地位和非欧洲地区被动应对的“西方中心主义”为前提的现有经济史，主张亚洲地区存在着相对独立于欧洲世界的经济秩序。伴随着“全球历史”的兴起，“亚洲间贸易”所领导的“亚洲经济史”这一框架，自Kenneth L.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2000年)以来，现已固定下来。

30 正田康行编《南方共荣圈：战时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支配》（多贺出版，1995）。

31 关于这一点，安达宏昭在《战前日本与东南亚——从资源开发、调配的角度》（吉川弘文馆，2002）一书中，从资源开发、调配的角度，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企业进军东南亚的外交交涉，（也许与作者最初的预测有所不同）表明了因受限于当地政治经济和法规的限制，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企业进军是较为温和而有限的。

32 河西晃祐《帝国日本的扩张与崩溃——走向“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发展》（法政大学出版社，2012）。

33 前注，《昭和时期日本与印度尼西亚》，除此以外，在论文集等中也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其论点涉及多个方面，如日本陆海军“南进论”的政策化历程；亚洲主义团体与“南进论”的衔接（但不同于矢野的论点）；印尼日本人的意识和地位；日本在印尼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等。后藤将战前日本的“印度尼西亚观”归纳为经济补充论、日本盟主论、对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优越感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这三种观点共同构筑了20世纪40年代的理论。后藤至今的研究成果被整理出版于：后藤乾一《日本的南进与大东亚共荣圈》（Mekong出版社，2022）。

34 这与战后以来日本近代史的研究潮流相结合，可能成为“日本近代史中的东南亚”研究主要由东南亚专业的研究者主导的原因之一（不懂当地语言的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的参与不积极）。

尼西亚社会进行了实证研究的还有仓泽爱子³⁵。继战后研究的第一代研究者明石阳至之后，马来研究的原不二夫、中原道子，泰国研究的吉川利治，菲律宾研究的早濑晋三、中野聪，缅甸研究的根本敬等人，引领着近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尤其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日军、日本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赔偿，乃至战后日本社会与东南亚社会的关系反复进行了实证研究，还指出战后日本存在的“解放史观”——即战前日本“解放”了欧美宗主国统治下的东南亚各国，并引导其走向战后独立——这一历史认识的错误³⁶。这与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在面对日中、日韩、日台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对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粗略地说，作为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的核心问题，“大东亚共荣圈”研究可以说是从两个主要方向进行分工的：一方面是从当地社会角度描绘日本军队支配实际情况的东南亚研究者，另一方面是从政治领导和政策决策分析日本政府在战时外交和战时经济政策的日本研究者³⁷。而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更何况，在即将迎来战后 80 周年的今天，至少在日本研究领域，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正式转向战后，对东南亚关系的研究也不例外³⁸。

然而，战前研究并非没有留下课题和进展的可能性。自 21 世纪起，聚焦于移民、移动的研究不断涌现，关于东南亚，正在进行新的研究积累，旨在弥合以往的分工³⁹。此外，2010 年出版的《岩波讲座 东亚近现代通史》⁴⁰ 不仅涵盖了东北亚，还涵盖了东南亚、南亚以及远东西伯利亚。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被视为“东亚”的中国、朝鲜、台湾、日本的近现代史，应该着眼于更为广泛的地域关系，这在不以“全球历史”标榜的研究者中也达成了共识。

报告人认为，“一国历史”或“全球历史”等标签并没有特殊的意义。通过关注各国之间或帝国内部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动及各主体的存在，（与积累了大量实证研究的对华关系相比）近代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的研究仍留有充分深化的余地⁴¹。本报告以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为例进行了探讨。

35 仓泽的著作不胜枚举，在此举出仓泽爱子的《资源的战争——“大东亚共荣圈”的人流、物流》（岩波书店，2012）。

36 如仓泽爱子所编的《东南亚史中的日本占领》（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7）。

37 政治外交史研究中有波多野澄雄，经济史的山本有造、原朗等。

38 八代拓《兰印的战后与日本的经济史——岸·池田政权下的日本企业》（晃洋书房，2020）等。

39 社会学家兰信三的一系列编著等。只是现阶段各论甚多，未形成像日本近代史领域的盐出浩之《越境者的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这样的系统研究。关于南方移民的最新研究，可参考大久保由里的著作。

40 和田春树、后藤乾一、木畑洋一、山室信一、赵景达、中野聪、川岛真所编的《东亚近现代通史》全 11 卷（岩波书店，2010-2011）。

41 平井健介的《砂糖帝国》（东京大学出版会，2017）聚焦于爪哇糖和台湾糖之间的关系，描绘了日本殖民地经济的一个侧面，试图填补日本殖民地经济史和亚洲经济史之间的鸿沟。



韩国对东南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尹 大荣

首尔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1. 引言—8世纪~19世纪初—

朝鲜半岛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是何时建立, 如何形成, 又缘何开始受到关注的? 两地虽然在传统时代未有过正式交流, 但其联系大约可以追溯到 8 世纪。据估计, 新罗僧侣慧超 (704-787) 于 719 年离开故国, 前往唐朝, 他在广州遇见了来自南印度的密宗僧人金刚智 (Vajrabodhi, 671-741), 受其鼓励 723 年离开广州, 途经日南¹、阁蔑、苏门答腊 (Sumatra)、裸形国²等地, 前往印度求法巡礼。

此后, 朝鲜半岛有关东南亚的信息主要是通过中国传入进来的。新罗时代的文人兼学者崔致远 (857-?) 于 868 年前往唐朝, 并在 880 年代初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他在 884 年回国后, 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开始在《桂苑笔耕》(886) 中介绍“交趾”的地理边界以及唐代“安南都护府”的历史。自高丽时代 (918-1393) 及朝鲜时代 (1392-1910) 以来, 关于南越的历史、风土、后汉时期马援对越南的远征、征 (Trung) 姐妹的抗争活动、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安南”的统治方式、明朝对越南的征战等历史事实逐渐为人所知。

两国之间非正式的接触形式, 主要是越南人在航海过程中偶然漂流到朝鲜半岛, 或朝鲜人漂流至越南。12 世纪和 13 世纪, 分别有来自高丽的旌善李氏和花山李氏因漂流而定居江原道和黄海道, 他们的家谱中记录着当时的情况和定居的过程。据推测, 17 世纪后半, 一些来自济州岛的人在前往汉阳进贡马匹的途中, 漂流到了越南中部会安 (Hội An) 附近的库拉岛 (Cù Lao Chàm)。

在朝鲜时代, 派往北京的使节通过与外国使节, 尤其是越南使节的交流, 了解了对“篡夺”王朝的中方反应、宾贡科出身的士人以及特产等信息, 并在回国后向朝廷汇报抑或记录在个人文集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鲜中期的文臣李睟光 (1563-1629), 他三次访问中国期间, 不仅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还与安南、琉球、暹罗的使节广泛交流, 从而拓宽了他的国际化视野。他在《芝峰集》中详细记录了与越南黎朝 (Lê 朝) 使者冯克宽 (Phùng Khắc Khoan, 1528-1613) 的会晤,

1 在慧超的五言律诗《在南天路》中, 有这样一句: “日南无有雁, 谁为向林飞。”这里的“日南”指的是现在越南的从广平 (Quảng Bình) 到岘港 (Đà Nẵng) 的地区。

2 “阁蔑”被推测为“高棉” (Khmer) 的音译, 而意味着当地人赤裸的“裸形国”则被推测为今天的马来半岛西北岸。参考: 高柄翊, 《对慧超的印度航路的考察》, 《佛教与诸科学》, 首尔: 东国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第 876 页, 882-885 页。

写了他是如何通过交谈深入了解安南风俗和制度的。《芝峰类说》的第二卷“诸国部”介绍了安南、暹罗、真腊等东南亚国家的详细信息,不仅从自然环境、经济状况、历史、文化及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描述,同时还强调了信息的实用性。

李睟光的研究成果对18世纪后半叶的朝鲜使节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1766年的洪大容、1777年的李押和1780年的朴趾源等人留下了关于安南的朝贡、地理、文化、自然风光和物产的详细记载。1790年,徐浩修批评了篡夺黎朝政权的西山(Tây Sơn)政权。19世纪之后,随着新兴阮朝(1802-1945)的出现,使行团开始将“安南”改称为“越南”,介绍了这一王朝的建立过程及其与柬埔寨和泰国的历史文化关系。这种介绍还扩展至老挝、缅甸和菲律宾。被认为是李睟光实用主义学术传人的李肯翊(1736-1806)、丁若镛(1762-1836)、金正喜(1786-1856)和李圭景(1788-1856)等人,也介绍了来自中国宾贡科的安南士人、文顺得的安南漂流记、南越和交趾被中国将军征服的历史、中国官员在安南推广的农业技术、爱州的丝绸、稻种、养蚕技术、浙江和福建的安南海盗,以及12至18世纪越南的历史和参考文献。

2. 危机意识引发的变化—19世纪~20世纪初—

而之后,对东南亚的关注从第一、第二次中英战争(1839-1842, 1856-1860)转移到了当代的政治议题。尤其是1874年使节团报告的越南殖民化和朝鲜外交局势的危机意识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1880年代初,派往日本的修信使金弘集(1842-1896)基于黄遵宪的《朝鲜策略》(1880)等资料,关注越南面临的危机,警惕由日本引发的仁川开港问题。派往中国的营建司金允植(1835-1922)也介绍了越南的国际局势,对朝鲜的未来表示担忧。此外,知识分子尹致昊(1865-1945)解释了由清法战争引发的甲申政变。

在这一时期,越南的局势与朝鲜的当前问题紧密相连,人们开始比较已灭亡的越南和缅甸与保持独立的泰国的情势,也探讨了甲午更张和甲申政变时期日本与法国对待朝鲜和越南的策略。同时,大韩帝国时期的《独立新闻》在1899年指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激发了法国殖民扩张的欲望,其首要目标就是越南。

日俄战争后,越南独立运动家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在梁启超(1873-1929)的协助下,在上海出版了《越南亡国史》(Việt Nam vong quốc sử, 1905),该书在韩国广受欢迎,到1906年,甚至发布了韩语汉文混合版和韩文版。越南的“亡国”悲剧引起了韩国独立运动者极大的关注,成为首例越南相关历史书被翻译并在韩国社会引起广泛反响的书。尽管1909年起日本殖民政府禁止了该书的出版和销售,但《越南亡国史》在国内外侨胞中依然有着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对东南亚,尤其是对越南的兴趣愈发浓厚了起来。

俞钰兼在1907年编纂的《中等外国地理》的第三节,详细介绍了法属印度支那的东京、安南、交趾地区的历史起源和殖民化进程,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的地理特点,水稻种植,以及作为贸易港的海防(Hải Phòng)、西贡(Sài Gòn)和顺化(Huế)的皇宫等信息。从同年开始,“印度支那”这一术语也在留日学生学会的《太极学报》中被使用。越南的名称逐渐从“安南”、“越南”转变为“印度支那”。从第二年起,国内的《湖南学报》以及国外的《海潮新闻》(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新韩国报》(檀香山)开始从当前实务的角度介绍越南中部的抗税运动、东游运动失败

后被日本驱逐的越南学生、黄花探 (Hoàng Hoa Thám) 的反殖民抵抗活动等事件。

1910 年 8 月 22 日, 日韩合并后, 韩国国内的学术与新闻活动陷入低谷, 研究活动亦成为监控的对象。这种压抑的气氛难免会影响到 20 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史研究, 这在 1919 年三一运动后实行的“文化政策”中得到了一定的缓解。1920 年起, 《东亚日报》、《朝鲜日报》、《时代日报》等媒体新闻纷纷报道了越南皇室和风俗、西方对印度支那的研究、殖民当局的行为、印度支那的华侨情况以及国内外独立运动等话题。同时, 大众杂志《别乾坤》和《三千里》从 1930 年开始关注法越关系史、越南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独立运动、菲律宾的反美运动等。这些报道逐渐为韩国的东南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促使该领域的研究逐步恢复。

在 1930 年代, 社会主义者和独立运动家李如星 (1901-?) 在京城府花洞 24 号的世光社出版了《世界弱小民族运动概观》, 书中“安南人的运动及其未来”的章节介绍了越南的独立运动。然而, 由于日本当局认为该书可能影响治安, 因此未许可其销售。此外, 在东京长大, 8 岁随父亲前往日本的洪穆 (1920-1982), 从中央大学毕业后曾尝试进入一家日本公司工作, 但因其朝鲜人的身份被拒绝。此后, 他带着“先南进”的想法, 进入兴南学院学习越南语, 在那里遇到了越南语教师兼独立运动家吴文盟 (Ngô Văn Minh), 由此深入了解了越南的民族运动, 并决定今后投身于韩国的独立运动。

洪穆以从其师处获得的几本潘佩珠的书为基础, 用笔名大山幸伸 (Ōyama Yukinobu) 写了《印度支那动乱四十年史》, 1943 年 1 月由东京军事教育社出版。该书从出版当月开始就由日本全国的书店及位于神田的韩国餐厅向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进行分发。《世界弱小民族运动概观》和《印度支那动乱四十年史》的内容不仅旨在从邻国的相似遭遇中汲取教训, 应用于韩国的独立运动, 同时还尝试探索越南民族运动与韩国独立运动之间的联系。

除了李如星和洪穆之外, 另一位系统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者是金永键 (1910-?)。金永键撰写的《印度支那与日本的关系》(东京: 富山房, 1943 年出版) 与《印度支那动乱四十年史》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出版的。这本书介绍了日本、越南与朝鲜的交流成果。金永键出生于京城 (现首尔), 大部分幼年时间在黄海道度过, 随父亲金定铉 (1868-?) 一起生活。他父亲是一位朝鲜总督府的官员。1923 年, 因父亲工作调任至京城, 他从海州高等普通学校转学至京城第二高等普通学校 (现庆福高等学校), 于 1927 年毕业。毕业后, 金永键在上海和南京等地专攻佛文学数年, 随后在京城法国总领事馆工作。1931 年 4 月, 他在领事馆的安排下离开祖国, 经由神户前往新的工作地点——印度支那。金永键, 这位受左翼思想影响的文学青年, 从 1931 年到 1940 年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担任助理图书管理员、日本图书馆主任等职, 期间逐渐深入了解并熟悉了“越南学”。

金永键在法国远东学院院长乔治·科德斯 (George Coedès, 1886-1969) 和保罗·穆斯 (Paul Mus, 1902-1969) 的支持下, 与越南学者陈文甲 (Trần Văn Giáp, 1898-1973) 和黎渡 (Lê Du, 1885-1957) 进行了学术交流。从 1932 年开始, 他的越南历史研究发布在多种学术期刊和媒体, 逐渐为公众所知。在日本东南亚研究者松本信广、杉本直治郎、山本达郎、古野清人的协助下, 金永键相继在《民族学研究》(日本民族学会)、《历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会)、《史学研究》(广岛文理科大学内广岛史学研究会)、《史学》(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内三田史学会) 等

期刊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同时，金永键的越南研究和相关信息，也被《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国内新闻机构介绍给了韩国读者。

在这一过程中问世的《印度支那与日本的关系》不仅汇总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还丰富了越南与日本的关系、暹罗历史以及越南史的内容，并特别增加了有关越南与韩国交流史的新资料。1936年夏，金永键在访问黄海道瓮津时，通过收集当地的传说和各类资料，如《花山君家宝》、《花山李氏世谱》、《花山君本传》、《瓮津府邑志》等，为李朝（1009-1225）皇子李龙祥（Lý Long Tường）事迹的历史化（被称为“李龙祥的事迹”）做出了贡献。这一研究成果是他在1921至1922年间，作为当时瓮津郡郡守次子的少年时代体验和记忆的再现。

金永键在历经十年的当地生活体验中，逐渐熟悉了越南的历史和文化，并能从多方面引领“越南学”研究。自1930年代起直至解放前夕，金永键丰富的学术成果一直都备受瞩目。然而，1945年解放前后，他的学术生涯遭遇了现实的波折和曲折，其“南海史”研究及其他东南亚学科的开创研究也未能尽数完成，留有遗憾。

3. 结论—1960年代～现在—

1960年代之后，韩国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关注越南战争相关内容。1970年代起，开始出现专门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如刘仁善、宋寅瑞等。他们是高丽大学前校长金俊烨的学生。刘仁善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东南亚历史研究博士学位，专攻传统时期越南史。宋寅瑞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泰国近代史。因此，直至1980年代，东南亚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越南和泰国。1990年代后，除泰国外，也开始涌现马来西亚的专家。2000年代又有了专攻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历史的学者。研究者数量在逐步增加的同时，研究焦点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越南、泰国扩展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³。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东南亚历史学家均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他们的教育背景涵盖了美国（刘仁善、苏秉国〔马来西亚史〕、吕运京〔印度尼西亚史〕、玄诗柰〔泰国史〕）、泰国（宋寅瑞）、德国（赵兴国〔泰国史〕）、澳大利亚（崔秉旭〔越南史〕）、英国（卢英顺〔越南史〕）、法国（尹大荣〔越南史〕）等，这些国家的东南亚研究都很活跃。在这一过程中，多样化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方法论的交流推动了研究主题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全球学术界持续受到关注。

即便是如此活跃的初代学者，在他们展开活动的近50年间，仍未出现相关研究的国内博士，这一现象该如何解读？1970年代末，全国大学的历史学和史学教育系中只有两名东南亚史专业的教授，到了2007年仅剩一位，且到了2023年2月最后一名教授也退休了。这意味着目前韩国国内已无东南亚史的专职教授。虽然有人提到首尔大学东方历史学系中有一名外籍教授，但实际上未能培养出继任的研究者。这意味着，以韩国史、中国史和日本史为研究重心的韩国的大学对东南亚历史缺乏兴趣。越战期间，越南史研究在仁川龙现洞地区的黄海道难民区兴起，最终在该地区的仁荷大学，被宣告了“越南史研究的终结”。

3 2011年3月，崔秉旭曾推测，当时韩国历史学界专攻东南亚历史的学者比例不足0.1%。他估算，目前的状况可能更严峻。

在此背景下，从 20 世纪末到现在，韩国的东南亚研究者如何继续关注韩国历史并推动对话呢？金永键的“朝鲜学”对刘仁善关于 12 至 13 世纪在高丽定居的李朝后裔研究似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外，赵兴国在其 2009 年出版的《韩国与东南亚的交流史》中，探讨了三国至新罗时代韩半岛与东南亚的交流、高丽时代的韩国与越南交流、14 世纪末的韩国与泰国交流、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初的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接触、16 世纪末壬辰倭乱时泰国的参战提议和实用主义外交，以及 15 至 19 世纪的韩国与越南的接触和交流等问题。专攻 19 世纪前半叶越南南部研究的崔秉旭考察了 1597 年至 1598 年李睟光观察到的越南（2009 年发表）以及 19 世纪前半叶越南的高丽人参（2012 年发表）⁴。

此外，本科和硕士阶段主要学习中国史和日本史的尹大荣，在其博士论文《Les Idées et Les Mouvements Réformistes en Corée et au Viêt Nam, 1897-1911》（1897-1911 年，韩国和越南的改革思想与运动）中，从区域史和韩越比较史的视角出发，通过“新书”现象探讨了越南“近代”的社会知识史。尹大荣的研究继续关注继续涵盖了近代开港地仁川与海防（2010 年）、1950 年代前半叶北韩与北越的关系及文化交流（2013 年）、1862 年至 1945 年韩越关系史（2013 年）、越南的殖民地化与韩国（2014 年）、1975 年南越败亡后的韩越关系（2015 年）、金永键的越南研究（2016 年）、1910 年代韩国青年与南洋（2018 年）、越南战争时期仁川的市政（2021 年）、法属印度支那的韩人（2022 年）等多个领域⁵。他目前正在从区域史和比较史的角度研究传统时代越南的佛教史，并计划未来继续通过研究 1920 年代苏联的越南青年和韩国人，以及 1954 至 1965 年南越的韩国人，来扩展这一研究视角。

如上文所述，源自 8 世纪的韩国东南亚史研究在经历了 19 至 20 世纪的演变后得以重新焕发生机。横跨殖民时代，各国情况尤其是越南的局势，成为渴望独立的韩国人的重要关注点，同时也催生了更具学术性的金永键的研究。越南战争使韩国社会认识到了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必要性。此后，逐渐开始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研究。

同时，韩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史和比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越南。这种通过研究本国历史来探讨东南亚历史的尝试和努力，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地的历史，还有助于反思和深入审视本国过往的历史研究。因此，希望东南亚历史研究者能更多地关注本国历史。

4 「이수광의 베트남, 1597-1598」(李睟光的越南, 1597-1598), 『동남아시아연구 (东南亚研究)』, Vol. 19, No. 3; 「Korean Ginseng (nhân sâm Cao Ly) in Vietnam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동남아시아연구 (东南亚研究)』, Vol. 22, No. 3.

5 「마주보는 두 역사, 인천과 하이퐁 (面对面的两段历史, 仁川与海防)」, 인천문화재단 (仁川文化财团); 「1950년대 북한과 북베트남의 관계와 문화 교류 - 1956년 조선 문화 대표단의 활동과 관련하여 - (1950 年代北朝鲜与北越的关系及文化交流——以 1956 年朝鲜文化代表团的活动为中心)」, 『역사와 경계 (历史与境界)』, 87; 3 人共著, 「1862~1945, 한국과 베트남의 조우 - 교류, 소통, 협력의 중층적 면모 - (1862~1945 年, 韩国与越南的相遇——交流、沟通与合作的多层面形态)」,首尔: 이매진; 「The Loss of Vietnam: Korean View of Vietna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 9, Issue 1; 「Korea-Vietnam Relations: From Enemy to Comrade」, ASEAN-Korea Relations: Twenty-five Years of Partnership and Friendship, Seoul; 「Between Korea and Vietnam: Kim Yung Kun' s "Ever-Changing and Impermanent" Lif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50/2;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Young Korean Men and Nanyang in the 1910s」,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No. 526 (Vol. 45, No. 3); 「베트남전쟁과 인천의 시정 - '파월 장병 및 가족 돕기 운동' 을 중심으로 (越南战争与仁川的市政——以“派遣士兵及其家属支援运动”为中心)」, 『인천학연구 (仁川学研究)』, 1(35); 「20세기 전반 한인들의 프랑스령 인도차이나 이주: 어느 전씨(田氏) 일가의 사례를 중심으로 (20 世纪前半期韩人移居法属印度支那——以某田氏家族的案例为中心)」, 『아시아리뷰 (亚洲评论)』, Vol. 12, No. 3.

第2场

报告 4



侨务与外交： 中国对1959年 印尼排华问题的反应

高 艳杰

厦门大学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印尼排华浪潮，是华侨华人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与印尼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到两百余万印尼华侨华人（以下统称印尼华人）的命运，并引发了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海外撤侨行动。在此之前，中印尼关系先后经历了从疏远到正常化的复杂变化，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将两国友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但1959年印尼出现的排华浪潮，使得持续升温的中印尼关系突然偏离了友好的轨道。此次印尼排华浪潮的形成夹杂着印尼领导人对国家建构、内部政治平衡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正面临着国内经济困难、周边外交环境恶化和外交路线的调整，以及与台湾当局围绕“侨心”的争夺，这些因素的交织加剧了中印尼双方处理排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外交选择的困难程度。

围绕1959年印尼排华问题，已有国内外学者进行过探讨，本文主要利用已经解密的政府档案和其他资料着重探讨以下问题：一、中国政府应对事件的政策考虑及其对侨务政策的定位；二、中国政府在处理外交与护侨关系之间的选择逻辑；三、排华浪潮冲击下中印尼关系“斗而不破”的原因。

1. 印尼排华浪潮的出现与中国政府的反应

印尼自殖民时代即存在排华现象，其本质是印尼华人与土著居民的融合问题。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从1959年5月，印尼商业部长姆佐米索诺（Rachamat Muljomiseno）颁布M字第2933号决定书，要求各县、州、省及各市首府以外地区的外侨店铺、零售商店于1959年12月31日结束营业。1959年11月18日苏加诺签署发布第十号总统令，将上述法令升级总统批准的全国性法令，并授予地方军事长官拥有裁决权。此后，印尼政府和军队强制华人迁徙和接管华商零售业的活动加剧，多地出现关押、驱赶华人、封闭华人商店等侵害华人利益的行为，印尼国内对华人歧视政策演变为大规模排华浪潮。

对于印尼的排华活动，中国政府大致从9月才开始进行抗议和采取反制措施，且行事低调。1959年9月初，中国外交部向印尼政府递交了抗议照会。照会内容主要是抗议印尼政府对华人采取的不合理措施，并认为此举有损中印尼友好关系，

主张两国以共同协商的方式解决华商和华侨合法居住问题。¹ 照会是通过外交部门传递完成的，中国政府仅向在印尼的骨干侨领通报了照会信息。除此之外，中国外交部还指示驻印尼使馆人员，倘若印尼政府在中国抗议后仍一意孤行，可以考虑通过可靠的左派侨领“不声扬地、有重点地、分散且此起彼伏策动华侨工商界进行各种形式的消极经营”。但外交部要求开展行动时间要短，“最多只能两三天”，并且要避免出现流血事件，不要造成华侨与印尼人民的对立。²

与此同时，为早日解决印尼排华问题，中国政府提议双方尽快进行磋商，此举得到了印尼政府的积极回应。作为外交执行者，苏班德里约飞抵北京直接与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并于1959年10月11日发表《联合公报》。公报内容共计八条，主要强调万隆会议原则、民族独立、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中印尼两国的友谊与合作愿景，其中涉及排华的部分，被巧妙地安排在公报最后一条。公报指出，两国外交部长认为，“应该寻找适当的方法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发展和使华人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受到尊重”。³

苏班德里约紧急赴华协调及《联合公报》的发表，表明中印尼双方都不希望两国友好关系受损，但这次协调沟通却导致两国矛盾激化，公报内容并未如实反映双方的分歧。在会谈期间，中国政府要求印尼政府停止执行排华法令，并以考虑采取措施抵制印尼港口贸易的方式进行施压。⁴ 从苏班德里约回国后的反应看，他对中国处理排华问题的方式非常不满。苏班德里约表示中国人表现得傲慢无理和粗鲁，指责中国以经济事务和其他手段威胁印尼。⁵ 苏班德里约赴华协商后印尼的排华活动不但没有降温，反而愈演愈烈。印尼社会由排华进一步升级为反对中国，即排华反华。

2. 中印尼围绕排华问题的互动与“外长论战”

中国对印尼排华最初持观望态度，至第十号总统令出台，中国对印尼排华的认识发生变化，两国围绕华人问题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从1959年12月中旬开始，《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措辞，由此前的“排华运动”“华人问题”，变为“反华排华活动”。⁶ 12月9日，陈毅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信苏班德里约，提出全面解决华人问题的措施，并通过《人民日报》将信函内容公之于众。陈毅在信中先回顾了双方协商妥善处理华人问题的互动，以及中方维护两国友谊的基本原则，但随即转向对印尼的批评，指责印尼的商业禁令是“集中打击华侨”，华人在印尼被当作敌对国家的侨民，同时暗指印尼政府纵容境内报刊散播污蔑中国和毛泽东的言

1 《报使馆就小商贩问题向记者发表消息事》，1959年9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392-04 (1)。

2 周陶沫：《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解析1959-1962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第155-174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9年第24期，第463-464页。

4 David Mo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1949-1967)*, p.165.

5 “Memorandum of 422 NSC Meeting”, October 29, 1959,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hereafter cited as USDDO), Gale Group, Inc., CK2349499814.

6 《谴责右派报纸利用排华问题煽动反共》，《人民日报》1959年12月3日；《对印度尼西亚的排华运动表示忧虑》，《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5日；《严重抗议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活动 提出三点建议全面解决华侨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12月12日。

论。陈毅认为两国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全面解决华人问题，以维护中印尼友好关系，并就交换双重国籍条约、善待华人和撤侨安排提出了具体建议。⁷

从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到陈毅发表公开信，中国的强硬政策固然是对印尼军方武力迫迁的直接反应，但背后包含着中国外交路线的变化，以及处理与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策略的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共党内针对彭德怀、张闻天思想的检讨，使得中国1954年后推行的“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开始动摇。⁸1959年期间，印尼、印度、缅甸等民族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排华活动，而这些国家曾被中国领导人认为“采取的是中立立场，有利于实现世界和平事业”⁹。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决定调整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毛泽东谈及西藏问题时提出了“不怕鬼”的说法，指出在亚、非、拉美有一大群“鬼”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¹⁰而在具体策略问题上，中国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以“斗争”求团结的路线。正如陈毅谈及印尼排华问题时所言，“民族主义国家毕竟是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政策，一方面要联合，一方面要斗争。只有给予必要的反击，才能争取团结，迁就是不能争取团结的”。¹¹

除中国外交路线的调整外，中国领导人在外交领域的自尊心受挫，也是其向印尼展示强硬外交的重要原因。印尼排华升级后，陈毅曾表示，“印度来欺负我们一下，印尼又要来欺负，主要是因为中国弱”，“中国这个孩子好欺负，可以随便东打一下，西打一下，我们不能无条件挨揍，有时也要还揍几下”，“那些不友好的活动、反动宣传，我们忍受。但他反了我们三个月，我们也要反他三天”。¹²由于同一时期，柬埔寨、埃及也开始出现对华不友好行为，这种压力促使中国绝地反击，避免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政府软弱。美国学者安东尼·戴克认为中苏分裂、中印边境冲突等因素，导致中共对印尼采取缓和态度。¹³这一论断恰恰与中方档案所呈现的情况相反。中共的相关反应和宣传活动表明，中苏分裂等因素对中国的最初影响是刺激了中国领导人的自尊，促使其采取反击举措，而非妥协退让。

由此可见，陈毅12月9日的公开信可以视为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在印尼事务上的集中体现，继而中印尼之间拉开了外长级“公开论战”的序幕。苏班德里约收到陈毅信函两天后，发表了题为《苏班德里约关于1959年12月9日陈毅先生信函的回信》，并将陈毅原信内容附在文后，同时通过印尼信息部公开印发。苏班德里约的回信同样是“先礼后兵”，回顾了自己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层的友好互动和共识后，转向此前《联合公报》背后双方围绕“华人在印尼的作用”的意见分歧。苏班德里约在回信中，强烈抗议中国使馆官员鼓动印尼华人违抗法令的行为，认为

7 《外交部部长陈毅关于严重抗议印度尼西亚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活动并提出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三点建议给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9年第29期，第560-563页。

8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320页。

9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

1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4-375页。

11 《陈毅副总理接见兄弟国家（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德国、朝鲜、蒙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驻华使节谈话记录（谈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1959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416-01。

12 《陈毅副总理接见兄弟国家（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德国、朝鲜、蒙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驻华使节谈话记录（谈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1959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416-01。

13 Antonie C.A. Dake, In the Spirit of the Red Banteng: Indonesian Communists Between Moscow and Peking, 1959-1965, Mouton, 1973, pp.53-55.

这是干涉印尼内部事务。¹⁴ 针对苏班德里约的抨击，陈毅于12月24日代表中国政府发出第二封信函。陈毅在信中对苏班德里约的所有指控逐一反驳。¹⁵

中印尼外长的“公开论战”使得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中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拥有大量侨民，中国对印尼排华的处理成为其应对同类事务，以及和华人居住国关系的风向标。陈毅致电印尼复信后次日在中南海召见了苏联、保加利亚、蒙古等八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并通过各位使节将复信内容转达给本国政府，以此澄清中国的侨务政策和外交路线，以及对印尼排华的处理政策。会谈期间，陈毅明确阐释了中国处理涉侨事务的三项原则：首先，中国政府鼓励华人取得居留国国籍，成为当地公民；其次，对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人，中国政府要求其遵守当地法律，经营合法商业，中国政府也早已主动解散华人中的党组织，无意干涉他国内政；第三，对于不愿加入居住国国籍，又无法在当地谋生的，中国政府在个人自愿的前提下允许其撤回国内。陈毅还强调，除了与中国未建交的国家 and 个别国家，这三条具有普遍性。¹⁶ 关于印尼华人，陈毅否认中国政府应当为排华事件负责，并对撤侨问题作了解释。他同时指出，华人目前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生活无法维持，财产可能被剥夺，“我们对华人正当利益必须保护，绝不让步”。¹⁷

中国政府通过两封公开信和公开表态向国际社会阐明了护侨的坚定立场，并迅速启动撤侨行动。从1960年2月5日起，中国政府开始撤侨行动，陆续派出“美上美”号、“大宝康”号、“海皇”号等轮船前往印尼接侨回国。¹⁸ 由此，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海外撤侨和安置工作拉开序幕。

3. 中印尼国家利益的交织与排华浪潮的终结

中国开展护侨和撤侨行动后，在把握“斗争”与“团结”的平衡时面临考验。中国领导层无意与印尼决裂，“教育”和“斗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团结”。按照陈毅的说法，中国的反击“主要是为了教育人民，教育中国人民，使他们懂得世界帝国主义的存在……同时也教育印尼人民和亚非广大人民”。¹⁹ 尽管中苏分裂、中印冲突曾刺激中国对印尼进行反击，但中国政府客观地认识到1959年后中国面

14 “Dr. Subandrio’s Reply to Mr. Chen Yi’s Letter of December 9, 1959”, Special Release on Current Indonesian Affairs(Nr. 81/1959),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public of Indonesia, 1959, p. 16.

15 《外交部部长陈毅关于建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立即会谈全面解决华侨问题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9年第30期，第567-570页。

16 《陈毅副总理接见兄弟国家（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德国、朝鲜、蒙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驻华使节谈话记录（谈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1959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416-01。

17 《陈毅副总理接见兄弟国家（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德国、朝鲜、蒙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驻华使节谈话记录（谈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1959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416-01。

18 《我国历史上的创举 四艘船只升火待发来椰接运游子归国》，《生活报》1960年2月6日；《四艘接运华侨轮船离开黄埔前来印尼》，《生活报》1960年2月8日；《第二批接侨船前天启程南来》，《生活报》1960年2月20日。

19 《陈毅副总理接见兄弟国家（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德国、朝鲜、蒙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驻华使节谈话记录（谈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1959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416-01。

临的国内困难和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中印尼之间不存在战略利益的冲突，印尼是中国政府认定可以争取的民族主义国家，并且是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重要力量。

鉴于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公开强势护侨和撤侨，另一方面在与印尼政府的直接互动中始终为双方关系的缓和留有余地。早在1959年12月陈毅请印尼驻华大使转交第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时，他就表示“这封信完全是根据我们两国历来的友好精神出发的”。²⁰与此同时，陈毅转交信函时已经提前告知对方信函内容会被公开，并解释此举是为了稳定国内民众的情绪。陈毅还强调华裔问题是印尼内政，中国对印尼的友好政策没有改变。²¹转交第二封信函时，陈毅又向印尼大使表示“我们还是回到友谊的道路上来”。²²而从1960年2月起，中国官媒在宣传上也开始降温，媒体和广播的报道采取了更加温和的论调。²³

除了在官方会晤时强调双边友谊，中国努力挽救中印尼友好关系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加快与印尼沟通“双重国籍条约”的换文工作。1959年12月，陈毅主动向印尼驻华大使苏加佐（Soedibjo Wirjowerdojo）表示，“双重国籍条约”的互换批准日期可以由印尼决定。²⁴其次，在外交和援助方面继续向印尼提供支持。1959年11日，中国政府同印尼发表联合公报，相互支持对方的国家统一事业。²⁵1960年3月，中国将原本打算出售给印尼的价值约2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改为无偿援助。²⁶第三，中国政府巧妙地避免将苏加诺政府作为抨击对象，仅把矛头指向印尼右翼势力和帝国主义。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对待印尼不同的政治势力要区别对待，对苏加诺本人及其内阁留有余地。²⁷

但中国政府的克制态度，并未立即换取印尼政府的积极回应，双方在撤侨问题上摩擦不断，在1960年7月的“芝马墟事件”之后，中印尼关系才出现明显缓和迹象。“芝马墟事件”出现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即于次日提出抗议，要求印尼方面“惩凶、赔偿、道歉、停止迫迁”²⁸，同时掀起了一场密集宣传攻势，试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印尼反华势力施压。1960年7月6日后，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二十余篇有关“芝马墟事件”的报道。中国的宣传共攻势给印尼政府带来了压力，而这一事件成为印尼排华浪潮的转折点，突出表现为苏加诺开始加强直接干预以缓和局势。苏加诺于1960年7月5日听取了外交部长与国家安全部长有

20 《陈毅副总理借鉴印尼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谈话记录》，1959年12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389-03。

21 《陈毅副总理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谈话记录》，1959年12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389-03。

22 《陈毅副总理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苏加诺递交致印尼外长的复信并与他的谈话记录》，1959年12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391-03（1）。

23 “Indonesia-Red China Dispute Oversea Chinese in Indonesia”，February 23, 1960, Entry-P311, Box10, Folder: Indonesia (1958-1965), RG 30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24 《陈毅副总理借鉴印度尼西亚大使苏加诺递交致印尼外长的复信并与他的谈话记录》，1959年12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391-03（1）。

25 《陈毅外长、苏班德里约外长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2日。

2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27 《陈毅副总理接见兄弟国家（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德国、朝鲜、蒙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驻华使节谈话记录（谈印度尼西亚华裔问题）》，1959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416-01。

28 《就芝马圩两华裔妇女被枪杀事黄镇大使昨往外交部向外长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停止迫迁等要求》，《生活报》1960年7月5日。

关“芝马墟事件”的报告。²⁹在印尼方面承诺赔偿“芝马墟事件”死者家属回国费后，陈毅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对此举感到满意，并说明中方将不会对事件细节进行辩论。³⁰1960年中期，中国政府还确立了“少撤多留”的撤侨方针，此举既有利于缓和中印尼关系，又可以减轻撤侨工作带来的财政压力。³¹

中国领导层对印尼释放的善意信号，也得到了印尼政府的正面回应。8月18日，苏加诺向中国驻印尼大使表达对周恩来致词的感谢，称在与荷兰断交一事上，“之所以敢于采取各种措施，主要也是由于事先估计到亚非国家会支持我们的”。而此种观点也得到了印尼其他政要的认可。³²随后，苏加诺开始就对华关系进行人事调整，他任命苏加尼·卡尔多迪维尔约（Sukarni Kartodiwirjo）为新任印尼驻华特命全权大使。8月22日，苏加诺在新任大使就职仪式上宣称，华人问题带来的小困难，丝毫不能改变印尼要同中国建立最密切关系的立场。³³一系列公开示好的言论和外交安排，印证了苏加诺在缓和中印尼关系上的努力。

1961年3月至6月，随着陈毅访问印尼以及苏加诺再次访华，困扰中印尼外交关系的排华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陈毅在拜访苏加诺时表示，“华人问题在中印关系中是小问题，且已得到解决。”³⁴1961年6月13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加诺第二次访问中国。在两国领导人会谈期间，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两国的华人问题解决了，我很高兴……如果不是总统的努力，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³⁵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排华风波后，中印尼友好关系重新恢复。

4. 结语

印尼是第一个未经谈判而直接与新中国建交的民族主义国家，是第一个与中国政府签订双重国籍条约的国家。1959年，中印尼各自的国内政治环境和面临的国际局势都处于剧烈变动期，使得华人问题的重要性被过度放大。在此之前，两国友好关系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平稳发展，并在反帝反殖民方面拥有共同话语，但排华浪潮的出现使得两百多万印尼华人的政治命运，以及两国关系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次排华浪潮是中国在与各国签订“双重国籍条约”后遭遇的第一次严峻挑战，也是对中国政府侨务政策的考验。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鼓励华人加入住在国国籍，从而避免华人问题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也符合中国与印尼发展友好关系的客观要求。中印尼政府围绕解决排华问题的互动

29 《就华侨问题和芝马墟事件两部长向总统报告 印尼政府将发表有关该事件的公报》，《生活报》1960年7月6日。

30 《就芝马墟事件印尼覆我抗议照会》，《生活报》1960年7月28日；《印尼政府已就芝马墟事件道歉 陈毅外长感到满意》，《生活报》1960年8月8日。

31 周陶沫：《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解析1959-1962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第155-174页。

32 《印尼各方对周总理讲话的反应》，1960年8月22日，《关于印度尼西亚西伊里安问题及与荷兰关系》，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713-07(1)。

33 《昨为驻华大使监督时讲话 总统确信华侨问题双方能够友好解决》，《生活报》1960年8月23日。

34 《陈毅副总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会谈纪要》，1961年3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11-00339-13。

35 《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谈话记录（谈亚非拉形势、不结盟国家会议问题、印尼西伊里安问题等）》，1961年6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204-01469-02。

过程实际上有几个关键变化点，但中国政府并未如学界普遍认为的采取了妥协态度，其间中国政府曾强势反击，并以此作为在外交上呈现自己强硬姿态的信号。这表明，中国政府所确立的侨务服从外交的原则，只是一项方向性原则，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侨务并非完全服从外交政策。但是，就整体情况而言，中国将侨务置于外交之上的过程非常短暂，侨务最终要符合宏大外交战略的需要，结果就出现了中印尼之间“斗而不破”的互动景象，即两国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和媒体上相互攻击，另一方面又在直接会谈时反复强调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以避免走向对立。双方在当时的环境下既不存在长期敌对的动机和条件，也不愿承受敌对的代价，在经历波动后两国关系于 1961 年中期重回友好轨道，从而为 1965 年中国与印尼建立反帝“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指定讨论】第3场

主持人：彭浩 大阪公立大学

指定讨论者：

【中国】郑成 兵库县立大学、郑洁西 温州大学

【韩国】郑栽贤 木浦大学、韩成敏 高丽大学

【日本】佐藤雄基 立教大学、平山升 神奈川大学

[以母语发言。翻译：洪龙日（韩语）、于宁（日语）]



彭浩

各位老师大家好。现在已经到了9点钟，我想开始这一组的讨论。我是本场的主持人彭浩，来自大阪公立大学。我主要从事17至19世纪东亚贸易制度方面的研究，昨天各位老师报告也非常辛苦，今天可能比较疲惫，特别是有些老师还准备了今天的评论，准备到比较晚，休息得比较晚，我也是到11点钟收到了好多老师的评论，才开始准备，所以也比较疲惫。但是我看了大家的稿件以后，觉得内容都很充实，而且像昨天的报告一样，都很有启发性。很多老师还分享了一些自己专业里面的具体事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带着期待来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

首先我简单地回顾一下昨天讨论的一些要点。我认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外交，即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东南亚研究发展脉络的问题。在外交方面，首先杨老师的演讲以对日政策为例分析了毛时代与后毛时代中国外交政策在受国内舆论影响方面的变化，提到了毛时代是领袖人物引导民意推动外交走向，而之后出现了民粹主义影响下民意与政府舆论引导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情况，很富有新意，对我们很有启发。

昨天最后发表的高老师的报告也与外交相关，可以说是毛时代外交的个案分析，但侧重点主要在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对印尼反华排华活动的反应和外交交涉方面。我想顺便提一个问题。因为印尼历史上出现了好多次反华排华的活动，结合杨老师的演讲，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中国以及印尼国内的民族主义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另外，昨天三谷老师在一开始的发言提到了“华人”与“华侨”的区别问题，

特别是两者的英文表述有无区分问题。我想，这个问题高老师回答最为合适。

还有昨天第二位发言的陈玉珍女士，她是我们史坛新秀，对泰国外交重新做了富有新意的解读。对于“竹子外交”一词，很惭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觉很有新意。在我看来，它是一种试图通过形象化的手段来抽象出泰国外交特征的概念。陈女士的研究对这一富有影响力的学说提出了质疑，并对“小国意识”的言论做了系统性的解构性的工作。据我所知，从90年代开始，或者说2000年代以后，历史学界出现了各种解构性的潮流。比如，跟我的研究比较相关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解构，在西方史学里面，对于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体制”的解构。但我认为学说体系的建构也并非毫无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一些非专业的人士更容易地了解和把握一些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特征。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很想请陈女士谈一下对泰国外交特征方面的见解。

然后第二个大的问题，是东南亚研究梳理的工作。尹老师做了韩国方面非常详细的通史性的整理。结合一些专业知识，我想谈一些感受。比方说，前近代东亚各国的人员来往与信息交流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尹老师的报告中首先提到了僧侣的求法活动，在求法的同时促进了文化与信息的传播。还有漂流民的活动，海洋阻碍了各国常态性的交流，却又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一些偶遇，中日的历史上都不乏案例。如何对待漂流民甚至成为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比如说，日本江户时代和同一时期清朝，都出现了所谓的“漂流民送还体系”。最近这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果。另外，向中国的定期朝贡，促成了北京以外交使节所在的会同馆为中心的交流网络，不仅是越南与朝鲜，尹老师的报告主要提到了越南和朝鲜的案例，当然还有比方说琉球以及其他朝贡国的公使集中在北京，以会同馆为中心出现了一种比较稳定、广泛的交流。不知道称为“会同馆使节交际网”是不是合适，至少可以看出很多共同之处。

而近代以后，韩国与中国、日本一样，同样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在三国知识分子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对东南亚的了解越来越多。战后更是经历了冷战、经济的高速成长，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对东南亚的关注越来越多。但是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如尹老师讲的，其实韩国现在对于东南亚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

朝鲜半岛出现了这些动向，许多与日本也非常相关。吉田女士的报告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像很多老师所熟悉的那样，可能与朝鲜半岛的情况不太一样，日本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出现了一个相对短暂的日本人的南洋发展的高潮，在越南、泰国、菲律宾都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日本人町。我们明天要去参观的“阿瑜陀耶（Ayutthaya）”，可能中文叫“大城”，也是其中之一。回到20世纪30年代，听了吉田女士的报告之后，我们了解了日本学界的“南洋”研究的动向，这种动向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南进战略的影响。这一时期不仅有移民潮，而且也有日本对东南亚的商业资本的涌入。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跨越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日本与中国相似，在涉及东南亚问题时，特别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讨论时，使用了“南洋”一词，我很有兴趣，因为中国也是这样子。这里显示出了一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审视周边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战后，昨天三谷老师已经讲过了，被欧美人使用的地理概念所逐渐取代。70年代前后，在日本史学界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提到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我想到了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好像这个东南亚研究所也是在70年代前后建成。基于这种认识，如果

有时间的话，也想请吉田女士以及厦门大学的高老师补充一下战后各国的东南亚学科建设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昨天大家报告、发言的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接下来还是请各位指定讨论的老师来作评论。昨天我大概看了一下大家发来的概要，简单确定了这样一个顺序，首先请中国方面的郑成老师和郑洁西老师发言，然后是韩国方面的郑栽贤老师、韩成敏老师，最后是日本方面的佐藤雄基老师和平山升老师。各位的发言时间大概在 7 分钟到 10 分钟左右。现在把时间交给各位讨论人，首先请郑成老师发言。

指定讨论 1

郑成



各位老师早上好，我是郑成。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国史对话”，获得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我是在中国完成硕士学习以后来到日本留学，目前在一所公立大学工作，研究并教授中国当代历史。

近20年来，我在工作中主要使用日语，不过这次发言我还是使用中文。除了主办方的规定以外，我日语说得不太好也是一个原因。前一阵，我们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活动（open campus），一位来我们大学参观的高中生问我，“老师，你是韩国人吗？”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我知道我的日语有口音，但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韩国口音。不过这也好，对我以后学习韩语一定会很有帮助吧。

20年前，我来到日本以后，开始零距离接触日本社会与学界。围绕历史认识，有很长一段时期，我的意识深处成为了中日两国的认知和情感发生剧烈碰撞的场所。近年来，我有幸参加了刘杰老师主持的“历史和解”项目，得以从学术层面进一步思考历史认识和历史和解。

目前，我的课题是作为一个大学教员，如何通过历史教育让学生摆脱本国中心的史观的束缚，从真正的人的角度来深入了解、感受并思考他国的历史。

昨天上午在聆听了杨教授的基调演讲和四位同行的报告之后，我得到了很多启示，非常感谢。结合这些感受，我将围绕历史认识和历史和解，来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思考。

首先是关于杨教授的基调演讲。杨教授讨论了促使中日关系演变的原因。对我来说，中日关系不仅是一个学术课题，也是一个与自己有着切身关系的问题。回顾我自己的人生，能够看到这些年来中日关系留下的印记。简单来说，如果中日两国的关系在进入1970年代以后依然一成不变，我也不可能有机会来日本留学，在日本工作，当然今天也不太可能在这里讲话了。

杨教授在报告当中谈到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杨教授在肯定“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必要性的同时，并没有立刻释放出乐观情绪，反而明确点出其艰巨性。杨教授说道，“要想拿只是在部分史家中达成共识的‘历史认识’去影响双方多数国民，其效果就更难想象了”。

杨教授的现实认知虽然沉重，但他并不主张要放弃对共同的“历史认识”的追求。相反，他呼唤“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这也是一种知难而进吧。杨教授提出解决史观问题最为关键，强调要充分理解自身的民族、国家的同时，也要同样努力去理解其他的民族和国家。他还说到，“我们要习惯于基于大写的‘人’的视角，把本族、本国的历史放到全球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进程中来定位，考察和评价其长短”。

我对杨教授所说的，感同身受。不得不承认，历史学者的作用有限，而且近年来能够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不过，反过来再一想，作为历史学者，能做的也就是秉着良知开展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历史学者的作用，没有政治家那样轰轰烈烈，但是细雨润物，深刻而持久。杨教授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他的研究和著述启发了很多人。

表达了对杨教授的观点的赞同之后，关于中日关系的变化原因，我想补充一点自身的理解。

我认为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民众的国族主义高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毛泽东时代，民间的仇日情绪只是被强力压制了下来，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消解。一旦受到国族主义的招魂，立刻会被释放出来。

杨教授认为，到了后毛时代，中国领导人有时候表现出顺从民意的一面，好像是被高涨的国族主义感情所裹挟。但这往往只是一种表象。中国政府始终有着一种认识，就是认为可以主导民意，实际上也是这么做了。中国的舆论始终牢牢地操控在政府手里，偶然的失控只是民意对政府舆论操控的一时的反噬。

民众的历史认识受政治的影响，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对此，作为历史研究者所能够做的，就是通过历史教育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在这里，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在历史课上的内容涉及到中日战争，我力图让学生进入中国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日本的历史教育中也有着不少问题。很多日本学生在课后提出的报告中介绍到了他们通过反思认识到日本的历史教育中的一些盲点。其中一个就是，日本的历史教育强调宣传本国在战争中的受害情况，对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受害情况却鲜有提及。这成为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上产生深刻隔阂的原因之一。学生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对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就多了一份人文关怀，表示要更为客观地去看待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而不能只阅读本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有的学生提出要带有主体性的去学习历史，包括去采访历史的当事者，去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

陈玉珍教授的报告中提到的泰国的“小国心态”让我很感兴趣。

陈玉珍教授认为，每个国家在历史过程中，会形成各自独特的国民意识，如中国的“受害者意识”，泰国的“小国心态”，等等。这些特定的意识、心态，往往会对该国家的对外行为进行合理化，但是由此会带来很多问题，陈玉珍教授对小国心态抱着批判的态度。

对此，我完全赞同。我认为，“受害者意识”也好，“小国心态”也好，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在认识到其弊端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其形成的原因。人们只有在了解了其形成原因之后，才能够有效避免这种心态的形成。

这里，我想向陈玉珍教授请教的是，是哪些具体的因素促使泰国产生了小国心态。

谢谢尹大荣教授的报告，让我了解了韩国学界的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近年的动向。我想向尹教授请教的是，为什么这些年来韩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日渐式微，大学里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少？我也祝愿尹教授能中兴韩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培养出优秀的学者。

谢谢吉田教授。通过您的报告，围绕日本在 1930 年代至 40 年代在东南亚战略的演变，我对日本学界的各种历史解释有了一个大致地了解。您的报告让我认识到，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来分析日本在这一期间所展现出来的侵略性的成因，始终是日本学界的一个长期课题。您在报告的最后提到了一点，就是后藤乾一教授等东南亚研究学者指出了日本存在的“解放史观”这一历史认识的错误，与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在日中、日韩、日台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对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点让我感到有些疑惑。日本的近代史研究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确与中国（大陆）、韩国、台湾的同行之间有着很多分歧，但是就基本史观而言，是否是“侵略战争”，是否是殖民，应该没有根本分歧。这一点希望得到吉田老师的解惑。

谢谢高艳杰教授的报告。高艳杰教授的报告正面评价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对应。历史评价很不容易，往往因角度或时间维度不同，结论会大相径庭。我想请教高教授的是，如果把1965年的印尼排华纳入视野，在1959年，60年时中国政府的对应里面有没有存在不足，以至于给数年后的印尼排华留下了祸根？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

彭浩

谢谢郑老师。郑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经历，从历史认识和历史和解两个角度做了点评。跟杨老师一样，郑老师也认为史学家在历史和解方面的努力非常重要，但仍可谓是任重道远，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家更需要继续努力。就在前天的欢迎会上，我记得明石康老师也给出了这样的认识，就是现在有很多问题，不光是历史方面，国际问题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马上找到答案，或者是尽管我们去努力，也很难找到答案，但是怎样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继续去思考，最为珍贵。最后郑老师向昨天报告的各位老师提出了问题。刚才我忘记讲了，今天的程序是这样的，为了节约时间，在各位指定讨论的老师点评之后，请各位报告人整理一下问题，最后集中进行回答。按昨天发言的顺序进行回答。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放到下一个自由讨论的环节进行讨论。下面请第二位评论的老师，郑洁西老师发言。

指定讨论2

郑洁西



各位老师早上好！我是来自中国的郑洁西，目前供职于温州大学。我在国内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博士是在日本关西读的，但回国已经很久了，13年前就回国了，非常惭愧，日语也不太好了，今天就不用日语交流了。我最早是参加了2018年在首尔召开的国史会议，后来2021年和2022年参加过两次线上评议，这次也非常荣幸能够第4次参加国史会议。昨天聆听了杨奎松教授的基调演讲和四位学者的学术报告，我感受到跨越国界和跨越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碰撞，受到了很多启发。我在这里主要想谈一下自己的感想和想到的几个小小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杨奎松先生的讲演。杨先生的这场讲演，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真切。杨先生在讲演中一开始就将问题抛出来，指出毛时代与后毛时代，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关系竟然不是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反而是从双方共同努力创造的长达三四十年来越来越好的状况，一步步倒退，渐渐走向让人难以预料未来的危险境地。杨先生从自己的亲历、亲闻、亲身感受出发，从“毛时代及后毛时代中国对日态度的变化”、“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民情、民意的不同作用”、“历史学者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因为有理论、有数据、有剖析，特别是有作者自身的亲身经历，摆出来的历史显得特别真切，我觉得杨先生的提法是非常令人信服的，觉得这样的研究是大多数其他研究所触及不到的，具有相当深度。

杨先生在讲演的最后特地探讨了“历史学者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就史实的真实性进行的对话提出来的案例很有启发意义。我在这里补充一下自己的体会。我的一位师兄曾经在2004年发表过一篇名为《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的文章，质

疑了毛的“两分法”，提出了整个日本人民举国协同战争的“一体论”。从历史事实挖掘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我在当时从个人的感想出发，是非常佩服这位师兄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对学术和社会也了解了更多，他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有其背景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学者做学术迎合某些民意，获得喝彩，其效果其实不容乐观，不小心可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诚如杨先生所说，想用事实研究去改变大多数只会从相互的情感出发，站在自己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的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感想是，学者的历史研究，不仅仅在于挖掘历史，而也应该在于突破感情去解释好历史。

在这里我提一个小小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所确定的对日友好政策，跟前面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连贯性？我们知道，抗战胜利的时候，蒋介石曾经做过《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讲话，提出“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确定了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以德报怨”的总基调。蒋介石的这个提法跟国家领袖的私德有关，也有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背景，在问题处理上应该也是有效果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好像就不太存在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那样多的问题纠纷，彼此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和解。整个日本民众普遍敬重蒋介石，爱知县还立有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神社。我在留学日本期间，也发现日本政府给台湾同学的奖学金待遇绝对不逊色于大陆同学。关于这个小问题，不知道杨老师如何看待？

关于“国史对话”中四位学者的报告，我也提一点自己的感想和小小的问题。四个报告中，有两个从学术史的宏观角度把握东亚两国（日本、韩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学术史梳理，另外两个报告都是个案研究，一个是从历史批判角度探讨东南亚的泰国外交中的“竹子外交论”，另一个是从微观个案角度探讨特殊时期的东亚大国中国与东南亚的大国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们的选题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围绕本届国史对话的主题“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做了较为系统的考述或论证。

四个报告里面，有些是以往学界没有涉及或者被忽略的问题，譬如说陈玉珍老师通过解构泰国“竹子外交论”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小国意识”及其深层次含义，就显得特别有意思，我很有感触。这是以往主流观点所很少涉及的，她的批判相当有分量，我认为这个话题值得以后的学者继续跟进。这里我想向陈老师请教一个小的问题，是否在差不多国力以及制度背景下的东方国家里面，譬如说像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是否也有类似的外交政策？是否可以通过横向比较，发现某种外交模式的普遍性和差异性？

尹大荣老师关于韩国东南亚史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令我很受启发，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系统的研究成果，其提及韩国东南亚史最早可以追溯到8世纪令人耳目一新。韩国很少有关于东南亚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的内容虽然不太丰富的，但起到挖掘历史、梳理全局的作用，它的价值是相当可贵的。

吉田老师和高老师研究的都是东亚和东南亚关系史上的大问题。前者虽然仅停留在日本学界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主要是日本对东南亚经济扩张）学术史的梳理，但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络，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便利。我在这里主要想谈一下关于高老师报告的一些思考。高老师的研究主要是利用了政府档案和其他报刊、文集资料，全面梳理了中国政府对1959年印

尼排华问题的反应、交涉历程，对以往认为的中国政府在此次排华中采取了妥协态度这一普遍观点进行了纠偏，认为中国政府曾经强势反击，最终使得两国关系在经历波动后重新回到友好轨道。限于我个人的学识，我这里就讲两点自己的思考，希望能够得到回应。第一点其实刚才郑成老师也谈及了这一点，虽然仅仅略有涉及。就是在印尼排华发生以前，其实整个东南亚世界早在两百多年前的16世纪后期，大概在1593年就出现了较早的排华事件，当时是发生在西班牙殖民的菲律宾，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排华。排华以后也出现了撤侨事件。接下来没多久，也就是10年后，就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屠杀华人事件。根据当时的法庭审理，两万人以上的华人被屠杀。加害方和后来的印尼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印尼地方，一个是西方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的排华和屠杀模式，最初是招徕、优待华人，然后把华人养肥以后开始压迫、剥削华人，一步一步开始排华，逐渐加压，反复试探以后，确认中国官方的反应与底线以后，最后实施大规模的屠杀。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印尼当局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非常像之前的西班牙殖民者的排华、屠杀套路。我们知道，印尼在排华以后，经过两国政府的反复交涉，表面上看好像把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没过几年，1965年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华人事件，甚至在1998年还再度剧烈重演。由此可以看出，华人与印尼官方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解决，只是暂时压下来了，其后愈演愈烈才会造成后来的惨剧。在这里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此次中国政府的反应、交涉及其效果，如果把视野不放在问题发生的当时，而是放在长段的历史当中，就是从1959年到1998年，或者说从16世纪后期开始看待这近300年整体的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评价？无论是对整个排华本身，还是对中国政府的反应、效果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评价？这是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提一下。此次排华事件发生后，印尼华人的经济是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有一个个案，当时东南亚的华侨首富黄仲涵家族，其财力是非常雄厚的。在此次排华事件后期，即在1961年7月的时候，印尼政府就以法庭审判的形式没收了他们家族的全部财产。类似这样的个案很多。印尼在当时虽然没有制造大规模的流血案件，但通过排华这一政治运动，利用法律这一合法手段，大规模收割了华人的财富。从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印尼当时排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削弱华人的经济地位，全面收割华人财富，而不是与中国政府为敌？中国政府虽然做出了抗争的努力，但实质上并未在经济上较为妥善地确保华人利益？印尼在“芝马墟事件”上看起来好像有所让步，但这是不是只是印尼政府的一个外交策略，给中国留面子提振其自尊心，借以给中国政府一个台阶下而已？此次排华事件，印尼应该是最大的赢家，在不与中国交恶的情况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可能也有一定的效果，譬如说暂时延缓了华人被大规模屠杀的厄运，但事实上这也不是印尼政府当时的既定策略，治本的效果应该还没有达到。其实华人当时也在提这一点，说没有强大的国家站在我们背后保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尼华人作为最关乎切身利益的群体，他们是这场排华事件中的最大受害方，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适当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把整个问题考虑地更全面、妥当一点？

谢谢各位老师，以上就是我的感想与提问。

彭浩

谢谢郑洁西老师。郑洁西老师多次参加我们的对话活动，对我们的活动积极支

持。这次郑洁西老师的点评过程中，主要是对杨老师的演讲以及高老师的报告做了点评，对其他老师的报告也提了一些意见和问题。大家在听了点评人的问题和意见以后，如果对问题有没有听清楚的地方，可以再确认一下。接下来想请韩国的郑栽贤老师为我们点评，有请郑栽贤老师。

指定讨论3

郑栽贤



各位好，我是在韩国国立木浦大学教授西方史和越南史的郑栽贤。听了来自中国的郑成老师和郑洁西老师的精彩讨论，我也注意到我们三人都是同样以“郑”为姓，不知主持人安排三位郑姓学者连续发言是否别有深意。

能够参与中日韩三国国史学者与东南亚史学者的对话，我深感荣幸。虽然我们的国籍和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我坚信，历史学这一共同的学术基础，必将成为我们展开有意义对话的重要纽带。衷心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推动各国史学界的发展，并为构建东亚共同的历史记忆作出贡献。

从个人角度而言，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用韩语发言，并通过韩语同声传译聆听其他国家学者的发言，这种殊荣让我感到由衷欣喜。不过，有一点值得商榷：本次会议虽然是在曼谷召开、探讨东亚国史与东南亚这一主题，却未能提供泰语口译服务。这就导致大多数不谙中日韩三语的泰国史学家无法参与交流，这一点令人深感遗憾。

在座各位老师的报告都很精彩。尹大荣老师的报告介绍了韩国东南亚史研究的历史脉络与现状。韩国的东南亚史研究是建立在少数史学家孜孜不倦的努力基础之上的，在座的尹大荣老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正如尹老师所指出的，目前的状况并不乐观。东南亚史在韩国史学界所占比重过小，学科后继人才的培养更是面临断层的危机。刚才郑成老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很想请教尹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状况的根源，以及未来应当采取哪些对策？

同时，我也想请教吉田纯已老师和高艳杰老师，日本和中国的东南亚史学界目前面临怎样的处境？此外，我想请教陈玉珍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老师，在泰国，超越本国史的东南亚史教育与研究是如何开展的？另一方面，泰国的东亚史教育与研究又是如何进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国的东南亚史研究整体上并不活跃，但其中越南史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这是一个显著特点。尹大荣老师在介绍近代以前韩国与东南亚的接触时，也主要提到了与越南的关系。韩国的东南亚史研究集中于越南，这或许是由于两国的历史经验相似，例如传统时期与中国的关系、被殖民统治的经历、分裂与内战等共同的历史经历，使得韩国学界特别关注有着相似遭遇的越南历史。

由此可见，韩国的越南史研究已然反映了韩国社会的问题意识，与韩国史有着密切联系。近来韩国值得关注的趋势是，韩国史学者对韩国参与越南战争的研究日益增多。这表明，虽然东南亚史研究者在韩国地位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对东南亚史缺乏关注。

韩国史专业学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东南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让我们期待韩国史与东南亚这一领域之间能建立更多联系。例如，最近的研究揭示，20 世纪 60-70 年代韩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建立在韩国国民的辛勤付出之上，也建立在越南

人民的牺牲之上。然而，韩国史学者在研究与东南亚相关主题时，往往倾向于将东南亚仅仅视为韩国史展开的舞台，或者只将韩国人设定为行为主体，而将东南亚人他者化。

要克服这种局限性，韩国史专业学者需要更多关注东南亚史专业学者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国史的狭隘视角，达到更广阔的历史认识。吉田纯已老师的报告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个人曾经研究过日本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据我所知，日本的东南亚史研究历史比韩国更为悠久，现在也更为活跃。

虽然这样说可能有些冒昧，但有一点不得不提：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曾经一度具有服务于帝国的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学问性质。当然，这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西方的东方学也是如此。20 世纪后期，西方的第三世界研究一直在努力摆脱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性质。不知吉田纯已老师能否告诉我们，战后日本的东南亚史学界在这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

当然，我并不认为当今日本的东南亚史研究仍然局限于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的意图。日本确实培养了多位在国际学界备受推崇的东南亚史学者。不过，在研究近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时，许多日本学者似乎倾向于只聚焦于日本视角。换言之，对近代日本进入东南亚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理解日本的扩张主义和资本主义。

诚然，日本国史研究将东南亚纳入视野的尝试值得肯定。但据我观察，部分研究在缺乏对东南亚特定地区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对日本“南进”的研究。这并非日本学界独有的问题，与我刚才提到的韩国对越南战争的研究状况颇为相似。

高艳杰老师的报告也令我深感兴趣，因为我此前从未接触过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我猜想，在中国，与中国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可能是东南亚研究的主要课题。除了华侨、华人议题外，我很想了解还有哪些研究主题较为普遍。同时，我也很好奇中国史学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普遍性评价。特别想知道，华侨、华人的历史是否被视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即“国史的组成部分”。

关于报告内容，我认为如果能够将重点放在印尼华人社会的实际状况上，或许会更有意思。因为像华人这样的离散群体，恰恰可以成为跨国史学研究的切入点。我想请教高老师，您是否认为 1959 年印尼排华事件完全是印尼政府和人民的责任，还是认为华人也负有一定责任？此外，正如郑洁西老师所说，还发生过其他多起排华事件，我很想知道这些事件是否构成了当今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历史矛盾隐患，以及现今两国是如何记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

关于“竹子外交论”，陈玉珍老师的报告也很有启发性。就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与我读通猜（Thongchai Winichakul）的著作所得出的整体结论颇为相似。不过，报告中似乎未能提及是谁在创造和维持这种“竹子外交论”话语并从中获益，这使得批判的锋芒似乎有所减弱。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不再展开讨论了。

作为一名在韩国从事外国史研究的历史学者，我理解在民族国家时代，历史教育和研究不得不以本国史为中心的现实。但至少在认识论层面，我认为我们应当持续不断地努力，试图超越“我们”和“你们”的二元对立。当今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我认为“国史对话”也是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相信它不仅仅是在既定的“国史”框架下进行对话，更将成为创造共同历史叙事的起点。我希望这种对话与融合不局限于中日韩三国，而能够扩展到更广阔的世界。谢谢大家。

彭浩

谢谢郑栽贤老师。郑栽贤老师首先分享了对尹老师报告里的一些问题意识，对韩国国内东南亚史研究一些令人堪忧的状况，提到了一些如何应对的问题，同样把这样的问题关心扩展到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和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的一些状况，请教各位老师的意见。然后向各位报告的老师分别提了相关的问题。最后对于怎样从认识论的角度超越“你们与我们”的二分法，从全球史角度来做历史研究，简单总结了一下自己的想法。谢谢郑老师。对郑老师的问题有没有想确认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请韩成敏老师接下来进行点评。

指定讨论 4

韩成敏



大家好，我是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院的韩成敏。在三位郑姓老师发表了精彩见解之后，我接着进行讨论。

首先，我要向昨天做出精彩报告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感谢。历史虽然能够强化传统和社会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某种文化记忆的缺失。这是因为那些不符合社会价值或研究者赋予意义标准的历史，往往会因各种原因而被排除在外。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昨天杨奎松老师的主旨演讲具有很多启发意义。纵观历史，与日本或中国相比，韩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直接交流相对较少。而且在韩国大学历史系的课程中，东南亚史也几乎不被涉及。因此，对于在韩国求学的我来说，这次学术会议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重建并重新确认东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流史，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正如昨天三谷老师的主旨演讲所指出的，当前韩国社会与东南亚国家的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流正在急剧增加。但是，韩国社会对东南亚历史文化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入。因此，昨天各位老师的报告不仅非常有趣，而且对加深对东南亚地区的理解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对于像我这样对该地区了解程度较低的人来说，这些报告也激发了新的的好奇心。不过遗憾的是，关于报告所关注的中心国家之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内容，以及东南亚国家如何看待和理解韩国、中国、日本的内容略显不足。

首先，陈玉珍老师考察了近代以来泰国外交中小国意识的运作机制、影响及其局限性。这不仅对近代以来以“弱小国家之痛”为象征的韩国对外关系具有许多启示，而且我个人也深有共鸣。我认为，将自己定位为小国的自我规定，不仅会成为阻碍独立主体成长的限制性因素，而且在相对的国家关系中，还可能导致忽视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加害者的认识。

其次，尹大荣老师从通史角度考察了以越南为中心的韩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及研究史，吉田老师分析了近代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最终导向“大东亚共荣圈”的过程，而高艳杰老师则着重分析了现代特别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华人问题为中心的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外交冲突。虽然三位老师的主题报告涉及不同时期和范围，但共同的特点是都突出了各自本国即韩国、日本、中国的视角。

然而，作为研究韩日关系史和东亚关系史的学者，我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很感兴趣。关系史研究由于涉及双方，因此应该建立在相互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在今天和昨天的报告中，似乎看不到相关时期东南亚国家对东亚的认识，或者对韩国、日本、

中国的认识。我希望大家能够请教各位,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是如何认识东亚国家的。

此外,吉田老师提到了属于东南亚范围的国家,但作为对东南亚了解不多的学者,我很想知道这个范围是否明确,地区范围的标准是否已达成普遍共识。通常,地区划分在地理范围和文化范围上大体相似。那么,除了地理方面,我不禁想到东南亚国家还有哪些共同的文化要素。

第四,《越南亡国史》这本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韩国民族史学发展过程中一定会被提及。而且越南近代史与韩国近代史有着相似的结构。在国权面临丧失危机之际,基于同病相怜的心情,当时韩国社会对越南的关注度很高。这种同病相怜的关注是否影响了现代韩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决定?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社会对派兵越南几乎没有反对声音。对此,韩国现代史强调战争特需带来的经济利益、韩国战争的经验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等因素。即使派兵费用由美国承担,韩国也因此获得战争特需的利益,但考虑到大量年轻人在他国战争中牺牲,韩国社会却几乎没有反对声音,对此我想请教各位应该如何看待?

第五,我很想了解20世纪70-80年代韩国对东南亚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和争议是什么。在此之后,尽管韩国与东南亚的交流日益增多,但韩国的东南亚研究反而缩减,这其中最主要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此外,我还想请教从韩国的角度来看,关于东南亚研究,当前最迫切需要研究的领域有哪些?

第六,除了殖民地时期的强制动员问题之外,韩国社会与东南亚的关系还有多个层面。在这一时期,相当数量的殖民地朝鲜人在东南亚担任日军军属,战后作为B、C级战犯受到处罚。然而,这些人在韩国社会和日本社会都遭到了漠视。战时他们的正式国籍是日本,战后又因为不是日本人而被双方排斥。作为当事国的韩国甚至连具体规模都未能掌握。在强调独立运动史和殖民地政策史的韩国近代史研究中,这段历史被遗忘了。此外,据说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曾三次被派往印度、缅甸战线活动,虽然人数不多,但具体活动内容也未能掌握。我想请教的是,这些内容是否可以不仅仅从独立运动史或日本殖民地政策史的角度,而是从与东南亚交流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另外,关于20世纪40年代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占领,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一般评价认为这是一次鲁莽的战线扩张。但是,通过军事力量实现占领和之后维持占领地是性质不同的问题。我很好奇当时日本构想和实施的东南亚占领地维持及运营方式是怎样的,包括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等。

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和朝鲜总督府将殖民地朝鲜生产的大米输往日本,为了补充殖民地朝鲜亏空的粮食,开始进口当时通称为“安南米”的东南亚大米。这不仅仅意味着补充粮食,也是殖民地朝鲜的物价稳定策略。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很想了解大东亚共荣圈内的经济网络是如何运作的。我也想请教吉田老师,战后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经济力量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南亚占领地政策和经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第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韩国战争,冷战逐渐深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亚洲政策在经济方面可以用“两美元政策”来概括:对日本提供产业设施建设援助,对其他亚洲国家则提供援助以消费日本的产品。我很想了解日本史学界对这一美国政策的认识和反应如何。

最后,我想向高艳杰老师提问。您提到1959年印尼排华事件引发的中国和印

尼对立，为了避免全面冲突，基本上在双方克制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于 1961 年左右结束，到 1965 年两国建立了友好的反帝国主义同盟关系。但是从印尼的角度来看，当时苏加诺政权为了国家统合需要制造“公敌”，而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与荷兰合作的华侨成为了替罪羊。此外，这一时期也是苏加诺政权与印尼共产党之间内战激化的时期。我认为，出于需要专注于国内问题，特别是与印尼共产党的对抗，苏加诺政权可能更多地是出于这个原因而避免与中国扩大对立。

而且，中国和印尼建立反帝国主义同盟关系的 1965 年，正是苏哈托通过制造印尼共产党政变事件而夺取政权的年份。此后，苏哈托从 1965 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在不到半年的短暂时间内，以共产党员或被怀疑是共产党员为由，屠杀了多达 50 万到 120 万的本国人民。当然，许多华人也在这次屠杀中遇难。因此，我想请教您的是，在华人遭受迫害之后对于中国和印尼关系，是否因基于中国视角而做出了过于正面的评价？以上就是我的发言。

彭浩

谢谢韩成敏老师。韩成敏老师可能是从马尼拉会议以来每次都参加我们的对话活动，非常感谢。韩老师和郑老师一样，首先对韩国东南亚研究方面研究的不足表达了自己的关切，然后提到自己所认识到的一些韩国与东南亚的关系问题，希望尹老师能够给予补充说明。对于其他老师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东南亚各国对东亚国家是如何认识的，我自己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也很想请教各位。对方国家对本国的认识，对于国史学者来说比较感兴趣，而且东南亚与东亚这种区域划分方法的合理性也值得讨论。时间也比较紧张了，接下来就有请佐藤雄基老师。

指定讨论 5

佐藤雄基



我是立教大学的佐藤雄基，主要研究 12 至 16 世纪，即所谓“中世”时期的日本史。这是继模仿中国建立国家体制的“古代”之后，武士阶层崛起，且武士的政权（幕府）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虽然昨天的报告都以 20 世纪为主题，与我研究的时代相隔甚远，但正如富士山的景色从远处观赏更显美丽一样，有时从远处反而能将事物看得更清楚。因此，我希望能从研究遥远时代的学者的视角出发，谈谈我的感想，以此履行作为指定讨论者的责任。

首先，我想谈谈在东亚的国史对话中探讨“东南亚”的意义。昨天三谷老师在演讲中提到，“东南亚”一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政治的背景之下普及的。众所周知，“东南亚”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民族和文化极其多样，难以视为一个实质性的整体。我想进一步补充的是，“东南亚”这一概念也遮蔽了某些本来存在的事物。比如说，该地区普遍受到中国影响这一共通点。中国的周边地区在接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实际流动造成的影响的同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区域文化和国家体制。从这一角度来看，越南应当与韩国、日本一同被纳入讨论的范围。如今被称为东亚的“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或许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

日本历史学界在关注 9 世纪至 17 世纪期间东海和南海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活跃现象时，提出了“海域亚洲”这一概念。这是中国商人频繁活动的区域。在 16

世纪以前的日本，有不少中国商人定居在以九州博多为中心的地区。昨天高老师在报告中提到，在印度尼西亚形成民族国家的时期，华人的存在曾经是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日本同样也有中国商人的到来。尽管日本曾经向中国学习文明，但从9世纪以后，便不再有“遣唐使”这样正式的国家使节派往中国。所以，现在的研究越发重视这样的观点，由于当时中国商人开启了东海贸易，使得日本不再需要主动派遣使节。大约从10世纪到16世纪，日本处于国家权力陷入分裂，内乱频发的“中世”时期，但依然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继续获得财富与最新的文化成果，还享受着海上贸易带来的种种利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海上贸易体系并不是对等的。中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巨额财富，周边国家为从中国获利，从而形成了向中国聚集的构造。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对东海和南海来说，其贸易门户不在“东方”，而在“南方”。在日本列岛的中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来自中国的进口陶瓷和钱币。同样，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发现了从中国进口的陶瓷与钱币。这表明，得益于与东南亚之间“海上之路”活跃的贸易，中国商人也造访了中世时期的日本，日本列岛也因此受益。如今被称为“东南亚”的地区，或许在历史上并未成为日本的“看得见的邻居”，但因为同处于中国这一“巨大邻居”的影响下，东南亚实际上成了日本的“看不见的邻居”。可以说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日本其实受到了东南亚的非常深远的影响。

昨天三谷老师提到，16世纪随着欧洲人的来访，日本人开始向东南亚拓展的话题。从历史顺序来看，当时已有中国商人的贸易网络存在，葡萄牙人正是依托这一网络，从东南亚前往中国，并在途中停留日本的。事实上，早在15世纪，日本的武士政权即室町幕府便通过与中国明朝的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然而，到了16世纪，由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内乱，日明贸易陷入停滞。而欧洲人和日本人的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

关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动机有多种说法，但最终的攻击目标是中国。秀吉曾设想以宁波（当时中国海上贸易的中心）为据点，进而征服天竺（印度）。可以看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室町幕府以来，日本列岛权力集团追求中国贸易利益的延续，只不过到了统一战国内乱的军事政权手中，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16至17世纪期间日本人进军东南亚的现象，常被置于与昨天吉田老师报告中提到的“南进论”同时期的“日本人的海外雄飞”的历史脉络下进行讲述，但这是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视角。换句话说，自19世纪以来，由于“东亚与东南亚”的地区划分的确立，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日本人向新边疆拓展的印象，进而忽略了前近代、乃至近世以前，即16世纪之前早已存在的历史世界。在聆听吉田老师的报告时，我不禁思考，在“南进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中，是如何看待东南亚地区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存在感的呢？

在昨天尹大荣老师的报告中，指出了朝鲜王朝在前近代时期就对东南亚抱有一定的关注。重要的是，这种关注源于同为中国朝贡国的关系。到了19世纪，随着与中国关系的瓦解，对东南亚的关注随之减退，取而代之的是，对与韩国同样面临殖民危机的越南产生了新的兴趣。而在二战结束后，韩国又因受到美国的影响，以及以越南战争为契机，其关注焦点再次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十分有趣，表明韩国和日本对东南亚的关注始终被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秩序所左右。那么，在21世纪中国的影响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会不会将“东亚与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

重新认识呢？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泰国。在各个地方我都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陈玉珍老师在报告中提到了泰国的“小国意识”。而日本也存在“小国”意识，尽管实际上日本的规模并不小，而且曾对周边地区表现出帝国般的姿态，但与中国、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相比，日本又显得相当渺小。这与泰国十分相似，我认为将其进行比较研究也会是十分有趣的课题。我还有一个疑问，陈玉珍老师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探讨了“小国意识”，那么是否也可以将其视作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情结”呢？日本自国家形成以来便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经历了在吸收和借用中国文化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自身的传统文化的过程。在平安时代的10至11世纪左右，日本社会萌生了“和汉”意识，也就是说，在承认汉诗等中国文化为主导的同时，积极发展和歌等日本传统文化，使二者在日本的文化体系中并存并用。这种文化的双重结构在近代转变为日本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并将其融入日本文化体系之中。可以说，在19世纪以前面对的是中国文明，19世纪以后面对的是西方文明，无论是面对哪种普遍文明，日本都抱以复杂的态度，在感受到文化上的自卑感的同时，有时也会产生某种优越感。我认为在这样的“小国”意识中存在着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中的问题。

尹老师和吉田老师的报告都强调了从“本国史”立场出发进行思考的重要性。然而，所谓的“本国”在形成的过程中就受到了多种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复杂影响。在如今被称作“东亚与东南亚”的这一地区，自前近代时期起，在经济和文化层面便深受中国的影响。如果说，这一长久以来的“邻居”关系，在19世纪以后的近代化以及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中逐渐被模糊，那么身处21世纪的我们，重新追溯近代以前的历史，重新审视这一地区的共同历史与未来发展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以上便是我在聆听各位老师昨天的精彩报告后，结合自身理解所作的评论。

彭浩

谢谢佐藤老师。佐藤老师也是多次参加我们的对话活动，虽然自己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日本的中世史，跟很多会议主题时代上的设定有些距离感，但每次都很积极地参加我们的活动，再次表示感谢。佐藤老师首先提到了“东亚”“东南亚”等一些概念的局限性问题，然后谈到“小国心态”除了泰国以外，可能在东亚、东南亚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特别强调了前近代中国这一大国的存在对周边国家以及区域政策的影响。而且向各位提了很多很有意义的问题，并重新强调了前近代的地区史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再次感谢佐藤老师。最后的时间留给平山老师。

指定讨论6

平山升



我是神奈川大学的平山升。佐藤老师虽然说自己专门研究中世史，但他的视野却并未局限于中世，而是从古代到现代，以跨越千年以上的跨度来进行思考。而且，尽管他以日本中世史为专业，却拥有超越日本视角的广阔眼界。相比之下，我刚刚意识到我的评论局限于日本近现代史领域，不禁有些惭愧。那么，就让我从日本近代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来发表一些评论。

昨天，各位老师的精彩报告给予了我极大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刺激。首先，从杨老师的讲演中，我收获颇丰。尤其是，面对那些容易被政治和媒体舆论裹挟而引发

情绪化的历史议题时，作为历史学者该如何应对这一话题引发了我深刻的思考。

杨老师提到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由光文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出版社在1981年也出版过森村诚一揭露731部队人体实验的作品《恶魔的饱食》。大受日本右翼欢迎的书，与令右翼深恶痛绝的书，竟然出自同一家出版社。这一现象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

在昨天第1场讨论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出版社的问题。当我们思考20世纪大众社会化的进程，即不仅限于少数精英，而当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媒体获取信息并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时，我认为，除了内容本身之外，从媒体理论的视角来探讨信息是如何传播和流通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互联网上涌现出了大量的右翼言论，而为这些人提供话语模式的，正是包括石原慎太郎的著作在内的，在1990年代广受大众欢迎的通俗书籍。我认为，为什么以及如何形成了这样的“爱国”出版市场，应该成为今后历史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其中也包括对当时相关人士的访谈调查。我也想知道，在中国和韩国，在网络上充斥“爱国”言论之前，出版市场是否出现过“爱国”内容商品化的动向呢？

实际上，这一问题与两年前的“国史”对话中，韩成敏老师所提出的“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这一主题密切相关。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韩成敏老师或许会对此发表相关的见解。

在接下来的第2场讨论中，尹老师提出了本场最重要的观点，即“以本国史为视角来叙述东南亚的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地历史，同时也能促使我们反思并‘滋养’本国史研究”。带着这一认识，我将对各位的报告进行评论。

首先，关于陈玉珍老师的报告，我认为她以“消极的自我意识”作为共通关键词来比较各国历史，给在座的大家都带来了启发。

根据国家和时代的不同，我想大家都能联想到几种模式。以近代日本为例，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日本很小，所以想要变大”。这种情绪可能直接导向领土扩张和对外侵略的模式。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模式，即“希望与‘强大的存在’建立联系，或至少相信自己与其相连”。在近代日本，这个“强大的存在”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欧美”。

我目前正在研究的是，“圣地”一词在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显著变化。如今在日语中，“圣地”一词的使用非常自由灵活，比如“动漫圣地”之类的表达已十分常见。然而，在明治时代，这一词汇几乎只与基督教相关，专指耶路撒冷。而且，那时也很少会用“圣地”来称呼日本国内的地点。

然而，进入大正时期以后，开始有人将“圣地”一词与佛教日莲宗的开山祖师日莲联系起来。这人就是田中智学，他主张：“在世界宗教历史中，能够与基督匹敌的，唯有日莲！”因此，他特意借用了原本专属于基督教的“圣地”一词。

有趣的是，到了昭和时期，“圣地”这个词汇又开始与皇室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供奉天皇祖先神明的伊势神宫，或者供奉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都被称作“圣地”。

日本的天皇制，向来自傲为“全世界仅日本独有”的独特固有体制。然而，事实上，昭和初期却出现了企图通过将带有浓厚基督教这一世界性宗教气息的词汇附加到天皇制上，以抬高自身价值的趋势。从中可见，日本这个小国想要与强大的欧美世界相连接的强烈渴望。

我此前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并未有意识地去进行跨国比较。然而，通过聆听陈玉珍老师的报告，我意识到这其实也是消极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可以置于更广阔的视角和背景下来进一步探讨。

我想再补充一点，虽然“竹子外交论”中确实存在一些坏处和弊端，但它同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如您所知，尽管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早已陷入僵局，但日本仍在 1941 年向当时世界最强的美国发动了战争。到 1943 年时，即使战局已然无望，日本在此后近两年内仍未能改变继续作战的方针。在这期间，国内外都持续付出了难以置信的惨重牺牲。

在我的理解中，泰国的“竹子外交论”是一种以能够根据当下的权力格局变化而灵活调整策略为荣的理念。如果真是这样，只要能够始终保持这一理念，那么至少泰国肯定不会犯下与当年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日本同样的错误。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维持这种外交理念所带来的好处是不容忽视的。或许我的感想有些离题，还请见谅。

接下来是对吉田老师报告的评论。首先，报告指出“1930 年代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在日本近代史研究领域几乎未曾受到关注。我也意识到自己此前也确实从未将其纳入过研究视野。

在这里，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吉田老师。您提到“日本近代史中的东南亚研究”一直由专攻东南亚的学者主导，其原因在于日本的近代史研究者不懂当地语言，因而参与这一主题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与三谷老师所指出的“许多国史研究者对国外缺乏关心，且能讲外语的人寥寥无几”的问题是相通的。那么，对于应该如何打破这一现状的问题，吉田老师能否结合自身经验给出一些提示呢？

接着是关于尹老师的报告。通过报告，我了解到，在韩国的东南亚研究中，虽然在殖民时期与越南战争等历史背景上存在差异，但持续地关注着越南。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金永键在日本东南亚研究者的支持下，在日本学界积极发表研究成果。虽然殖民统治无疑是负面历史，但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必然会形成“知识网络”。然而，在日本的殖民统治结束后，这一知识网络便逐渐消失，因此韩国与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也随之断绝。由此推测，现如今韩国和日本的东南亚史研究者，可能更多是在欧美的大学和学会相遇。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便可看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趋势，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的战后时期，在从事亚洲研究的亚洲各国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中扮演桥梁角色的，不再是亚洲，而是欧美的大学和学会。

最后是关于高老师的报告，惭愧地说，我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因此印象非常深刻。据高老师所述，中国政府始终避免与印度尼西亚发生彻底的决裂，但无论如何也要避免“中国很软弱”的形象，因此曾在某些情况下也曾对印度尼西亚采取强硬的态度。这一点可以与陈玉珍老师关注消极的本国认识的报告联系起来，令人深思。

在这里，最后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段与高老师的报告密切相关，同时也和杨老师、陈玉珍老师的报告有关的史实。

在距今正好 100 年前的 1924 年，美国通过了《排日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进入美国。在 20 世纪初，美国就已经出现了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而这一法案则

成为了决定性的打击。这使当时的日本人陷入了深深的愤怒与绝望。一个原本性格极为温和的日本农村青年此时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在日记中留下了愤怒发狂的文字，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人所受到的冲击。

为了防止这一事态发生，有一位人物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他就是最近成为日本新版纸币肖像人物的涩泽荣一。作为推动近代日本工业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尽管当时年事已高，他仍亲自前往美国，向美国的有力人士呼吁，希望阻止《排日移民法》的通过。然而，最终法案还是通过了，他的失望可想而知。

不过，在日本国内充斥着“总有一天要报复美国！”之类的情绪化言论之时，涩泽荣一始终没有随波逐流。杨老师在主旨演讲中引用了周恩来的话——“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这正是涩泽所秉持的想法。晚年的涩泽为遏止日美关系的恶化，倾尽全力。例如，他发起了一项友好活动，将从美国寄来的大量玩偶寄赠给全日本的小学，希望通过孩子们的友好往来，为未来的日美关系打下基础。

就在去世的前一年，涩泽向明治神宫外苑的圣德纪念绘画馆捐赠了一幅壁画，描绘了 1879 年美国格兰特将军访日时与明治天皇会面的情景。涩泽将自己倡导的日美和解理念，寄托在了这座由他亲自参与建设的神社外苑之中。

然而，涩泽所欲传达的这一理念，在他 1931 年去世后，却以最糟糕的方式被践踏了。1943 年 10 月 21 日，在绘画馆所在的明治神宫外苑内的竞技场上冒雨举行的是，为即将奔赴对美作战战场的学徒兵（大学生）送行的壮行会。

以上便是我的全部评论。

彭浩

谢谢平山老师。平山老师也是基本上每次都会参加我们的对话，这次也分享了许多各位学者可以参考的日本史方面的案例，内容非常地丰富，论点也非常多样。比方说提到那个出版社与爱国主义言论之间的关系，佛教、神道教中朝拜圣地的历史与国家凝聚力的问题，日本近代向强大的西方主动接近等等问题，而且还发表了一些对于欧美史学界引领东南亚研究的感想，我想很多都值得我们接下来进行讨论。正好现在时间基本上到 10 点半，但是如果大家特别是接下来要回答和回应的老师，如果对于问题有没有听清楚的地方，没有做好笔记的地方，可以稍微抽出一些时间来确认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漏掉了，很不好意思。刚才郑裁贤老师提到了一个遗憾，在泰国没有泰语传译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需要其他报告人来回答的，而是应该由我们运营委员会向大家表示道歉，我们现在提供中日韩三种语言之间的同传翻译已经相当困难，如果要加上泰国的话，可能要至少再加上三个译者空间。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AI 人工智能已经非常发达，下次说不定也有可能实现这个愿望。如果大家没有需要确认的地方，正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给大家足够的休息时间，接下来在郑老师主持的下一个环节里面，请大家积极发言，谢谢大家。

【自由讨论】第4场

主持人：郑 淳一 高丽大学

讨论者（按发言顺序排序）：

杨 奎松 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Pattajit Tangsinmunkong（陈玉珍） 东京大学、
吉田纯已 三井文库、尹 大荣 首尔大学、高 艳杰 厦门大学、
三谷 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宋 志勇 南开大学、郑 栽贤 木浦大学、韩 成敏 高丽大学

讨论总结：刘 杰 早稻田大学

[以母语发言。翻译：洪 龙日（韩语）、于 宁（日语）]



郑 淳一

现在开始第 4 场会议。我是本场的主持人，来自韩国高丽大学历史教育系的郑淳一。承蒙主办方的安排，今天有许多郑姓老师参加，我将是第四位郑姓发言人，也是最后一位郑姓与会者。

我记得 2013 年第一届亚洲未来会议（AFC）是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今年 2024 年第七届亚洲未来会议同样在曼谷举行，这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巧合。在第一届和这一届 AFC 期间，我都与女性共住一个房间。但有趣的是，这两次的室友是不同的女性。说实话，第一届时是与我太太同住一个房间，而这次则是与我女儿同住。第一届时，我和我太太作为留学生都在 AFC 上做了报告，三谷老师可能还记得，在您担任主持的那场会议上，她获得了最佳报告奖，回到东京大学后，还受到了指导教师的高度赞扬。在此再次感谢三谷老师。

另外，我想谈谈这次主办方的周到安排。我带着 9 岁的女儿来到曼谷，本来很担心如何照顾她。但是主办方渥美财团和 SGRA 为我们准备了儿童活动室，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对此我要表示由衷的感谢。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室里不只有孩子们，还有朱拉隆功大学的学生们陪伴。我与这些大学生交谈时发现，

他们日语非常流利，英语也说得很好，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能在泰国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学进行国史对话，而且有如此优秀的学生们照顾孩子们，我感到非常感激。现在破冰环节已经结束，让我们回到正题，开始讨论。

在此之前，指定讨论者和点评老师已经各自用了大约10分钟或稍多的时间提出了许多论点。由于时间有限，要讨论所有问题确实有些困难，因此我想先请做过主旨演讲的杨老师以及四位报告人每人用5分钟时间进行回答。5分钟确实是很短的时间，但我们可以这样安排：第一轮每人发言5分钟，之后我会给大家更多时间，可以补充未能说完的内容。我们将采用对话的形式进行讨论。那么首先请杨奎松老师发言，请对评论进行回应。

杨 奎松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给我提问题的几位先生。很简单，我的主要问题来自于两位姓郑的中国人。所以我先就两个问题做回答。对于郑成的提问，我只回答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中国的舆论当然受政府控制，这个毫无疑问。但同时，这里很大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当政者，他们有强势和弱势之别，尤其是在后毛时代，这个情况更明显。比如相对来讲，邓时代就相对强势，今天也更强势。但中间阶段的领导人，就没有那么强势，或先弱后强，或先强后弱，都有。碰到弱势的领导人时，他们处理有些问题就会感到非常困难、棘手。我前面讲了，胡耀邦处理1985年那个问题，邓还在，当时都处理不好。到了江时代，由于网络作用和开放的程度更大，这方面的问题就难处理了。越是从地方上新上来的领导人，对很多事情都需要有一个熟悉和适应的过程，有些事情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也很正常。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郑洁西提到的，毛和蒋对日的妥协，是不是一样？我先讲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在于两个人在他们妥协的那个阶段都是有求于日本的，具体原因我就不细讲了。但是蒋怎么有求于日本，我想你知道，大家可能也知道。1949年、1950年前后，一方面他要和日本签和约，另一方面他要想反攻大陆，需求就非常大。至于毛时代，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他想要通过对日外交来抗衡美国，尤其是想要争取和日本建交。可以想象，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一方面，日本是选举制，当政者都需要选票，而当时中日两国民间的关系是很不错的，这个工作做得好，就有逼迫政府与中国建交的可能。另一方面，蒋、毛也有不同的地方。根本的不同在于，蒋其实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你看他的日记，他对日本入侵，对日本，包括对英国，在日记里有很多仇恨的言论。他每天每天记日记，天天提醒自己要记住这个仇恨。毛不是这样的人。毛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所谓的外交问题的。他要争取的是人民，而不是统治阶级的政府。他相信，只要人民的压力够大，统治阶级就不得不从两国之间互惠、互利、互动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蒋的对日外交，着重于上层，毛的对日外交，着重于中下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他一是不认为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日本人民有什么关系，二是不愿意听到来访的各阶层的日本人，向你反反复复地道歉，更不要说你还想要去要日本赔款了。他多次讲，让日本赔款，只能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他的一个出发点。

我就讲这么多。

郑 淳一

好的，感谢杨老师清晰易懂的回答。接下来请陈玉珍老师回答。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陈玉珍)

非常感谢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评论。由于时间限制在 5 分钟内,我想把回答集中在三个要点上。第一点是关于作为外交策略的“竹子外交”,第二点是关于作为历史观的“竹子外交论”。我认为这两者必须要区分来看。第三点是对郑裁贤老师提问的回应,即关于泰国东南亚史教育的问题。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我的研究并不是要否定泰国所采取的“竹子外交”的策略。泰国长期以来采取了相当平衡的外交,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的研究所批判的是,将该外交策略正当化而采用的“竹子外交论”这一叙事。这一点也算是对佐藤老师和平山老师的回应。确实,泰国外交的特点一般被认为是“平衡外交”,这一点也毋庸置疑。“竹子外交”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泰式的平衡外交。正如平山老师指出的那样,通过平衡外交规避了损害的积极的一面,也是不可否认的。许多研究和领导人的演讲中都已经提及过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平衡外交的另一面,这是一种“没有脊梁的外交”。这一点是我希望特别强调的。

在此我想举两个平衡外交的例子。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顿调查团被派往满洲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定日本在进行侵略行为,对此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了谴责。而当时泰国却选择了不予批判,也就是弃权。在当今的国际情势下又出现了相同的倾向,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问题上,泰国依然选择了弃权。针对这种外交立场,在泰国社会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保守派认为“这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正确判断”,在左派或革新派看来“这是没有脊梁的外交”。他们认为泰国应当调整自我认知,必须承担起更有责任感的外交。我的研究表明,其实也存在这样一种批评观点,认为这种“小国意识”以及“竹子外交”已经是过时的外交策略。

正如佐藤老师所指出的,其中的文化上的自卑感,也是无法否认的。相关资料中显示,中国一直是泰国眼中的大国,泰国始终对其抱有自卑感。但问题是,这种自卑感要一直持续下去吗?以这种自卑感为由,就可以选择对各种争端避而不谈吗?是否应该将这种“小国外交”标榜为泰国外交的特色?如果询问保守派,他们可能会认为维持现状是合理的。然而,对进步派来说,他们或许会认为泰国应当做出改变,积极承担起地区责任,特别是在缅甸问题、东南亚人权问题等方面。因此,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若将“小国外交”、“竹子外交”标榜为泰国外交的特色,可能会遮蔽其他可能性。以上是第一点,作为外交策略的“竹子外交”的说明。

第二点是关于历史观的问题。这是针对郑成老师的提问,也就是关于“小国外交”、“小国认知”是源自何处、如何形成的问题。我的研究认为,小国意识的主张产生于“竹子外交论”这一历史观。而催生出小国意识的“竹子外交论”这种历史观,其实是在 1970 年代形成的,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的产物。那么,1970 年代发生了什么呢?最初,美国因越南战争而积极介入东南亚事务。然而,到了 1973 年前后,美国逐渐从东南亚撤退,这让当时的泰国领导层感到棘手。美国撤退后,泰国必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思考的结果是:必须要与中国拉近关系。而为了合理化这一外交转向,需要构建出一种说法。这一历史叙述要说明这并非突发之举,而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国际政治的产物。反而在未经批判性检讨的情况下,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言论。而我的研究,就是试图揭示出这一点。

第三点是回答郑裁贤老师的提问,关于泰国东南亚教育的状况。就我个人看来,虽然泰国在东南亚研究方面有所进步,但在教育方面仍然相对落后。简单来说,大多数泰国人对冷战时期的泰国在东南亚、或者在邻国采取的行动都知之甚少。最

近，我在课堂上使用了泰国的国史教科书，发现许多教科书里面泰国国史都止步于1932年。1932年是泰国绝对君主制终结的时间点。由于国王在国史叙事中被设定为主角，因此，一旦绝对君主制被推翻，历史叙述也就戛然而止了。虽然也有例外，但我查看了六家出版社出版的官方认证教科书，其中有四本都只讲述到1932年。例外的那两本，虽然有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容，但是仅有半张A4纸的篇幅。这样的情况令我感到十分震惊。就是说，教科书中并没有讲述泰国在冷战时期做了什么、与邻国的关系如何，这无疑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最后感谢大家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 郑淳一

谢谢。考虑到“主场优势”，我们给您多加了5分钟，现在再次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首次发言时间是5分钟。下面有请吉田纯已老师。

■ 吉田纯已

由于时间有限，请允许我将各位的提问归纳成几个要点进行回答。

首先，主持人彭老师、韩国的郑老师以及中国的郑老师都对东南亚研究在日本的发展谱系提出了问题。以大事记的形式进行概述的话，1958年，在财界与日本政府通产省的主导下，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这一智库。其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对当时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的趋势的现状分析，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包括相关资料收集在内的支持历史研究的机构。五年后的1963年，正如彭老师提到的，京都大学设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我在报告中提到的矢野畅等人便是该研究中心的成员，并在此培养了众多的后继学者。尽管经历了机构整合等一系列的波折，该中心至今仍是日本东南亚研究的核心之一。

接下来是关于韩老师提出的“东南亚对日本的认知”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设定的“主体”是谁。在战前，东南亚各国因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尤其取决于来自宗主国的人在当地政府中的介入，以及该国的经济制度状况。具体来说，以当地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前提，要考察当时有多少日本人进入这些国家，又从事了何种活动。进入战争时期后，随着军事政权的开始，除苏加诺、苏哈托等活动家以外，大部分人经历的更多是由日本统治带来的苦难。不过，到了战后，至少从教科书的层面来看，反日论调并没有十分强烈。我推测，这与经济上的合作需求有关。

接下来是关于占领地区维持统治的问题。日本在东南亚的占领地区可大致分为，陆军占领区和海军占领区，以及严格意义上并未被占领的泰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自然也各不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点，比如，大量官员从台湾总督府被派遣至此组成了执行部队。此外，日本还利用了村落首长等当地的领导阶层进行统治，这一点已得到证实。

关于流通问题，对于“大东亚共荣圈”内的贸易关系，要具体而全面地掌握物资流通的情况仍然非常困难。因此，研究多采用宏观和数量化的分析方式。这些研究发现，虽然理念上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合作，但实际上日本主要是直接从各地搜刮粮食和资源。不过，这只是基于统计数据的推测，仍有进一步实证的空间。

关于战后日本国内对向东南亚提供经济援助的反应，目前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先不论事实如何，日本在帮助并促进东南亚发展这件事强化了所谓的“解放史观”，即认为战前的日本占领也是对东南亚的帮助，并

促成了东南亚的独立。

关于最开始郑老师提出的历史认识问题，日韩、中日的学者之间是否存在共识，这可能与表述不清有关。关于我在报告中提到的“解放史观”的论述前提，并不是指日本学者普遍持有这种观点，而是说日本国内的一部分（也可能更多的）群体有这样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形成对抗的是，在东亚方面主要是日本近代史的研究者，在东南亚方面则并非是日本近代史的研究者，而是东南亚的研究者。我报告的主旨之一就是想要突出其中的偏差。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与日韩、中日之间不同，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太可能就历史认识问题引发重大的外交争端。

关于韩国的郑老师和佐藤老师提出的问题，即如果将日本和东南亚作为主体，按区域划分来看的话，就容易变成日本单方面介入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相互的影响，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研究本国历史时，难免会有侧重点。这样叙述的轻重导致了研究上的困难。我认为，我们既需要完整的区域史研究，同时也需要本国史研究，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平衡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可以无视它，而是说我认为关于叙述差异的探讨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最后，关于平山老师提出的如何改变现状这个重要问题。必须承认目前本国史研究者在利用外语材料方面还有不足。除意志力的问题以外，我想谈一点，那就是国外档案资料的可利用性大大提高，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趋势。如果通过在线目录查询能够事先了解到有什么样的资料的话，我想这会极大地提高研究者的投入意愿。然后关于日本近代史，研究日本近世史的学者中有许多精通荷兰语的专家，他们正在成为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对 2024 年现在的日本近代史来说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虽然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我的回答可能还不够充分，但我就先说到这里。

郑 淳一

感谢吉田老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了非常清晰的说明。那么现在请把麦克风交给尹大荣老师。

尹 大荣

我会尽量在 5 分钟内完成回答。首先回应平山老师的问题和评论。我现在主要研究越南史，发现与韩国史有许多可以比较的地方。通过研究越南史，我同时也在学习和反思韩国史。我也希望本国史研究者可以尝试扩展研究领域，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大学时期系里主要教授中国史，但我本来想学习日本史。于是我先后学习了汉文、中文和日语，后来转向了越南研究。我还学习了越南语，而且因为在法国完成博士学业，所以个人能接触到相当丰富的资料。

但对于只研究本国史的学者来说，获得这样的机会比较困难，会有很多限制。因此，我建议扩展研究领域时不要单打独斗，而是可以考虑与日本的东南亚各地区专家展开合作研究。

关于平山老师提到的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质性网络问题，这个说法很对。特别是在大东亚共荣圈时期，对日本来说，厘清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作为韩国人，也有人研究过这方面，但金永健的例子比较特殊。他是自愿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国远东学院担任日本学、朝鲜学图书馆馆员。他在那里停留了约 10 年，

但1940年9月日军进入越南后，这成了他离开的契机。虽然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挽留他，但他回答说“只要日军在这里，我就无法工作”。

当然，金永键在法国远东学院工作期间，也接待过不少来访的日本学者。这些交往成为基础，使他在离开印度支那之后，能够在韩日两国学界之间继续活动。他的著作也在日本出版，序言中提到这本书可以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帮助。因此，对金永键的评价存在模糊之处。而且此人在朝鲜战争后失踪。由于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也很难对他做出评价。

其次，关于韩成敏老师提到研究越南与韩国关系史时要注意相互认识的观点，这个说法很对。但相对而言，我认为要获得越南方面对韩国的认识资料比较困难。现在有很多在韩国留学回国的越南学者，所以我认为由越南研究者来开展对韩国的研究可能更为适当。我就先回答到这里。

郑淳一

非常感谢尹大荣老师。听了您的发言，让我们觉得有更多有趣的论点，同时也希望能够深化讨论。现在请把麦克风交给高艳杰老师，请您发表评论。

高艳杰

谢谢几位老师提出来的问题，我很有收获。实际上有些问题是可以合并的，三位郑老师，郑成、郑洁西、还有郑栽贤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一类，就是如何去看待作为对象国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以及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从1959年的这个事情来看，印度尼西亚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国家、或者是国族建构的快速发展阶段。我想它不仅仅针对中国和华人，当然华人是一个重点的对象。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的话，在1957年，它同样爆发过大规模的对于荷兰企业的攻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民族主义倾向不断上升，那么掌握印尼零售业的华人成为了最主要的一个攻击对象，所以它有郑洁西老师说的收割华人资产的成分，但是从一个更大的历史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快速发展阶段其中的一个具体的反映。当然佐藤老师和平山老师的点评也帮助我很好地去跳出一个具体的案例，从一个历史现象去看待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

那么另外涉及到印度尼西亚人，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他们如何看待。我们会看到，在一个事件的背后，有一个重大的争议点，就是如何评价印尼华人对印尼发展的贡献。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几次会谈当中，印尼政府否认华人对印尼经济发展的贡献，而印尼华人，当我们把视角聚焦到人以后，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比如说在国际问题解决之前，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印尼人。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1945年，印尼爆发反对荷兰的独立斗争以后，我们会发现，华人竟然是保持中立的。华人设立了自保队，意思就是我不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印尼土著人会认为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印尼人，你怎么可以保持中立。那么这个案例就反映了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不同的少数族裔他们政治和心理认同的特殊状态。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是韩成敏老师提出来的，从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如何去看待东亚三国，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比如印尼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刨除掉我举的那个例子，我们看当时1965年双方几乎结成了一个同盟关系，但是很快1967年又断交。断交以后当中美关系缓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原来不友好的国家都跟中国建交，可是印尼恰

恰是最晚建交的国家之一。这里面透露出印尼对中国的一种猜疑，甚至是恐惧，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文献当中，印尼的高层明确去表达了他很担心中国的统一。这个统一不仅仅是说跟台湾的统一，它是指中国能调动海外的华人社会形成一个更大的网络，他很担心中国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那如何看待日本呢？我们看到，在1970年代，美国跟印度尼西亚讨论过整个东南亚乃至亚洲的区域秩序，谁来扮演区域秩序的领导者，结果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明确告诉他们，他们不希望日本扮演这样的角色，甚至在对话当中否认日本的文化。当然韩国的一些相关的我没有看到，但是这个问题，引发了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就是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小国如何看待大国，它有时候涉及到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另一个国家的文化以及文化的接受度。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住的酒店，我发现后面就是一个日本街，有很多日本寿司店，很多服务员也会讲日语。然后就联想到中国如何看待日本。我们可以很坦诚地说，因为历史的原因，还是存在一些对日本负面的评价。比如在中国你穿着和服去拍照，很多人就会攻击你。但是我会觉得很好奇，可是你吃日本寿司就没有人攻击你。同样是日本文化，为什么服装跟饮食就可以区分对待，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反过来也是这样，今天当我们看到日本街、日本寿司店到处都是，那么这个国家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这个国家和它的文化，这个实际上并不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其实它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同时第三个问题，韩成敏老师提出来的，关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过去几年发展非常快，因为中国有一个东南亚研究会，就设立在我所在的厦门大学，这个学会的注册人员是超过了600人。但是这个数字是有些虚高的。因为很多人他做东南亚研究，他只是某一篇文章、某两篇文章涉及到东南亚的国别。但当我们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国家，比如说泰国、缅甸、柬埔寨的时候，实际上长期关注这些对象国的人是很少的。甚至在中国我们写不出一部高质量的，比如说柬埔寨史、缅甸史、老挝史，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另外，中国关注的东南亚研究领域主要是包括哪些。过去几年最多的，一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第二个就是大国，尤其是美国，包括日本跟东南亚的关系。第三个是，发展比较快的，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角度去探讨中国跟东南亚之间的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这是过去几年发展比较迅速的，但是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做东南亚研究的中国人很多，可是做东南亚历史研究的人很少，我大概做过一个评估，比如说在中国，中文出版的文章当中，每十篇最多有一、两篇是历史研究，其他都是关于现状的探讨。但实际上透过几位教授刚才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跨越时空的历史现象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一些行为、活动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也很希望中国学者更多地去加强东南亚史的研究。当然我也感觉特别地惊讶，在韩国竟然会有这么少的东南亚研究者。因为我认为韩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是很巨大的，所以它的研究人群跟它整个在地区的影响力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我想如果还有时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谢谢。

■ 郑淳一

感谢高老师的发言。正如高老师对韩国学界做出评论一样，我也很惊讶地听到，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对东南亚地区的高水平研究却比预期的要少一些。现在已经听取了从杨老师到高老师的主旨演讲者和报告人的回答。

现在，我想点评人和组委会的各位老师可能各种补充意见或问题。在请大家举手发言之前，我想先谈谈关于韩国的东南亚研究和东南亚史教育的一点看法。

这期间请各位老师做好发言准备。

在韩国设有历史教育系，用日本的说法，应该是有“文学部历史学系”和“教育学部历史教育系”之分，在韩国这两个是分开的。我是在教育学部历史教育系任教，因此对国家层面的教育课程改革特别敏感。最近韩国公布了新的教育课程。因为是 2022 年制定的，所以称为“2022 修订教育课程”。关于历史科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原有的“东亚史”这门课程发生了变化，改为“东亚历史之旅”，即加入了“旅行”的概念。这不仅仅是科目名称的改变，课程涵盖的地理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的东亚史主要关注中日韩，那么东亚历史之旅虽然仍叫“东亚”，但实际上包含了东南亚地区在内的更广泛概念。

关于教科书编写，虽然应该参考了尹大荣老师写的很多书，但我听说有一部分是由一些非专业人士编写的。我想说的是，虽然如尹大荣老师等多位老师指出的那样，韩国的东南亚史研究确实很不充分，但韩国民众对学习东南亚和东南亚史的重要性认识却很高。这就造成了需求与研究现状之间的巨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包括尹大荣老师在内的东南亚史研究者的作用将会更加重要。

现在我们来听听各位点评人老师的意见，因为三谷老师先举手了，我们先请他发言。请尽量将发言控制在 3 分钟以内。

■ 三谷 博 我想先就事实确认方面提出几个问题。尹老师提到，韩国已经没有东南亚史研究的职位了，但东南亚研究，也就是关于现当代的研究，应该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吧？能否请您说明一下现当代研究的规模，以及它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非常感谢！

■ 郑 淳一 好的，请尹老师回答。

■ 尹 大荣 专门研究东南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很多。但是如果仅限于历史学系和历史教育系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却一个都没有。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有一位德国籍老师。可能正因如此，无法培养出后续研究者。在我毕业的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在我之后就没有继续从事越南研究的人。

虽然不是准确的统计，但我认为从事东南亚历史研究的人在历史学界占比不到 0.1%。因此，正如您所说，根本不存在研究的争论点。就像我昨天说的，现在的状况就像是鼯鼠一样一边挖地道一边进行研究。我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力所能及的事。我就先回应这些。

■ 郑 淳一 对我来说，这些话听起来既令人悲伤，作为韩国历史学者之一，也让我感到重大责任。那么，三谷博老师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吗？

■ 三谷 博 那么，大约有多少人呢？

■ 尹 大荣 在韩国有一个名为“韩国东南亚研究所”的机构。据我所知，虽然其成员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但规模已达到将近 70 人。该研究所目前每两年与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合作举办一次学术会议。

■ 郑淳一 尹大荣老师，三谷老师似乎是在询问专门研究现代史的研究者有多少。

■ 三谷 博 我首先想请教的是，目前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人数大概有多少？其次，正如我们昨天讨论的，韩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是在这不到 20 年的短暂时期里才加深的。因此，即便是从事当代研究的学者，也应该能够讨论历史问题吧？这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 尹大荣 目前研究现代史的有 3 人。关于近 20 年来的韩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主要是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在填补这方面的研究内容。

■ 郑淳一 三谷老师觉得可以了吗？那么接下来把麦克风交给陈玉珍老师。

■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陈玉珍) 谢谢。我想确认一下，据我所知，韩国西江大学设有东南亚研究所，并且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的期刊《TRaNS》。这本期刊在泰国研究者和东南亚研究者中很受欢迎，许多人都选择向其投稿。请问您如何评价西江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呢？

■ 尹大荣 我之前在西江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过。当该机构的学术期刊《TRaNS》首次出版时，我是亲自去清迈大学介绍这本期刊的人之一。比如说，东亚研究所虽然有研究泰国现代史的玄时内老师，但其他老师原本并不是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他们本来是研究中国或其他学科的学者，后来才开始涉足东南亚研究。

据我所知，现在该研究所主要特色在艺术文化领域。因此与纯粹的东南亚历史研究还是有一定距离。由于西江大学在出版《TRaNS》时做了很多宣传，所以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

■ 郑淳一 感谢陈玉珍老师和尹大荣老师的问答。让我补充一点，尹大荣老师可能因为是当事人反而不好说，但作为一个同样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我注意到像西江大学东亚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很多情况是原本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美术史或东方艺术史的学者在东亚研究所获得专职教授职位后，才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东南亚。因此从文献角度来看，其研究以基于汉文和汉字文献者居多，从越南研究专家的视角来看，其研究水平不见得有多高超，只是在这种状况下的一种将研究向其他地区扩展的模式。

我可能有一些理解偏差，但我认为尹大荣老师反复强调的是：如果能从 20 多岁就开始系统地接受东南亚历史训练，然后走上专职教授岗位，就能够持续开展更高水平的研究，培养学术后继人才，培养研究生。但韩国学界、韩国大学目前无法应对这一部分，这是他一直在指出的问题，这是我的理解。

那么请其他点评人老师举手示意，我们会把麦克风递给您。有请盐出老师。

■ 盐出浩之 我是京都大学的盐出浩之。非常感谢各位此次宝贵的报告。在刚才的综合讨论中，郑栽贤老师向高艳杰老师指出，华侨或华人的历史是否应当被视为中国的历史，或者中国人的历史。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也思考了许久。因为我自己一直从事日本人移民历史的研究。在这一视角下，自然会产生“移居美国等外国的日本移民的历史算是日本史吗？”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不，这不属于日本史”，或者说实际上这部分历史往往被忽略了。如果说旅居美国等外国的日本移民的历史

被排除在日本史之外，那背后其实是一种选择，即以国境线来划分历史。这意味着，日本领土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才算是日本的历史。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正如杨奎松老师在主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将国家的历史（国史）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中去思考，这一观点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因此，我想在点评中强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还有一点。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佐藤雄基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采用“东南亚”的概念，或许会让人忽略前近代时期该地区的历史，也就是东南亚其实和东亚一样深受中国影响这一历史事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说明在前近代时期，东亚和东南亚并不是割裂的。

如果要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后来二者被分割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除了泰国，东南亚大都被西方列强殖民。而东亚则有所不同，进入了日本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局面。这就导致了东亚与东南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割裂。佐藤老师指出了东南亚概念本身存在局限性和制约，重要的是，东亚这一概念本身也是被历史构建出来的，同时也受历史的制约。这次讨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这一点的机会。

郑淳一

感谢盐出老师。我理解盐出老师并不是向特定的老师提问，而是分享了评论和感想，对吗？大家可以像盐出老师这样分享感想，也可以向特定的老师提出具体问题。还有其他老师要发言吗？有请高老师。

高艳杰

因为您提到了刚才其实我想回答，但是前面没有时间回答的问题，华人史是否是中国史的延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现实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学者很长时间里都把华人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心理，在一个事实上的学科划分的时候，我们很多中国的学者，如果他做的是华侨华人史研究，他会强调自己的学科是中国史。这实际上，我们往前推的话，从晚清开始的关于华人的记载，都是作为中国史的一种延续，为什么会去关注他，我们只是关注中国人到了其他国家以后，他们的生存状况怎么样。所以还是作为一个中国国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华人。但是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这种视角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传统的把华人视为中国史延伸的这部分的学者，他们的发表各方面已经陷入到了几乎停滞的状态，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兴趣了。更感兴趣的是已经在当地生活、长期居住的华人，就像刚才几位老师提到，他们本身如何去看待他们所处的国家以及看待他的母国。另外，他们在当地跟政府的融入，在当地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这是我们更关注的。但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大部分是由中青代的学者进行完成的。这是我想要回应的。

另外，实际上，当我们讨论说华裔或少数族裔，它是不是日本史的延伸或中国史的延伸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放在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去理解这件事情。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少数族裔，大部分都是跨境民族，它是超越了民族国家概念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全球史、或跨国史这样的流动的对象进行研究。现在我想大部分研究都已经跳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当然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无论如何跳，有一个问题是跳不开的，就是实际上是三者关系，母国、族裔、居住国，它们三个如何相互影响，这是一个永恒的逻辑和话题，这是我的感受，谢谢。

郑淳一 感谢高老师的发言。刚才平山老师举手了，请讲。

平山升 我是神奈川大学的平山。刚才各位老师也作出了回应，我想向陈玉珍老师请教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您刚才在回应中所说的意思是，提出“竹子外交论”的人们其实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真心相信它是绝对正确的，而是认为用这种说法更好让大家接受，或者更容易控制国家。因此，它只不过是一种出于策略性考虑而构建出来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一旦被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东西，并最终固化。正因如此，才衍生出了许多问题。这是我对您回应的理解，如果没有误解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观点。实际上，不仅仅是“竹子外交论”，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理论。对于提出这些理论的第一代人而言，其实都明白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概念。然而，到了第二代及以后的人们那里，这些理论就会带有些宗教信仰的性质。这样说来，这种解释方式非常清晰，也具有普遍性。想向您确认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呢？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陈玉珍)

是的，我认为您的总结非常到位。我所想指出的问题正是，最初这种理论是作为一种手段被构建出来并逐渐固化的。但是在大家持续地再生产之下，它最终就被当作“真理”来叙述了。而我想强调的是，研究者对此不加批判的情况更是助长了这种话语的固化。谢谢。

郑淳一 感谢平山老师。感谢陈玉珍老师的问答。宋志勇老师举手了，现在把麦克风交给您。

宋志勇 我简单地对高老师的报告做一点补充。关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新的情况。最近这些年，中国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搞了一个大的项目，叫“区域国别研究基地”。这个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在全国的各个高校设置了400多家。这里边关于东南亚区域和东南亚各个国家研究的至少应该有十几家。这个对于今后东南亚区域的研究我想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中国的高校的外语学科正在进行一个大的变革。外语学科里边设立了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按照中国的学科分类本来是要被分类为二级学科的，但是经过他们的争取，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级学科，现在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一级学科。就是说跟我们的历史学是同级的。这样的话，今后会有大量的掌握东南亚外语的、正在教授东南亚地区这些语言的老师会转向转到对东南亚的综合研究，这其中肯定有不少人会转到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我想可能在未来中国对东南亚的研究，以及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我就补充这一点。

郑淳一 感谢宋老师。您介绍了中国大学的区域研究动向和东南亚研究的新趋势，这对我们理解很有帮助。您觉得如何？因为您没有特别提出问题，我们就直接请其他老师发言。有请吉田老师。

吉田纯巳 我想对刚刚陈玉珍老师和平山老师之间的问答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说评论。以

日本为例，明治维新后在讨论与韩国、中国的关系时，福泽谕吉等人提出了对外扩张论。然而，从思想和逻辑上来看，他们的思考过程极为复杂。例如，在朝鲜半岛发生政变时，福泽自身所构建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日本的对外扩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等问题，其背后有着更复杂的讨论。同一时期的对外扩张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此外，日本曾长期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帝国主义的经济，但这种解释方式其实也并不完全正确。

那么，日本为何要向外扩张呢？正如刚才所说的，这背后其实是日本人非常复杂的思维方式。基于这一点，与泰国进行比较时，我认为有必要更认真地探讨泰国的“小国意识”在思想史上的脉络，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表面上的说辞。我在与日本的对比中，想到或许可以从前近代时期或泰国王朝在与周边国家的动态关系中发现一些更丰富的面向。

郑淳一

感谢吉田老师。应该请陈玉珍老师回答。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陈玉珍)

感谢您的指点，确实如此。或许听起来有些简化，但至今为止，还没有研究明确指出“竹子外交论”与“小国意识”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我的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首先明确了这个关联。今后，希望能有其他研究者继续拓展这一课题，我自己也可以继续深入，将其作为接下来的研究课题。

郑淳一

好的，感谢陈玉珍老师。请三谷老师发表评论。

三谷博

虽然这与当前的讨论话题无关，但我想提出一个更为宏大的议题。此刻，我们正在曼谷召开会议。在这里，并不像在日本那样，人们普遍认为“生活在日本国土上的人都是日本人”。拥有不同背景起源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想这是东南亚的普遍状况。

刚才高艳杰老师提到，母国、移民以及移住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且永恒的课题。但我认为，这里缺少了一个要素，即东道社会。也就是说，原本就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并没有被纳入讨论范围。我刚才提到了日本的情况。在日本列岛上生活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一比例可能高达 90% 以上。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个原住民仍然作为多数派存在的社会，几乎没有外来的移民。而与之相对的是北美，在那里原住民几乎被消灭，原有的社会结构被彻底破坏。而日本的原有社会则顽强地延续了下来，这与北美是两个极端。那么，东南亚是处于这两者之间呢，还是偏向哪一端呢？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问题是，我们不应该首先关注移民与母国政府、或者移民出身国政府与移住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最该优先考虑的是，原本就存在于此的东道社会。这个视角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思考移民到来后，这两个群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于政府的介入，其实是近代才开始的事情，也就是从 19 世纪左右才开始的。如果我们以政府为切入点来展开讨论，就会忽视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大多数人以及东道社会，那才是最为重要的。这对于今后的世界公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对此给予关注。

■ 郑淳一

感谢三谷老师。您强调了祖国、移民和居住国这三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原住民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您提出的问题吗？您是希望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吗？您觉得呢？

■ 三谷 博

我并不是想在这里强行展开争论。难得我们在东南亚召开会议，仅仅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来讨论问题，未免有些可惜。日本是世界上对移民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成功进入日本的移民往往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对此要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尽量降低移民进入日本的壁垒，并且一旦接受了移民，就必须给予他们与原住民完全平等的待遇，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这恰恰是日本所欠缺的。日本人对此方面的意识几乎为零。日本是一个尽可能不让移民进入，即使进入了，也不会好好对待的非常极端的社会。日本的情况或许过于极端，但在其他的社会，比如说最近的欧洲，也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有效处理移民与东道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这时，政府的立场和做法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

■ 郑淳一

谢谢您。关于三谷老师提出的问题，平山老师说要发表意见。

■ 平山 升

我是平山。我认为三谷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我想指出其中对于现状还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日本政府，特别是东京的中央政府，确实一直奉行不接受移民的方针。但实际上，在地方自治体的层面，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相对先进的举措，试图将那些没有日本国籍的外来者，或者是一直居住在日本但没有日本国籍的人，视为在同一地区共同生活的伙伴。而妨碍这一进程的正是日本的中央政府。

例如，在日本最早尝试允许非日本国籍的本地居民成为地方公务员、市政府或镇政府职员的是神奈川县的川崎市。此外，我目前任职的神奈川大学所在的横滨市也居住着包括华人在内的各类族群。面对中央政府的各种阻挠，为了让他们能够在横滨安心生活，市政府及一般市民一直在推行各种措施。

我经常强调，东京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像三谷老师这样长期居住在东京的人，或许很难察觉到，中央政府迟迟没有行动、无法作出变革的一些事情，其实在地方社会已经率先开始有所动作。对于这一点，希望三谷老师能够对当前的实际状况有新的认识。

再补充一点，三谷老师刚才提到日本的移民政策迟迟没有改变，但我确信，在未来 50 年内，它将发生剧变。原因很简单，日本人口正在急剧减少。过去十年间，我切身体会到人口变化对社会观念带来的巨大影响。

我曾在福冈县福冈市居住过七年。令人吃惊的是，早在十年前，我就发现博多站周边的便利店里，看着像外国人的店员的数量在大幅增加。如今，大家都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外国的人，这座城市将无法正常运转。过去，外国劳工多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从事一些艰苦或肮脏的工作，但现在，许多人已经在便利店这样所有人看得见的场所工作。既然如此，我们必须与这些人共同生活。这一点在地方自治体层面早已成为共识。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排除国会和中央政府对这一进程的阻碍。

今天在座的佐藤雄基老师是一位研究中世历史的学者。在日本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中央政府已经无法依靠、国家走向衰落时，地方势力为了自身的生存，不被拖累，往往会采取独立行动，这也是日本从古代迈入中世的转折点。或许，类似的变化也会在将来的日本发生。我希望能听一听佐藤老师对此的看法。

郑淳一

感谢平山老师。顺便说一下，第一次听到两位老师发言的人可能会以为三谷老师和平山老师关系不好，其实平山老师是三谷研究室毕业的。郑栽贤老师和韩成敏老师都举手了，考虑到时间关系，请两位用2-3分钟时间简短发言。

郑栽贤

平山老师刚才提到移民人数增加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虽然韩国现在移民还不是很多，但会逐渐增加，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日本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随着移民增加，从我们历史学家，特别是国史学家的立场上来看，国史的意义也许需要作出改变。

因为我在法国学习过，所以特别有感触。据说法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具有移民背景。对这些人来说，中世纪发生的百年战争或路易十四的存在对他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同样，在韩国史中，壬辰倭乱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现在需要重写国史。在今天的法国，他们是如何书写国史的呢？可以将国史重新书写为移民进入法国的过程。国史的意义正在逐渐转变为“这些不同的移民是如何进入的”，“他们定居后经历了什么”。

虽然这些问题目前还不是东亚地区直接面临的问题，但我认为这将是未来国史学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将面临如何为那些世代并非生活在此地的移民后裔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叙述这一课题。

郑淳一

郑栽贤老师谈到了各国多元文化化的现状和对新历史叙述的需求。接下来请韩成敏老师发言。

韩成敏

我的想法和郑栽贤老师类似，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来自国外的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首尔，便利店的员工大多是外国人，所以我认为是否接受多元文化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跨过了，因为这已经成为现实。

但是，以国民国家为中心，特别是在像东亚这样以血缘为基础、单一民族神话根深蒂固的国家和社会中，以“国民国家史”来叙述历史，说实话是历史学家最简便的方法。因为用这一个标准来叙述，就能保持叙述的一致性，所以这种历史叙述方式至今仍然很有影响力。

如果改变“国民”这个标准，历史叙述就可以更加多样化。我认为，首先应该由历史学家来突破这个局限。现实就是要接受，我们不能继续延续这个神话，不是吗？

郑淳一

谢谢。刚才听了郑栽贤老师和韩成敏老师的评论，按照我的理解，昨天杨奎松老师主旨演讲中提到“国族主义”这个词时，我心里还在想“是不是翻译错了，怎么把 nationalism 翻译成‘国族主义’呢”。在演讲中，老师举了美国社会的例子，我这才明白他说的“国族主义”是指不以国民、民族为中心，而是以设想一个像“美

利坚”这样的由具有不同文化根源的民族共同生活的多元文化社会为前提的“国族主义”概念。昨天的主旨演讲似乎与今天诸位老师的最后评论形成了呼应。

我特意用了“最后”这个词。考虑到时间关系,现在请听第四场讨论的总结发言。我们请早稻田大学刘杰老师发言。

讨论总结

刘杰

非常感谢大家。各位老师热烈的讨论让我大受启发。我想就此发表两到三点评论。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这一主题的设定与会议举办地曼谷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一主题,我们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大国”、“小国”作为关键词在与东南亚的关系中受到关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此外,虽然没有刻意为之,但通过本次对话,我明显感受到我们对话的时间范围已经不知不觉地从战前逐步过渡到了战后。不过,对于战后的历史,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我们尚未进行充分的讨论。在此次会议中我发觉,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我们的对话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阶段。

如果要把战后的历史也纳入对话的范畴,那么问题的设定必然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的历史对话主要是围绕战前的亚洲,即太平洋战争之前的东亚国际关系来展开的。因此,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以及其行动对该地区造成的影响,始终是讨论的核心。然而,当我们将视角转向战后,尤其是要扩展至当下时,就必须关注对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即中国的问题。如此一来,如果要将战前与战后的历史视为一个连续整体来展开对话,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设定议题,应该关注哪些问题,以及如何理解和思考这个地区。这就是新的课题所在。

此外,关于之前提到的移民问题,如果我们的讨论要贯通从战前到战后的历史,那么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大国与小国的逻辑之上。正如杨老师在主旨演讲中所特别强调的“基于人的逻辑的历史观”,也就是说我们亚洲的历史学家必须要思考如何在亚洲构建这一历史观,并将其向世界传达。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在我们以往的对话中,我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各国的历史学家在不同的学术空间或生活环境中,究竟是如何尝试跨越国境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作超越国境进行历史对话,但每个国家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国境及其国内状况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三谷老师在开幕致辞中提到,过去与外国的关系有时会被政治问题化,这类问题的提出往往并不只是因为对过去的认知,而更多是受到对方国家的现状、行为以及国内政治问题的影响。也就是说,历史认知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方的问题,更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展开对话的背景是本国错综复杂的状况。如此一来,我们在对话中必须时刻意识到历史学家与政治、历史学家与学术研究、以及历史学家与历史本身之间的关系。同时,我再次深刻认识到,相互理解的姿态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们要将战后的历史,或者冷战时期的历史作为对话的对象,就必须构建一个能将战前与战后历史贯通起来的框架,还要提出新的问题。

■ 郑 淳一

感谢刘杰老师的发言。现在我们结束第四场会议。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自由讨论时间该如何安排，是不是时间不够，或者会剩下很多时间，现在看来是多余的担心。感谢大家积极参与讨论。让我们以掌声结束今天的会议。各位辛苦了。

闭幕致辞

宋志勇

南开大学



经过两天紧张的工作，我们的会议——第9届国史对话会“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完成了预定的内容，就要圆满闭幕了。按照会议安排，由我来做会议的闭幕致辞。我是来自中国南开大学的宋志勇，实际上，我们这次会议群贤毕至，大咖云集，无论是会议的基调和报告、还是论文发表以及讨论，都非常精彩，内容也非常丰富。各单元主持人对各单元的论文发表都做了很好的评论，刘杰教授也对会议讨论做了精彩的总结，会议已经圆满了。下面就以我个人参加会的一些体会作为闭幕致辞吧。

一、会议组织非常成功。为本届会议的举办，会议实行委员会差不多半年前就开始会议的各项准备，尤其是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的今西淳子女士以及学术指导的三谷博教授、刘杰教授等为会议的举办付出了巨大心血。本次会议举办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也为会议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志愿者同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同声传译的各位老师为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高水平的翻译，很辛苦，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二、学术成果丰富。刘杰教授对国史对话会的宗旨、三谷博教授本次会议走出东亚来到泰国举办的意义已经做了很好的介绍和说明。杨奎松教授的基调和报告为我们了解战后中国对日政策的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其他国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很受启发。会上，有4位老师进行了论文发表，有6位老师参加了讨论，内容非常丰富。通过两天的热烈研讨，学者们对国史研究的意义，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关系、东亚与东南亚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中日韩三国的国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深化和促进作用。与次同时，好几位新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他们的参与和发表，都给会议带来了新气息，使国史研究的学者网络有了新的扩展。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学者网络的扩大，都表明我们的会议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取得圆满成功。

三、对于今后国史研究的方向，各位学者提出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建设性意见，对深化国史研究的很有启发性。期待会后财团和专家们进一步完善未来国史研究的规划。

最后，宣布第9届国史对话会“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研讨会结束。谢谢大家。

讲师简介

■ 杨 奎松 / YANG Kuisong

北京大学退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1953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暨兼任教授。

主要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及其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研究》、《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边缘人”“纪事一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等。

■ 陈 玉珍 / TANGSINMUNKONG Pattajit

2010年毕业于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部中文专业，之后在泰国驻华大使馆担任大使秘书。2012年来日，2016年完成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科硕士课程，2019年完成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科先后担任助教及讲师。自2022年至今，担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师。研究领域为东南亚现代史，重点研究对象为东南亚的对外认知、历史叙述和外交言论。

主要著作：

陈玉珍（2024年，预计出版）《重读泰国外交史——脱离“竹子外交论”》，东京大学出版社。

Pattajit Tangsinmunkong and Sato, Jin. (2024, in print). “Experiencing Development: Resistance and Adaptation of Thailand over Half a Century,” Editorial Committee a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ndo-Pacif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merging Asia*. Springer Nature.

陈玉珍（2023）《从反日运动到日本化：重新审视1970-1990年代泰国对日本认知的转变》，《东南亚研究》61（1），1-32。

■ 吉田纯巳 / YOSHIDA Masumi

2019年3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博士（文学）。

2021年起担任三井文库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员。

研究领域为日本近代史，特别关注与经济问题相关的政治外交、企业及国家关系。

主要著作：

《战争期间亚洲的海运秩序：自由通商与帝国逻辑》（博士论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外务省与“通商自由主义”》，《东亚近代史》24期，2020年6月

《帝国日本的终战与海外财产调查》，《三井文库论丛》56期，2022年12月

■ 尹 大荣 / YOUN Dae-yeong

1995年获首尔大学人文学院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获首尔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巴黎第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7-2022年间，在高丽大学、首尔大学、西江大学、诚信女大、延世大学、仁荷大学等多所高校讲授东南亚历史相关课程。2007-2017年间，分别在仁荷大学和西江大学担任研究教授和助理教授。曾在历史学会、东洋史学会、韩国东南亚学会担任研究理事。韩国东南亚研究所总务理事。目前任职于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

主 要 著 作：Dae-yeong YOUN, *Les idées et les mouvements réformistes en Corée et au Viêt Nam, 1897-1911 : la tradition, le nouveau savoir à travers les nouveaux écrits, et leurs interaction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européennes, (4 janvier) 2011, 804 p. ISBN-10: 6131540977 ISBN-13: 978-6131540974, YOUN Dae-yeong, “Between Korea and Vietnam: Kim Yung Kun’s “Ever-Changing and Impermanent” Lif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Harrassowitz Verlag, ISSN: 0021-910X), 50/2 (November 2016), pp. 235-278.、YOUN Dae-yeong (尹 大 荣),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Young Korean Men and Nanyang in the 1910s (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1910年代的韩裔青年与南洋),”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哲学与文化月刊, 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 TAIWAN, ISSN: 1015-8383), No. 526 (Vol. 45, no. 3) (Mar., 2018), pp. 27-43.

■ 高 艳杰 / GAO Yanjie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院长、教授，兼厦门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外交政策、中国与印尼关系史、华侨华人史等领域。

课题：主持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美国政府对东盟认知的历史嬗变及其对“印太战略”的影响》、中国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心理战研究（1949-1965）》，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对印尼领土问题的政策研究（1956-1966）》等各类课题10余项。

主要著作：

论文：《冷战初期美国与印尼关系中的中国因素分析》；《国际关系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史书写：历史脉络、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1949—1954）》；《印尼华文报刊在中印尼关系研究中的史料价值》等20余篇

著作：《冷战时期美国对印尼领土问题的政策研究（1949-197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预计2024年12月出版）

代后记

金 因泰 全南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第74届SGRA论坛/第九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于2024年8月10日至11日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举行。自2020年1月在菲律宾举行“国史对话”以来，由于疫情，对话一度转移到线上进行。去年（2023年）8月第八届终于在日本恢复了面对面的形式（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次同样采取面对面方式（与线上同步），而且选择在相对遥远的地方继续推进“国史对话”。

会议前一天傍晚，与会者一起聚餐，揭开了对话的序幕。参与者中有些人时隔五年再次见面交谈，也有初次见面的人，但作为怀有相似忧虑和问题意识的研究者，大家都愉快地交流着。这让人对次日即将开始的“对话”充满期待。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的欢迎致辞，给正在思考本国国史和国史间对话的研究者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8月10日，会议在晴朗的天气中拉开帷幕。本次“国史对话”共分为五场。第一天安排了主旨演讲和报告，共两场；次日基于这些内容进行第三场的指定讨论，接着是第四场的自由讨论，最后是思考未来国史对话方向的第五场。第一场由刘杰老师（早稻田大学）主持。首先，他阐述了本次“国史对话”的宗旨。随后指出，在国际形势与当初开始“国史对话”时大不相同的当下，选择新的地点和主题进行对话意义深远，并呼吁以此为契机，探索今后对话的方向。

接下来是三谷博老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开幕致辞。他强调，如果能够相互理解并分享影响东北亚三国关系的现代史轨迹，那么历史对话就能始终保持稳定。他还表示，作为历史学者，他对中日韩三国在东南亚研究方面的差异存有疑问，希望通过本次对话解开这些疑问，并通过关注在这个新地区形成的纽带和对立，思考如何深化我们之间的联系。

杨奎松老师（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主旨演讲题为“后殖民时代‘国族主义’碰撞原因之考察——以毛时代中国应对领土争端的策略变化为线索”。简而言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魅力型”领导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权力，展现出化解（或平息）外交关系冲突的政治能力。然而，后来性格不同的领导人并未采用（或无法采用）这种方式，有时中央还会利用民粹主义，反而出现了被影响的主客颠倒局面。他认为，当时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所实施政策的阴影。最后，他就历史研究者应当持有的态度，对于相互理解和体谅彼此的历史提出了建议。简言之，就是要承认任何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历史认识”都有其局限性，并能够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准确定位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接下来是中日韩研究者及泰国籍泰国研究者的主题报告环节，由南基正老师（首尔大学）主持。Pattajit Tangsinmunkong（陈玉珍）老师（东京大学）的报告“‘竹子外交论’中的大国关系与小国意识”重新探讨了被认为擅长外交，并对此

引以为豪的泰国的外交历史事实，同时也尖锐指出了隐藏在这背后的“小国意识”所存在的问题。“小国意识”这一术语与“小国（观）”、“小中华意识”等韩国史中使用的词汇相似，让人倍感亲切，但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一点非常有趣。这有助于理解泰国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与韩国“爱好和平的白衣民族”这一观念的相似性。

随后是三国研究者的主题报告。吉田纯已老师（三井文库）的“日本近代史与东南亚——围绕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评价”介绍了战后日本近代史研究中，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是如何被讨论的，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界潮流。

尹大荣老师（首尔大学）的“韩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从古代慧超时期（新罗时代）开始，经高丽、朝鲜，直至近代韩国，纵贯时代地考察了朝鲜半岛与东南亚的关系。最后，他指出了韩国东南亚史研究现状的一些不足之处。

高艳杰老师（厦门大学）的“侨务与外交：中国对 1959 年印尼排华问题的反应”论述了 1959 年至 1961 年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针对华人的迫害，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对。高老师评价认为，中国在采取强硬态度的同时，也回应了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必要性。

本次“国史对话”包括了中国学界权威的主旨演讲和泰国籍研究者的报告，这是一次新的尝试。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从国史学界权威那里听取中国历史认识或叙述的特点，同时也是一个了解我们不太熟悉的泰国本国史认识的机会。

第一天的两场结束后，我们在户外就餐区享用了美味的泰国午餐。在之后的亚洲未来会议开幕式后的欢迎晚宴上，延续了前一天热烈友好的交谈氛围。这是在远离家乡举办活动的“优势”，大家都无法在当天行程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家。指定讨论者们在听完上午的主旨演讲和报告后，整理思路写成讨论稿，并在当晚将稿件交给翻译，这有助于次日讨论的顺利进行。

8 月 11 日，第三场是由彭浩老师（大阪公立大学）主持的指定讨论。来自韩国的郑栽贤老师（木浦大学）和韩成敏老师（高丽大学），来自日本的佐藤雄基老师（立教大学）和平山升老师（神奈川大学），来自中国的郑洁西老师（温州大学）和郑成老师（兵庫県立大学）担任讨论者。

六位指定讨论者基于各自的专业领域，提出了深思熟虑的真诚而尖锐的问题。

第四场是自由讨论，由郑淳一老师（高丽大学）主持。首先，主旨演讲者和报告人对指定讨论者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回答，随后进行了自由讨论。问题意识演变为提问，提问又发展成为获得共鸣的新的问题意识。尽管问答交错，但对话进行得相当自然，这要归功于长期合作的翻译团队。由于有长期对话的参与者和共享问题意识的新参与者共同参与，使得讨论非常高效。

热烈讨论结束后，刘杰老师总结了讨论要点。简而言之，在选择这次主题时有了新的发现。本次关键词“大国”、“小国”受到关注，时期自然地从前转移到战后。进入战后历史，问题设定就会发生变化。要将战前与战后连续起来进行讨论，就必须思考应该把什么设定为问题。我们要思考各自在不同空间中如何试图跨越国界，跨越国界的历史对话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也需要共同思考各国历史学家在各国内部面临的国界问题。同时，我们要记住历史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本国国内的问题。

第五场在盐出浩之老师（京都大学）的主持下，讨论了稍微偏离本主题的关于未来国史对话的方向的问题。中国的彭浩老师、韩国的郑淳一老师和日本的村和明

老师（东京大学）依次提出了意见。共同的观点是，尽管存在困难，但今后还是要继续进行对话。

平山老师提出要继续思考三谷老师关于“尽可能多地吸引‘隐居型’国史研究者”的初衷，韩成敏老师建议稍微改变形式，让研究者们一起实地考察，并在那里通过小型交谈拉近彼此距离，这些都是值得倾听的意见。

最后，宋志勇老师（南开大学）致闭幕词。首先，他表示会议准备和进行非常成功，感谢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的今西淳子常务理事、三谷博老师、刘杰老师以及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同时也感谢同声传译和工作人员。其次，他指出学术成果丰硕。最后，他提到听到了关于未来国史研究方向的充满智慧和建设性的意见，简言之，这为深化国史研究提供了启示，他坚信会议后财团和参与者们将共同设计美好的未来。

最后的最后，还报告了为扩大“国史对话”成果的影响范围而开展的新工作之一——教材化项目的现状。利用新媒体的工作令人期待。

“国史对话”经历了面对面会议和新冠疫情期间的在线会议，已经举办到第九届。就个人而言，这次在地点和主题上都做出了相当大改变的新尝试，给我留下了特别多的印象。首先，深刻感受到韩国的东南亚研究还很不足。与日本、中国相比，研究者较少可能是必然的，但研究主题不够多样化这一点需要学界层面的思考。如果从国史内部开始营造包容各种研究和尝试的氛围，或许国家间的对话也能更好地进行。作为一名国史研究者，我产生了这样的思考。

此外，就像在之前的“国史对话”中感受到的那样，在这次研究者范围更广的“对话”中，我也感到许多研究者都有着与我相似的困扰（政治与学术之间，社会期待的学问与自己研究之间的困扰），这让我感到鼓舞。

另一方面，排斥华人、华侨的事件并非只发生在东南亚。（虽然华侨社会在东南亚形成很大规模是事实）我们也应该提醒人们，在其他有大量中国人进入的地区，也发生过针对他们的排斥事件。在殖民地朝鲜也发生过排华事件，而在中国也有过排斥朝鲜人的事件。因此，思考为什么各国会发生针对移民社区的排斥事件，这样的共同关注可能会很有意义。

第二天晚上，大多数“国史对话”参与者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以轻松的心情在一个美丽的户外餐厅自由交谈。这次聚会让人意识到，除了学术对话，面对面、稍微放下肩上的重担、交换彼此内心想法的私人对话同样重要。

（第7届亚洲未来会议圆桌会议／第9届国史对话报告书：金 囿泰《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转载）

■ 金 囿泰／KIM Kyongtae

出生于韩国浦项市，韩国史专业。在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攻读博士期间，于2010年至2011年间，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日本文化研究专业（日本史学）外国研究生的身份留学。2014年在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高丽大学人文力量强化事业团研究教授，目前担任全南大学历史教育系副教授。研究关注战争的破坏性本性与必定从战争所引发的荒原中生长出的和平的历史。主要著作：《壬辰战争期讲和交涉研究》（博士论文）、《虚势与妥协——围绕壬辰倭乱的三国协商》（东北亚历史财团，2019年）等。



第74届 SGRA 论坛

第九届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 参加者名单

	姓名（罗马字）	姓名（日语）	姓名（韩语）	姓名（中文）	所属单位（日语）
主旨演讲					
1	YANG Kuisong	楊 奎松	개회사	杨 奎松	北京大学・華東師範大学
报告人					
2	GAO Yanjie	高 艶傑	가오 옌제	高 艳杰	廈門大学
3	TANGSINMUNKONG Pattajit	タンシンマンコン・パッタジット	파타짓 탕신만콩	陈 玉珍	東京大学
4	YOSHIDA Masumi	吉田 ますみ	요시다 마스미	吉田纯巳	三井文庫
5	YOUN Dae-yeong	尹 大榮	윤 대영	尹 大荣	ソウル大学
指定讨论者					
6	SATO Yuki	佐藤雄基	사토 유키	佐藤雄基	立教大学
7	HIRAYAMA Noboru	平山 昇	히라야마 노보루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8	ZHENG Jiexi	鄭 潔西	정 제시	郑 洁西	温州大学
8	ZHENG Cheng	鄭 成	정 정	郑 成	兵庫県立大学
10	HAN Sungmin	韓 成敏	한 성민	韩 成敏	高麗大学
11	JEOUNG Jaehyun	鄭 栽賢	정 재현	郑 栽贤	木浦大学
组委会成员					
12	CHEN Lu	陳 璐	첸루	陈 璐	早稲田大学
13	CHONG Soonil	鄭 淳一	정순일	郑 淳一	高麗大学
14	KIM Kyongtae	金 キョンテ	김경태	金 基泰	全南大学
15	LIU Jie	劉 傑	류지에	刘 杰	早稲田大学
16	MITANI Hiroshi	三谷 博	미타니 히로시	三谷 博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17	MURA Kazuaki	村 和明	무라 가즈아키	村 和明	東京大学
18	NAM Kijeong	南 基正	남기정	南 基正	ソウル大学
19	PENG Hao	彭 浩	평하오	彭 浩	大阪公立大学
20	SHIODE Hiroyuki	塩出浩之	시오테 히로유키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21	SONG Zhiyong	宋 志勇	송지용	宋 志勇	南開大学
同声传译					
22	DING Li	丁 莉	딩리	丁 莉	北京大学
23	SONG Gang	宋 剛	송강	宋 刚	北京外国語大学
24	LEE Hyeri	李 ヘリ	이혜리	李 惠利	韓國外国語大学
25	AHN Younghee	安 ヨンヒ	안영희	安 暎姬	韓國外国語大学
26	JIN Danshi	金 丹実	김단실	金 丹实	通訳翻訳者
27	PIAO Xian	朴 賢	박현	朴 贤	京都大学
翻译／支持人员					
28	HONG Yongil	洪 龍日	홍용일	洪 龙日	東京大学
29	NOH Joo-eun	ノジュウン	노 주은	卢 珠璵	—
30	YU Ning	于 寧	유닝	于 宁	東京大学
31	YUN Jae-un	尹 在彦	윤재언	尹 在彦	東洋大学
事務局					
32	IMANISHI Junko	今西淳子	이마니시 준코	今西淳子	渥美財団
33	NAGAI Ayumi	長井亜弓	나가이 아유미	长井亚弓	渥美財団
34	MIYAKE Aya	三宅 綾	미야케 아야	三宅 綾	渥美財団

SGRA 報告 已发行期号介绍

- SGRA レポート01 設立記念講演録 「21世紀の日本とアジア」 船橋洋一 2001.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2 CISV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挑戦：多様性の中に調和を求めて」
今西淳子、高 偉俊、F. マキト、金 雄熙、李 來賛 2001. 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技術の創造」 畑村洋太郎 2001.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4 第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の皆さんへ」 関 啓子、L. ビッヒラー、高 熙卓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5 第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の新しい東アジア：経済協力をどう考えるべきか」
平川 均、F. マキト、李 鋼哲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6 投稿 「今日の留学」「はじめの一歩」 工藤正司 今西淳子 2001.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7 第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共生時代のエネルギーを考える：ライフスタイルからの工夫」
木村建一、D. バート、高 偉俊 2001. 10.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8 第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教育革命：ITは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
臼井建彦、西野篤夫、V. コストブ、F. マキト、J. スリスマンティオ、蔣 恵玲、楊 接期、
李 來賛、斎藤信男 2002. 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9 第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対話と共生をキーワードに」
ペマ・ギャルポ、林 泉忠 2002. 2. 2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0 第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とイスラーム：文明間の対話のために」
S. ギュレチ、板垣雄三 200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1 投稿 「中国はなぜWTOに加盟したのか」 金香海 2002. 7.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2 第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環境診断：地球の砂漠化を考える」
建石隆太郎、B. プレンサイン 2002.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3 投稿 「経済特区：フィリピンの視点から」 F. マキト 2002. 12. 1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4 第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新しい東アジア」 + 宮澤喜一元総理大臣をお迎えして
フリー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平川 均、李 鎮奎、ガト・アルヤ・ブートゥラ、孟 健軍、B. ヴィリエガス 日本語版2003. 1. 31 発行、
韓国語版2003. 3. 31 発行、中国語版2003. 5. 30 発行、英語版2003. 3.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5 投稿 「中国における行政訴訟—請求と処理状況に対する考察—」 呉東鎬 2003. 1.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6 第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情報化と教育」 苑 復傑、遊間和子 2003.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7 第1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21世紀の世界安全保障と東アジア」
白石 隆、南 基正、李 恩民、村田晃嗣 日本語版2003. 3. 30 発行、英語版2003. 6.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8 第1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研究：国境を越える取り組み」 高橋 甫、貫戸朋子 2003.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9 投稿 「海軍の誕生と近代日本—幕末期海軍建設の再検討と『海軍革命』の仮説」 朴 榮濬
2003. 12. 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0 第12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環境問題と国際協力：C O P 3 の目標は実現可能か」
外岡豊、李海峰、鄭成春、高偉俊 2004. 3.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1 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共同体構築に向けての日本及び韓国の役割について」2004.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2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民族紛争－どうして起こるのか どう解決するか」 明石康 2004.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3 第13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宮島喬、イコ・プラムティオノ 200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4 投稿 「1945 年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中国に対する援助：その評価の歴史」 フスレ 2004.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5 第14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国境を越える E-Learning」
斎藤信男、福田収一、渡辺吉裕、F. マキト、金 雄熙 2005. 3.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6 第15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この夏、東京の電気は大丈夫？」 中上英俊、高 偉俊 2005. 1. 2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7 第16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過去・現在・未来」
竹田いさみ、R. エルドリッヂ、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8 第17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地球市民の義務教育 -」
宮島 喬、ヤマガチ・アナ・エリーザ、朴 校熙、小林宏美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9 第18 回フォーラム・第4 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韓流・日流：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における
ソフトパワー」 李 鎮奎、林 夏生、金 智龍、道上尚史、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雄熙 2005. 5.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0 第19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文化再考－自由と市民社会をキーワードに－」
宮崎法子、東島 誠 2005. 1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1 第20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雁はまだ飛んでいるか」
平川 均、渡辺利夫、トラン・ヴァン・トウ、範 建亭、白 寅秀、エンクバヤル・シャグダル、F. マキト
2006. 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2 第21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留学生－」
横田雅弘、白石勝己、鄭仁豪、カンピラパーブ・スネート、王雪萍、黒田一雄、大塚晶、徐向東、
角田英一 2006. 4.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3 第22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の研究」 小菅信子、李 恩民 2006. 7.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4 第23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と宗教：宗教って何なの？」
島蘭 進、ノルマン・ヘイヴンズ、ランジャン・ムコパディヤヤ、ミラ・ゾンターク、
セリム・ユジェル・ギュレチ 200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5 第24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ごみ処理と国境を越える資源循環～私が分別したごみはどこへ行くの？～」
鈴木進一、間宮 尚、李 海峰、中西 徹、外岡 豊 2007. 3.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6 第25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は教育を強化できるか」
高橋富士信、藤谷哲、楊接期、江蘇蘇 2007.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7 第1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若者の未来と日本語』」
池崎美代子、武田春仁、張 潤北、徐 向東、孫 建軍、朴 貞姫 2007. 6.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8 第6 回日韓フォーラム in 葉山講演録 「親日・反日・克日：多様化する韓国の対日観」
金 範洙、趙 寛子、玄 大松、小針 進、南 基正 2007. 8.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9 第26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私たちの出会いと将来～」
黒住 真、韓 東育、趙 寛子、林 少陽、孫 軍悦 2007.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0 第27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アジアにおける外来種問題～ひとの生活との関わりを考える～」
多紀保彦、加納光樹、プラチヤー・ムシカシントーン、今西淳子 2008.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1 第28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いのちの尊厳と宗教の役割」
島藺進、秋葉悦子、井上ウイマラ、大谷いづみ、ランジャナ・ムコパディヤヤ 2008.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2 第2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新疆講演録 「黄土高原緑化協力の15 年—無理解と失敗から
相互理解と信頼へ—」 高見邦雄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8.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主義」 平川均 2008. 3.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4 第29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広告と社会の複雑な関係」 関沢 英彦、徐 向東、オリガ・ホメンコ
2008. 6.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5 第30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教育における『負け組』をどう考えるか～
日本、中国、シンガポール～」 佐藤香、山口真美、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2008.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6 第31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水田から油田へ：日本のエネルギー供給、食糧安全と地域の活性化」
東城清秀、田村啓二、外岡 豊 2009.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7 第32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オリンピックと東アジアの平和繁栄」
清水 諭、池田慎太郎、朴 榮濬、劉傑、南 基正 2008. 8.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8 第3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延辺&北京講演録 「一燈やがて万燈となる如く—
アジアの留学生と生活を共にした協会の50 年」 工藤正司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9. 4.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9 第33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が格差を縮めるか」
東 茂樹、平川 均、ド・マン・ホーン、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09.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0 第8 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韓の東アジア地域構想と中国観」
平川 均、孫 洌、川島 真、金 湘培、李 鋼哲 日本語版、韓国語 Web 版 2009.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1 第35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テレビゲームが子どもの成長に与える影響を考える」
大多和直樹、佐々木 敏、渋谷明子、ユ・ティ・ルイン、江 蘇蘇 2009.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2 第36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21 世紀の課題」
宮島 喬、都築 勉、高 熙卓、中西 徹、林 泉忠、プ・ティ・ミン・チィ、
劉 傑、孫 軍悦 2010. 3.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3 第4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上海講演録 「世界的課題に向けていま若者ができること～
TABLE FOR TWO～」 近藤正晃ジェームス 2010. 4.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4 第37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エリート教育は国に『希望』をもたらすか：
東アジアのエリート高校教育の現状と課題」 玄田有史 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金 範洙 張 健 2010.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5 第38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市・建築のエネルギー事情とライフスタイル～」木村建一、高 偉俊、Mochamad Donny Koerniawan、Max Maquito、Pham Van Quan、葉 文昌、Supreedee Rittironk、郭 榮珠、王 劍宏、福田展淳 2010. 1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6 第5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中国の環境問題と日中民間協力」第一部（北京）：「北京の水問題を中心に」高見邦雄、汪 敏、張 昌玉 第二部（フフホト）：「地下資源開発を中心に」高見邦雄、オンドロナ、ブレンサイン 201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7 第39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ポスト社会主義時代における宗教の復興」井上まどか、ティムール・ダダバエフ、ゾントーク・ミラ、エリック・シッケタンツ、島 蘭 進、陳 継東 2011. 12.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8 投稿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論への一試論」平川 均 2011. 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9 第10 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1300 年前の東アジア地域交流」朴 亨國、金 尚泰、胡 潔、李 成制、陸 載和、清水重敦、林 慶澤 2012.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0 第40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少子高齢化問題と福祉」田多英範、李 蓮花、羅 仁淑、平川 均、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F・マキト 2011.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1 第41 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共同体の現状と展望」恒川恵市、黒柳米司、朴 榮濬、劉 傑、林 泉忠、ブレンサイン、李 成日、南 基正、平川 均 2012.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2 第6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Sound Economy ～私がミナマタから学んだこと～」柳田耕一 「内モンゴル草原の生態系：鉱山採掘がもたらしている生態系破壊と環境汚染問題」郭 偉 201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4 第43 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 講演録「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課題と展望」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南 基正、林 泉忠、竹田いさみ 2012.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5 第44 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 講演録「21 世紀型学力を育むフューチャースクールの戦略と課題」赤堀侃司、影戸誠、冢圭福、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石澤紀雄 2013. 2.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6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日英戦後和解（1994-1998 年）」（日本語・英語・中国語）沼田貞昭 2013.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7 第12 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太平洋時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新秩序の模索」平川 均、加茂具樹、金 雄熙、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敬黙 201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8 第7 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ボランティア・志願者論」（日本語・中国語・英語）宮崎幸雄 2014. 5.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9 第45 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紛争の海から平和の海へー東アジア海洋秩序の現状と展望ー」村瀬信也、南 基正、李 成日、林 泉忠、福原裕二、朴 榮濬 2014.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0 第46 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インクルーシブ教育：子どもの多様なニーズにどう応えるか」荒川 智、上原芳枝、ヴィラーク ヴィクトル、中村ノーマン、崔 佳英 2015.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1 第47 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科学技術とリスク社会ー福島第一原発事故から考える科学技術と倫理ー」崔 勝媛、島 蘭 進、平川秀幸 2015. 5.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2 第8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近代日本美術史と近代中国」
佐藤道信、木田拓也 2015.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3 第1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第4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経済のダイナミズム—
物流を中心に」李 鎮奎、金 雄熙、榊原英資、安 秉民、ドマン ホーン、李 鋼哲 2015.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4 第4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円卓会議「日本研究の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求めて」
劉 傑、平野健一郎、南 基正 他15名 2016. 6.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5 第50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北九州講演録「青空、水、くらし—環境と女性と未来に向けて」
神崎智子、斉藤淳子、李 允淑、小林直子、田村慶子 2016. 6. 2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6 第9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フフホト&北京講演録「日中200年—文化史からの再検討」
劉 建輝 2020.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7 第15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これからの日韓の国際開発協力—共進化アーキテクチャ
の模索」孫赫相、深川由紀子、平川均、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1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8 第5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今、再び平和について—平和のための東アジア知識人連帯を考え
る—」南基正、木宮正史、朴栄濬、宋均宮、林泉忠、都築勉 2017. 3. 2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9 第52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
劉傑、趙珖、葛兆光、三谷博、八百啓介、橋本雄、松田麻美子、徐静波、鄭淳一、金キョンテ
2017.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0 第16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韓の国際開発協力—新たなアジア型モデルの模索—」
金雄熙、李恩民、孫赫相、李鋼哲 2017. 5.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1 第5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人を幸せにするロボット—人とロボットの共生社会をめざして第
2回—」稲葉雅幸、李周浩、文景楠、瀬戸文美 2017.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2 第5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2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蒙
古襲来と13世紀モンゴル帝国のグローバル化」葛兆光、四日市康博、チョグト、橋本雄、エルデニ
バートル、向正樹、孫衛国、金甫桃、李命美、ツェレンドルジ、趙阮、張佳 2018.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3 第5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を結ぶ?『一带一路』の地政学」朱建栄、李彦銘、朴栄
濬、古賀慶、朴准儀 2018. 11.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4 第11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からみた中国美術史学」塚本磨充、呉孟晋
2019. 5. 1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5 第17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北朝鮮開発協力：各アクターから現状と今後を聞く」
孫赫相、朱建栄、文昊鍊 2019. 11. 2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6 第5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3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7世
紀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戦乱から安定へ—」三谷博、劉傑、趙珖、崔永昌、鄭潔西、荒木和憲、許
泰玖、鈴木開、祁美琴、牧原成征、崔姪姫、趙軼峰 2019.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7 第6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の高等教育のグローバル化!?」
沈雨香、吉田文、シン・ジョンチョル、関沢和泉、ムラット・チャクル、金範洙 2019. 3. 2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8 第12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映画交流の可能性」
刈間文俊、王衆一 2020.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9 第62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が世界を変える時…？——不都合な真実を超えて」ルウェリン・ヒューズ、ハンス＝ヨゼフ・フェル、朴准儀、高偉俊、葉文昌、佐藤健太、近藤恵 2019. 11.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0 第63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4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東アジア』の誕生—19世紀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の転換—」三谷博、大久保健晴、韓承勳、孫青、大川真、南基玄、郭衛東、塩出浩之、韓成敏、秦方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1 第13回SGRA-Vカフェ講演録「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の東アジア」林 泉忠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2 第13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国際日本学としてのアニメ研究」大塚英志、秦 剛、古市雅子、陳 龔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3 第14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西思想の接触圏としての日本近代美術史再考」稲賀繁美、劉 曉峰、塚本磨充、王 中忱、林 少陽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4 第65回SGRA-V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5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9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感染症の流行と社会的対応」朴 漢珉、市川智生、余 新忠 2021. 10. 0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5 第19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岐路に立つ日韓関係：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か」小此木 政夫、李 元徳、沈 揆先、伊集院 敦、金 志英、小針 進、朴 栄濬、西野 純也 2021. 11. 1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6 第6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6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 人の移動と境界・権力・民族」塩出浩之、趙 阮、張 佳、榎本 渉、韓 成敏、秦 方、大久保健晴 2022.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7 第6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誰一人取り残さない』如何にパンデミックを乗り越えSDGs実現に向かうか—世界各地からの現状報告—」佐渡友 哲、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杜 世鑫、ダルウィッシュ ホサム、李 鋼哲、モハメド・オマル・アブディン 2022. 2.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8 第15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はいかに作られ、モダンはいかなる変化を生んだのか？—空間アジアの形成と生活世界の近代・現代—」山室信一 2022.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9 第6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夢・希望・嘘—メディアとジェンダー・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関係性を探る—」ハンブルトン・アレクサンドラ、バラニャク平田ズザンナ、于寧、洪ユン伸 2022. 11.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0 第2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進撃のKカルチャー——新韓流現象とその影響力」小針 進、韓 準、チュ・スワン・ザオ 2022. 11.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1 第6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7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歴史大衆化』と東アジアの歴史学」韓 成敏 2023. 3. 2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2 第16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モダンの衝撃とアジアの百年—異中同あり、通底・反転する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山室信一 2023. 6. 1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3 第70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木造建築文化財の修復・保存について考える」竹口泰生、姜 瑤慧、永 昕群、アレハンドロ・マルティネス、塩原フローニ・フリデリケ 2023.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4 第21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新たな脅威（エマージングリスク）・新たな安全保障（エマージングセキュリティ）—これからの政策への挑戦—」金 湘培、鈴木一人 2023.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5 第7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20世紀前半、北東アジアに現れた『緑のウクライナ』という特別な空間」オリガ・ホメンコ、塚瀬 進、ナヒヤ、グロリア・ヤン ユー、マグダレナ・コウオジェイ 2023. 10.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6 第72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8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20世紀の戦争・植民地支配と和解はどのように語られてきたのか—教育・メディア・研究—」金 泰雄、唐 小兵、塩出浩之、江 沛、福岡良明、李 基勳、安岡健一、梁 知恵、陳 紅民 2024. 4. 1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7 第17回 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美術〉の誕生」後小路雅弘 2024. 6. 13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8 第22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2024 現代日本学会春季国際学術大会講演録「ジェットコースターの日韓関係——何が正常で何が憂鬱なのか」西野純也、李 昌玖、小針 進 2024 .11. 14 発行

■ レポートご希望の方は、SGRA 事務局（Tel：03-3943-7612 Email：sgra@aisf.or.jp）へご連絡ください。

SGRA 报告 No. 109 (中文版)

第74届 SGRA 论坛

第九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

编辑・发行 公益财团法人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邮编 112-0014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 3-5-8
电话 : 03-3943-7612 传真 : 03-3943-1512
SGRA 网页 : <http://www.aisf.or.jp/sgra/>
电子邮件 : sgra@aisf.or.jp

发行日 2025年7月30日

发行人 今西淳子

中文版监修 于宁

印刷 (株) 平河工业社

© 关口全球研究会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关于本刊的文章内容，如有疑问或欲引用请与我们联系。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pying is Prohibited. For inquiries or quotes, please contact us.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东亚的“国史”与东南亚

